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崱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高层论坛 •

中美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应结为伙伴 亨利·基辛格 (004)

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 魏礼群 (006)

• 宏观经济 •

推进城镇化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 吕 政 (024)

养老基金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
——兼论我国金融改革和养老金改革协调互动的改革发展观
刘云龙 肖志光 郑 伟 (030)

• 国际经济 •

“自动减赤机制”对美国经济之影响 谷源洋 (040)

美欧速启自贸区谈判 中国需积极应对 陈炳才 田 青 (048)

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 冯 雷 (057)

TPP与RCEP：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新秩序下的挑战与策略
汤 婧 (063)

征信体系项目建设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发展 林钧跃 (073)

• 产业发展 •

领先市场培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徐梦周 吕 铁 (083)

美国棉花产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解运亮 (095)

• 案例研究 •

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比较研究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课题组 (104)

• 名人观察 •

磋商使中美两国经济更加平衡

亨利·保尔森 (114)

让中国进一步融入开放的全球体系

法里德·扎卡里亚 (115)

中国的和平共处战略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泽洛特·奥德高 (116)

• 投资地理 •

保加利亚的投资合作环境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117)

• 英文提要 (ABSTRACTS) • (125)

欢迎订阅2013《全球化》杂志 (129)

国经中心将举办“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 (封三)

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 (莫千山会议·2013) 征文启事 (封四)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运营单位：国经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全球化》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2号楼503室，邮编：100017；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1号1号楼506室，邮编：100034）

投稿邮箱：qqhtgx@126.com qq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66169330

· 高层论坛 ·

中美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应结为伙伴^{*}

亨利·基辛格

新中国从成立以来的变化，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当然，这一变化得益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但更得益于敢于开拓进取的勇气和魄力。

自1971年首次访华以来，我到访中国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不计其数的会谈；纵观历次访问，我此次最为乐观；别忘了我不是一个生性尤其乐观的人。

今天的世界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国际社会”。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国际社会”，因为不同地区所遵从的组织原则、所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欧洲正在放弃民族国家的模式；部分源于殖民主义的关系，民族国家的模式成为了当今世界体系的结构基础。但在放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陷入新旧体系交替之间困境中，新的制度还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对旧模式尚存一丝希望。欧洲领导人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要求其人民做出各种牺牲；但没有牺牲，就无法建立新制度。因此客观上造成一种二元式结果：资源积累不足的消费型经济；其效不彰的避险型外交政策。

在亚洲，外交政策的贯彻方式与19世纪的欧洲相同，即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主导。挑战在于，要在各个民族意识强的国家之间建立非对抗性的关系。在中东，挑战来自于边境划分，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建立；世界其他地区因此也深受影响，同时缺乏一个整体性的领导。

之所以谈及这一点，是因为中美两个大陆国家历史上从未全身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无论是出于地理位置还是其他原因，中国自古认为其与众不同，基本上不关心他人事务；美国同样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作为上帝的选民，承担理想传播的职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国际关系的核心在于中美关系。

中国和美国单靠自己都无法解决问题；缺乏中美间的合作同样无法解决问题。中美不合作，世界就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阵营，而利用“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的诱惑很大。因此，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的巨大机遇。我很有幸亲自参与中美现代历史的关系

^{*} 本文为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2013年4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会(2013年)会议上的讲话，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发展，并不是每个历史学者能亲历这一历史。纵观中美现代关系的发展史，一开始，我们有共同的手，因此目标相同；接下来的十年是真诚交往的十年，也为冷战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冷战结束时，两件似乎互为矛盾的事发生了：美国八位总统在任期内采取了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无论分歧如何，友好合作是主线；五届中国政府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但问题在于：第一，如何定义中美合作；第二，如何在冷战后的世界进行合作？

这段时间内，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很多人想把中国当作当年的苏联看待，认为中国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苏联完全只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今天的中国是和国际经济紧密相连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国民经济的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挑战的性质是不同的。而中国国内有观点认为，美国这个强国正在衰退没落，不想让其他国家崛起，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纷争。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美间的关系好比19世纪英德之间的较量。

无需深究，大家就能发现，英德间的对立主要归咎于政策的短视性，而非重大事件推波助澜。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一战；1914年的世界各国领导若能预见到1918年的世界，他们肯定会另有选择。

中美间若真发生冲突，后果更将不堪设想。因此，两国领导人都明白，无论学者们怎么分析，中美不能相互对抗。有人在过去20年都在宣传这一论点，却时常遭到批评，说是受到了中国短暂热情好客的诱惑。但对于我来说，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寻找最佳合作方式的重要性。当然，寻找解决日常纠纷的机制是不够的；往来频繁的两个国家肯定多少有些日常的纠纷。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贸易还不如美国和洪都拉斯的贸易量大。在新世界里，我们面临少有的机遇；这不是我一人之词，而是两国领导人似乎已形成的共识。

如果真有此共识，中美两国可以将此共识转化为实际政策，共同讨论国际体系新格局的构建，制定平行（并非要相同的）的政策。我们双方面临包括能源、环境、核不扩散、太空、网络等领域的一系列共同问题，不合作、单靠本国是无法解决的。而太空、网络等议题甚至还不明确其具体问题是什么。谈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似乎就在几年前听起来还太过理想主义，但今天的实际情况可以以此作为基础了。

走这条路确实很难，因为中美差异一直以来都很大：历史各不相同；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邻国威胁其生存，中国恰恰相反；美国认为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认为每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巨大挑战。

但由于有幸亲历了这一历史，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巨大改革成就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已经为中美之间创建了坦诚对话的基础。虽然有困难、有争议，但我预见中美关系会向乐观方向发展；尽管有可能互为对手，仍可以在新的世界格局当中结为伙伴，相互合作。

责任编辑：刘英奎

· 高层论坛 ·

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

魏礼群

摘要：从各项综合指标看，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面临许多机遇，也存在不少挑战，依然任重道远。借鉴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经验，使我国顺利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转变，需要实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创新驱动发展等“六大战略”。

关键词：经济大国 经济强国 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魏礼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党的十八大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和用历史的宽广眼光，确立了我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并做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这个“双百”目标，提出了我国“2013-2020年、2021-2050年”两个战略发展阶段，明确了2020年和2050年这两个战略节点，这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势的研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转变。深入研究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是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我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问题和风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与1978年相比，2012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2.5倍，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87.3倍^①。从经济总量、部分省市人均GDP、制造业产值、贸易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等综合指标看，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首先是经济大国，经济大国首先要有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总量。据统计，1978年我国GDP只有1 482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GDP达到73 011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2012年我国GDP超过74 260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

部分省市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已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 094美元，在世界上的排名较为靠后，但从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发达省市来看，一些省市的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已经接近或超过世界上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2012年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的GDP总量分别为：57 067.9亿元、54 058.2亿元和50 013.2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这三个省的GDP总量均达到9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值已经接近或超过荷兰、瑞士等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2012年天津、北京、上海三市的人均GDP分别为：15 069美元、13 967美元和13 565美元，这个数值已接近或超过波兰、匈牙利等一些欧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根据联合国统计，2011年我国制造业产值为2.0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到2012年底，我国钢、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

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联系的表现结果，贸易进出口总额则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据统计，2003-2011年间，我国货物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1.7%。2012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8 66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并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超过日本，已连续六年稳居世界第一位。197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而到2012年底，已达到33 116亿美元，这对于我国继续运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支持整个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虽然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但发展中不协调、不稳定、不

^①本文数据主要根据我国各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机构的相关研究成果计算得出。

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走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路子,经济建设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按照经济强国的内涵和要求来判断当前的经济发展,依然还存在着人均收入偏少、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层次低、城市化发展滞后、金融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迈向经济强国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二、经济强国的内涵和目标

(一) 经济强国的内涵

大体说来,经济强国的内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人均收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从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两个方面,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做了战略部署。一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前提首先必须是经济大国,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即使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再强也不能称之为经济强国。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步入经济强国的门槛条件之一,是一国的经济总量至少应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6%。据统计,2007年末,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7.9%,应当说已经迈过最低门槛了。据IMF的统计,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 094美元,按照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标准来衡量(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在经济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实现人均收入的明显增加,则是我国迈入经济强国行列的重要任务。

第二,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掌握相当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的核心作用。一个经济强国必然是一个科技创新强国,往往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品牌创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科技创新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强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掌握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并具备把这些科研成果与关键技术转化为产品的体制和机制。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处于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阶段性进程中,重视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抉择,也是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然要求。

第三,具备高端化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说,现代国际经济的竞争是国与国之间产业优势的竞争。具备高端化与生态化的产业结构,并能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是经济强国的基本内涵之一。高端化的产业结构能使一个国家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

则可以破解能源资源约束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目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产业竞争异常激烈，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提升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并试图继续以核心技术和专业服务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从国内来看，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端化不够，产业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依然是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改变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以破解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达到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与生态化，同样是实现经济强国的内涵要求之一。

第四，具有高度的城市化，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具有较高的城市化率，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是经济强国的基本内涵。城市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世界发达国家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就是其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方面能带动大量农民转化为市民，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并引发巨大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从而引发巨大的投资需求，并能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因此，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强国目标的“发动机”。经济强国普遍形成了一个或几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成为拉动区域或者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德国的莱茵—鲁尔城市群等世界性大城市群，成为这些经济发达国家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第五，具有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发达稳健的金融体系。本国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能够被国际交易所接受，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同时拥有较大规模的金融资产和发达稳健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可称之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内涵。从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中可看出，完成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确立了以英镑与黄金进行自由兑换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伦敦成为当时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为英国成为经济强国提供了金融支撑与便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末金本位制崩溃以后，“布雷顿森林协定”实际上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成为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国际货币呈现多元化的倾向，但是美元、日元、欧元等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掌控等等，极大地巩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强国地位。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的战略部署，反映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迈向金融支撑的经济强国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第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拥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一个经济强国

能够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能够在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上对各国产生影响并体现其重要性，能够支撑这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应有的战略地位。首先，要拥有一批跨国公司与国际知名品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自主品牌则是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象征。其次，要能够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占据有利地位。如世贸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经济组织在全球的经济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等国家正是利用这些经济组织不断巩固其经济强国的地位。再次，要能够主导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区域经济组织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载体，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经济强国分别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和欧盟等区域经济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组织为维护这些国家的区域经济利益提供了平台。最后，还要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规则等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判断其是否具有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二）经济强国的目标

按照以上经济强国的内涵，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服务业产值占比、城市化率和国际储备货币占比这五个综合指标来量化经济强国。研究经济强国的规律，目的是要为我国实现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转变设计目标和路径，换句话说，可以通过综合比较世界上现有经济强国的指标体系与衡量标准，来为中国的经济强国之路设定具体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经济强国的门槛条件，一个经济强国首先必须是经济总量大国。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的比重分别为：25.7%、12.0%、9.6%、5.3%、4.1%。从对比数据可知，经济规模上迈过经济强国门槛条件的有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国家。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是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可以通过从事研发的科学家数量、发明专利数量、科技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和研发经费这四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据统计，按照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综合比较，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全世界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排名为第18位。我国近些年来的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科技创新强国相比还有较远的距离。

服务业产值占比。现代经济强国都具有高度化与生态化的产业结构。可以用服务业产值高低占比来测度是否为经济强国。一般认为，一个具有高度化产业结构的经济强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应在70%左右。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2年美国、日本、德

国、法国的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79.7%、71.4%、71.1%、79.8%，中国的服务业产值占比仅为43.7%。从服务业产值占比来看我国与经济强国地位，的确还有相当的距离。应当说，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推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发展、培育一批跨国企业和世界知名品牌，是我国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

城市化率。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经济强国必须具有较高的城市化率。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美国、日本、德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82.4%、91.1%、73.9%，我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仅为51.3%^①。按照国际衡量标准，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超过70%，按此标准，我国的城市化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阶段，这对于实现经济强国目标具有战略意义。当然，鉴于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可不必追求其他发达国家过高的城市化率。

国际储备货币占比。一个国家的本国货币能被世界上其他国家作为流通、计价、结算货币，尤其作为储备货币，则无可置疑地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的集中体现。按照一般的衡量标准，一国货币能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占到4%左右，可被认为是一种国际化货币。据IMF的统计，2010年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分别为：62%、26%、4%、4%，而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还不到1%。换句话说，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比较低，国际商品市场较少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定价权非常有限，离金融强国支撑的经济强国还有较远的距离。

因此，经济强国可认为是指在经济总量、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城市化发展、国际金融等领域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经济总量、人均GDP、制造业产值、贸易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五个指标可表征一个国家是否是经济大国，可用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服务业产值占比、城市化率、国际储备货币占比这五个量化指标来表征经济强国的特征。这十个指标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可清晰构画出一个国家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当然，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内涵还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量化。比如，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实力，有学者提出可以用国际储备货币占比、FDI净流量、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等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开放度水平指数来计算，这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选取的判断经济强国的指标，既充分考虑了体现经济强国的基本内涵，又基于易于计算和便于理解的原则。

根据这一套指标体系，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双百”目标，可以明确我国建设经济强国的战略步骤和目标。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在2020年这个战略节点上，我国的经

^①我国的“城镇化”包括建制镇在内。

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占世界GDP的12%左右。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在那个时候，可以认为我国迈入了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因此，我国建设经济强国的战略步骤和目标可表述为“两步走”：第一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二步，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达到20%左右；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迈入世界前五名国家的行列；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60%左右；具有一批跨国企业与世界知名品牌；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并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达到4%左右。到那时，我们可以圆满实现经济强国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世界上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与启示

经济强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主导与优势地位的获得，是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形成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路径。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服务业产值占比、城市化率和国际储备货币占比这五项综合指标的比较，可以认为：美国、日本和德国是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回顾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对于我国抓住“两个”战略发展阶段，到2050年时胜利实现经济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5世纪以来，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这九个国家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大国^①，美国、日本和德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15世纪的葡萄牙拉开了人类航海的序幕，将海上探险和殖民贸易结合起来，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大国。16世纪的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凭借殖民美洲与亚洲所获财富，很快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大国。17世纪的荷兰依靠金融创新、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迅速确立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并替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大国地位。18世纪的中后期，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随后，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紧紧跟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强国的目标。

英国。1688年英国发生的“光荣革命”建立了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了有利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为英国持续的经济社会变革奠定了体制基础。经济自由

^①唐晋主编，2006年版，《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第1页。

主义理论的传播，为英国走上自由市场经济道路起了引导作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为英国成为贸易强国奠定了基础。英国政府鼓励技术创新，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使得技术发明与改进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直接促进了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据统计，1860年英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为19.9%，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0%，英镑成为在金本位制度下的国际货币^①。从经济综合指标来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

美国。18世纪的美国经济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缓慢发展。19世纪后半期美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促成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带动了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经济与政治格局，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的经济大国。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成为美国确立其经济强国地位的最主要标志。联合国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的建立，为美国参与和主导全球事务、实现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20世纪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半导体材料、计算机、互联网等科技革命都首先发生在美国。据统计，2011年美国GDP总量为15.0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7%。美国是世界上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2011年美国的服务业产值占比达到79.6%。美元是国际货币，是世界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

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日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为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奠定了基础。二战后的日本在废墟上重建经济，日本在面积仅为37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创造了实现国家现代化与经济强国的奇迹。日本政府重视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与扶持重点产业，为战后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注重教育，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这成为其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日本重视高效率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善于学习和利用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主创新体系。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具有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索尼、松下、丰田等一大批跨国企业和世界知名品牌。日元是国际货币。

德国。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19世纪中后期，德国首相俾斯麦以“铁血政策”使德国获得了统一，并建立了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创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德国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国接受了美国道威斯计划提供的大量贷款，积极引进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主动和苏联、美国等经济大国改善关系，使德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飞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

^① [英] 麦迪森，2003年版，《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0~95页。

成为以内燃机和电子电气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据统计,2011年德国GDP总量为3.2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3%,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是全球发达的服务贸易大国,机械制造、汽车等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拥有西门子、宝马等众多跨国企业和世界知名品牌。德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德国是欧元区成员,也是欧洲最重要、最强大的经济实体,是拉动欧盟经济的“火车头”。

(二) 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条件和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纵观这些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等暴力方式伴随着每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大背景下,依靠对外殖民扩张之路实现经济崛起已不可复制。同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走对外扩张的老路,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但是,研究总结世界上经济强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从世界上已成为经济强国的国家发展进程看,大体上说都有以下“七个重视”。

第一,重视世界历史的发展机遇。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算起,纵观在这500多年中世界经济强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与留下的经验教训会发现:每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都是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紧紧地抓住历史与现实赋予的战略发展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家借助地理大发现的巨大历史机遇,广泛进行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建立起庞大的经济版图,实现了国家的崛起。而其他没有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国家,则被抛在了后头。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意味新的发展机遇。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化后起之国,紧紧地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从而实现了经济强国的目标。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深刻的调整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掀起人类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浪潮,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我国应紧紧利用好这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雄辩地证明:科技创新在经济强国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唯有依靠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并不断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才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为先导,英国在18世纪掀起了一轮技术发明与改进的浪潮,为英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以爱迪生的发明为先导,美国成为19世纪电气革命和20世纪电子信息革命的发源地。美国建立了完善的鼓励技术创新与科技发明的体制机制,各种发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科技实力,在全球经济中独占鳌头。日本依靠技术引进及改良创新,建立了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并依靠科技的力

量迅速赶超先进国家水平。德国则非常重视基础科研与应用科学创新，正是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成为具有极强全球竞争力的行业奠定了基础。

第三，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后，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重视。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无一不是依靠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创建高水平的教育体系，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为实现经济崛起提供有力支撑与必备条件。美国是经济强国，同时也是人力资源强国，美国的高水平大学、高端科研机构的数量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迅速重建经济，其奥妙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为实现经济起飞奠定了人才基础。德国在二战之后，依靠政府对教育的巨大投入，使得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迅速得到了发展，为实现经济崛起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第四，重视城市化的持续推进。纵观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是实现经济崛起的必经之路。在经济强国崛起的过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进，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自由市场经济萌芽于城市的原始形态——城堡之中，崛起于城市的扩张与发展之中。19世纪的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庞大的铁路交通网络使得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到1861年，英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61.3%，高度城市化为英国实现经济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美国，紧紧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使得美国发展成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雄厚的物质条件支撑下，美国着力发展大城市群、合理布局中小城镇，为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战后的日本、德国着力推行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通过领导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引导产业集群与集聚等战略措施，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重视体制机制的变革。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源禀赋、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变革的体制机制有力保证，那么生产要素就必定无法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率。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充分表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变革，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无论是葡萄牙对航海探险基金机制的创新，还是西班牙对个人产权制度的改革；无论是荷兰对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的创新，还是英国“光荣革命”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无论是美国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是德国对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都有力地证明了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强国崛起的重要条件。

第六，重视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纵观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其实质就是海洋强国的发迹史^①。海洋是连接世界各个经济体的血脉和桥梁。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家的崛起

无一不是依靠海洋上力量的优势，都高度重视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都是在重视海洋强权的战略中形成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确立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18 世纪的英国，正是依仗其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了荷兰的海上有生力量，并将海洋军事、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这三者结合起来，成就了“日不落帝国”。此后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经济强国都是以海立国、以海兴国，先盛于海洋，后盛于世界。当今的美国更是重视发展航空母舰、潜艇等海洋军事力量，并积极控制海上战略要地和建立海洋战略基地，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紧紧与海洋强国战略捆绑在一起，为巩固其经济强国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七，重视扩大对外开放。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崛起。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美国等经济大国崛起的历程可以看出，开放的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国际产业结构的联动是影响大国崛起的重要外部因素。18 世纪的英国通过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开拓国际新兴市场，将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地。美国利用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并利用在国际金融、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地位，不断巩固其经济强国地位。德国和日本都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并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经济的治理，不断适应世界市场体系的变化，为国家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四、我国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机遇和挑战

总结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和启示，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借鉴意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对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世情、国情、社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正处于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中。可以说，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迈向经济强国的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和不利条件。

（一）战略机遇

战略机遇期一般是指对国家发展全局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一段时期，是有利于战略实施的历史阶段及大的背景、环境和条件。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往往是国际、国内条件发展的综合结果。从经济强国崛起的经验来看，能否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是一个国家崛

①殷克东、方胜民编著，2008 年版，《海洋强国指标体系》，经济出版社序言部分。

起的关键。客观地讲，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多，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会变，“2013-2020年、2021-2050年”两个战略发展阶段不会变，2020年和2050年这两个战略节点不会变，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与意志不会变。

从国际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增加。资本、商品、技术、信息和劳务的国际间流动正在加快，各国都在调整产业结构。世界经济强国正加快将传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向劳动力素质较好、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有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可以更多地从外部获得生产要素，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同时，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对提高我国的经济规模、扩大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有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从世界史看，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而新的科技革命必然带来新的产业革命。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主导并由此带动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形成新的科技进步浪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通过引进、再创新等途径吸收消化发达国家的一些关键技术，并大幅度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就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顺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潮流，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海洋强国等强国战略，实现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和生产力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下，欧美等经济强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经济也呈现出缓慢复苏趋势，而我国等新兴经济体率先回升，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对以美元等货币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挑战，要求对世界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为人民币走出国门，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提高我国金融的开放程度，建立发达稳健的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四，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是成为经济强国的必备条件之一。当前，虽然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维护和平、制约战争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新的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我们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改革已经迈出重要步伐。可以说，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利于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为我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提供着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从国内方面来看:

第一,我国具备更大发展的实力。从经济总量看,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外汇储备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能够抵御国际国内市场的经济风险、持续扩大经济规模与人均收入水平。

第二,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坚实。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提升,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产业体系比较完整,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取得积极成效;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保障和交通运输能力显著提高;财政金融体系运行稳健,社会资金相对充裕,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快速提高等等,都为我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城镇化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我国城镇化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化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撑,是我国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所在。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带动国内消费和投资,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聚集人力资源等,增强创新动力和能力,促进科技进步,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第四,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和国内开放政策有效发挥的情况下,我国“走出去”面临许多有利的机遇。不少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资金匮乏,与我国扩大投融资合作的意愿增强,在一些领域对我国放宽了投资的限制,使我国企业处于较有利的投资地位。我国对外开放领域正在消除部分开放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努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更加适应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规则和标准。

第五,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将为经济发开展辟广阔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民凝聚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无穷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攻坚克难,可以攀登高峰,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二) 严峻挑战

当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之路不会是平坦的。

从国际上看:

第一,世界现有经济强国的制约因素在加剧。我国在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世界现有的以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对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正在增加。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秩序红利、格局红利,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会不惜代价试图掣肘我国经济的发展。反倾销起诉、干涉中国企业的对外

投资等事件频频发生，国际贸易摩擦日渐加剧，“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贸易保护论”等大有抬头的趋势。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全球经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冲击，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发生着深刻变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调整经济结构的巨大压力。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抢占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这些必然导致全球市场争夺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更加严重，并从贸易向投资、技术、就业等各个领域扩散，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日趋严峻。

第三，外部需求短期内难以有明显好转。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有所加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发酵之中，甚至可能向更多成员国蔓延。因此，欧元区有可能出现财政金融风险与经济衰退恶性循环的局面，从而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在短时期内，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同样很难有大的改观，这对我国稳定出口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四，全球性的各种问题交织显现。近些年来，世界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交织显现，反映出现有的国际体系不能有效地应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新威胁新挑战。近年来，中亚、北非等地区政局动荡不安，气候变化等因素带来的全球生态与环境的压力，给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外部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国内看：

第一，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尽管近些年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但我国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仍然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将进一步暴露。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亟待加以解决。

第二，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偏低，产业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近些年来，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成效显著，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但是原创性的发明、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还与世界经济强国有不少差距。我国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健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不多，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还不强，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较弱。

第三，资源环境的约束日渐突出。多年来，我国走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原油、原煤、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供给制约因素在加

剧。与经济强国相比,我国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废水排放量等指标都有很大差距。同时,我国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雾霾等天气频频发生,这是对走传统发展路子的惩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第四,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比较突出,财税体制弊端凸显,税制不合理,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都有待深化。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和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在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五、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党的十八大已制定未来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要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纵览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机遇与挑战,要使我国顺利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转变,需要实行以下“六大战略”。

(一) 实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战略,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在未来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中,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持续扩大经济总量,不仅是实现经济强国的重要条件,更是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一是要努力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同时,必须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在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的目标要求,同时又提出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表明一方面要保证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在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上下更大的功夫。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改善需求结构,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良性循环。二是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四化”协调发展、良性互动。三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使其成为带动区域与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四是要把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开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为扩大经济总量提供广阔的发展

平台。五是要推动能源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革命，着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有效控制能源资源消费总量，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节约能源资源和循环经济的推动，从而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实行优化经济结构战略，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区域结构。一是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这是在十三亿多人口大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抓好的头等大事。二是要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坚持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失时机发展新兴产业，坚持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要大力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注重发挥工业在实体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加强财税、金融、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三是要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带动，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三）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是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建设经济强国的核心位置。一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二是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提高教育质量，统筹各类创新人才发展，建设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三是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四是要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政策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健全创新的法治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四）实行加快体制改革战略，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体制机制

深化体制改革，推动机制创新，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我国由经济

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创新。一个经济体只有具备良好的体制机制，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保证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交换，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一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要求，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二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三是特别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支持创新发展，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财政税收制度。四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奠定基础。五是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六是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通过加快改革步伐和转变发展方式，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五）实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着力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空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国家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战略，必须全面贯彻实施。我国有辽阔的海洋国土，实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是突破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的重要途径。建设海洋强国不仅关系到我国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而且关系到我国的国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统计，我国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我国已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海上运输通道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着力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一是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加大海洋资源特别是海底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经济强国。二是要坚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三是要有效管理、控制部分海域，提高海洋维权

执法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高海洋军事实力，建设强大的海军，为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驾护航。四是开展多方面的国际海洋合作，维护中国国际贸易的海上通道安全，以确保我国海外战略资源的利用和经济安全。五是要加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和海上执法体制建设，要强化海上维权执法协调机制。通过海洋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的保障。

（六）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我国30多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有力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我们要使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更加重要地位和更大国际影响力。在迈向经济强国的征程中，我国要进一步适应全球化新形势，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一是要创新开放模式，深化沿海开放，扩大内陆开放，统筹沿海内陆沿边开放，打造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新模式。二是要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着力打造一批世界知名品牌，支持各类大型企业和相关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三是要坚持出口与进口并重，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加工贸易从组装逐步向研发、设计等产业链高端拓展。四是要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拓宽利用外资渠道，优化外资使用结构，加强和改进对利用外资的宏观引导与管理。五是要通过壮大经济实力和资本市场，努力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成为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是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积极扩大对外投资力度，合理利用国家的外汇储备，充分发挥我国一些行业的比较优势，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七是要创新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模式，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对外援助方式，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步伐。同时，要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使我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奋力前行，实现建成世界经济强国的宏伟目标。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宏观经济 ·

推进城镇化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

吕 政

摘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任务十分艰巨。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努力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完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机制，解决好土地流转、社会保障一体化等城乡统筹问题，房地产业的发展也应当有利于推进城镇化。

关键词：城镇化 农业劳动力 户籍制度 城乡统筹

作者简介：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城镇化是伴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按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的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2%上升到2012年的52%，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37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人口总量为7亿，但是，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解决。提高城镇化水平，既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步伐，更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努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一、充分认识我国城镇化的艰巨性

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约14亿，如果届时城镇化率的目标确定为60%，城镇常住人口将达到8.4亿，比2012年增加1.4亿。扣除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后，每年仍将有12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每年约0.8-0.9个百分点，虽然转移的速度比过去10年有所下降，但人口转移的规模仍然是庞大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要不断扩大城镇人口的规模和比重，使转

移人口在城镇有稳定的工作和较为体面的居住条件，并能平等的分享城市公共产品。要避免出现印度和有些拉美国家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出现大量贫民窟和严重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既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还要形成社会财富能够公平合理分配的机制。

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大，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大量的国土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可供支配的地理空间、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也是有限的。如果城镇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完善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不过是把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内的二元结构，不过是贫困的空间位移。因此，与其把城镇化进程设想得更快一些，不如把城镇化的步伐走得更稳妥、更扎实一些，使城镇化的质量更高一些。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城镇化的必要条件。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包括征地拆迁费用在内，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已超过30亿元。如果每年转移1200万人，每平方公里容纳1万人，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每年将新增1200平方公里，需要3-4万亿元投资，相当于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这些投资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筹措。2012年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超过11万亿元，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方向上的突出问题是近10多年来主要集中于地市以上的中心城市，用于县城和县以下镇的基础设施投资显然不足，导致大、中、小城镇发展的不平衡，弱化了中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力。2001-2010年，我国城镇扩张新占用的土地面积相当于1949-1999年50年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即新世纪的头10年城镇新增占地面积比前50年城镇面积增长了1倍，平均每年增长7.2%。但是，同期被统计的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45906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0万，增长了45.9%，年均增长3.85%，人口转移的速度显著低于城镇扩张用地的增长速度，而且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并没有在城镇购房。未来10-20年，我国城镇化所需要的土地，很难再以2001-2010年的规模和速度增长。我国城镇化将受到土地供给、地方财力的制约，必须坚持量力而行、滚动开发，循序渐进的方针。

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调整了传统工业化限制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加快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显著加快，有2亿多农村劳动转移到城镇，因此，2012年被统计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2%，已超过农村人口数量。但是，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仍然是不稳定和不彻底的。事实上，城镇的户籍人口只占35%。

20世纪80-9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兴办乡镇企业吸收剩余农业劳动力，其特点是离土不离乡。当时试图通过办乡镇企业，使农民就地转移的途径，走出一

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分散的乡镇企业和亦工亦农的模式不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要求，一是，生产要素配置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上下游衔接和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基础设施不能共享，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企业使用成本；三是，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难以集中治理，导致环境污染的扩大。因此，从全局看，依靠发展乡镇工业难以推进城镇化。

20世纪90年中期以后，大批乡镇企业停产倒闭，或向县及县以上的中心城市搬迁和集中。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外出务工。外出务工农民虽然离开家乡，但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土地。农村还有住房、承包的土地和父母妻儿。由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的“离土不离乡”转变为现阶段的“离乡未离土”。转移出来的2亿多农民，离开家乡却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大多是游离于乡村和城市、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群体。他们在城市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岗位，没有像样的住房，没有纳入城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把农民工统计为城镇人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如何消化这2亿多具有二元身份的农民，使他们真正转变成市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难以绕过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农民“穿衣戴帽”进城的利和弊

所谓农民“穿衣戴帽”进城，就是农业劳动力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务工，但仍保留农村户籍，保留农村的承包田和宅基地。它的好处，一是，进城农民还拥有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当在城镇失去工作岗位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不至于成为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还能回到原籍，因此有利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二是，城市用人单位可以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特别是工商企业，由于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非农产业与种植业经济收益上的差距，使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成为可能，也是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得以维持的体制性基础。

但是农民“穿衣戴帽”进城有明显的弊端：一是，继续维持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仍然不同步。二是，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益。农民进城需要住房，但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屋需要继续保留，难以转化为城镇住房建设用地。我国农村每户占用的宅基地人均超过100平方米，城市住宅用地平均每人20平米，因此城镇化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但目前的体制和机制，难以实现土地利用的空间置换，加剧了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矛盾。三是，增加了农村耕地扭转的难度，土地规模化经营难以推进，继续保留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四是，使我国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长期依靠高度流动的农民工，难以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五是，农民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仍然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

四、努力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机会

稳定的就业机会是吸引农村人口进城的关键，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向城镇集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基础。一是，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选择，必须坚持“高也成、低也就”的方向。在推进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继续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完善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和生产经营环境。二是，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同时，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调整劳动力跨省区流动的格局，创造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向区内城镇转移的就业机会。三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城市管理要有利于扩大就业机会，为各种层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应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制止滥收费，处理好市场监管与增强市场活力的关系，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农民进城创业的体制与政策环境。四是，深化分工，发展社会化、专业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开辟现代服务业的新领域，例如现代物流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五是，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增强农民就业和创业的本领，使他们成为城镇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这是稳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的有效途径。

五、完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机制

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障碍，通常认为最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户籍制度造成的。户籍制度的改革的确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条件是取决于城镇经济发展对于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城镇化经济成本的承受能力和消化能力，取决于对既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程度。目前地方政府普遍担心放开户籍制度以后，会增加城镇就业压力，加重城镇社会保障的负担，增加城镇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压力。

改革的方向是除少数特大城市外，大多数城镇应尽早取消户籍限制，不再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创造一个自由选择的制度条件。即使大多数人可能继续选择在农村居住，但不再存在农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户籍障碍。只要自愿，随时可以到城镇安家落户。取消户籍管制以后，是否会出现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并形成新的无业游民？要不要采取经济手段设置户籍准入的门槛？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在城镇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持续缴纳失业、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且有稳定的住所的，就可以成为该城镇的市民，并纳入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做法可能使农村人口转移的步伐相对放慢，但有利于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有利于避免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既要遵循市

市场经济规律的自发自愿，也要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在没有户籍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应当是农民自由选择的过程。

还必须看到，由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和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大多数外来务工农民难以在这些地区定居，最终还将选择返回原籍。要使他们转变为市民，需要建立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基金的跨省区转移机制，即外出务工农民如果不能在务工的大城市定居，包括个人和用工单位缴纳的社保基金应全额转移到原籍市县的社保基金归集机构，并进入个人账户。当其达到退休年龄时，可以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在城镇定居。这样才有可能使外出务工农民放弃农村的承包田和宅基地。当然前提是必须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但政策导向应当积极朝着这个方向引导。

六、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统筹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际工作中，要对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必须承认，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很快就能消除城乡差别，因为消除城乡差别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是未来的远景目标。现阶段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认真解决几个突出矛盾。

第一，目前全国农村户口约2.25亿户，从农村到城镇务工的农民也有2亿多。当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以后，今后谁来种田？怎样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并确保粮食供给安全？出路是在保持家庭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耕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业机械化，降低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科学种田；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坚持以工补农和城市反哺农业的支农惠农政策。

第二，稳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利用。如前所述，农民“穿衣戴帽”进城，使进城务工农民仍然保有农村的生产资料和住房。当农民转变为市民以后，其生产资料和住房还能够继续保留吗？从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客观规律出发，已经转变为市民的农民，应当放弃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田。这样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同时也可以减少农村宅基地的占用面积，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因此需要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和有效的转换机制，处理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尽

可能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能否一体化？教育、公共卫生资源配置能否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能否一体化？即社会公共产品供给能否一体化？目前需要改变的是上述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过程中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农村社会公共事业落后的状况，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公平合理，问题是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有相应的财力做支撑。发展生产力，增强财力是经济基础，是前提条件。减少农民，促进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是提高社会公共事业建设投入与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逐步做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和均等化。

七、房地产业的发展应当有利于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要使农民转化为市民，需要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2005年以来城镇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支付能力，进城务工农民更没有经济能力在城镇购房。城镇商品房价格过高，提高了城镇化成本，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主要的原因是农民难以承受转化为市民的经济成本。目前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2000元左右，在务工城市的生活费用平均占月收入的50%，再扣除春节返乡的路费，全年净收入也只有1万元左右，还要负担农村的妻儿老小。即使在原籍的县城购买每平方米价格为3000元的一套面积为80平方米商品房，至少需要20年的以上积蓄，这是农民进城务工后难以融入城市，不得不继续保留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使进城务工农民的宅基地难以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难以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城乡统筹、总量控制、空间置换和占补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短缺。推进城镇化，必须使城镇商品房价格回归到与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相适应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2010，《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求是》第11期。
2. 张晓山，2010，《关于城镇化若干问题研究》，《农村金融研究》第11期。
3. 王振中，2012，《中国城镇化道路》，社科文献出版社4月第1版。
4. 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1月第1版。

责任编辑：刘森

· 宏观经济 ·

养老基金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

——兼论我国金融改革和养老金改革协调互动的改革发展观

刘云龙 肖志光 郑伟

摘要：本文基于30个OECD国家1980-2011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和对美英德日4个国家金融结构变迁和差异的系统考察表明：养老基金发展是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这是由于养老基金发展不仅可以分流银行储蓄、汇聚长期投资资金，而且可以促进机构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其政策含义在于：从关注养老金改革的“财政发展效应”转向关注“金融发展效应”，将我国当前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养老金红利，利用养老金改革来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和养老金融产业发展。

关键词：养老基金 金融结构 养老金融产业 金融改革 养老金改革

作者简介：刘云龙，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肖志光，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郑伟，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回眸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两大浪潮席卷全球，一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二是以人口结构转型为标志的老龄化浪潮。人口结构的剧烈转型，导致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面临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养老金改革浪潮。

全球养老金改革浪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养老金融产业（pension financial industry）迅速崛起。2011年美国养老金资产接近21万亿美元，超过130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中、日、德、英、意、法6国当年GDP的总和，美国人均养老金资产达到7.0万美元。从1981—2011年的30年间，美国养老金资产从1.1万亿美元增长到21万亿美元，增长近20倍。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工业化国家，养老金资产对GDP、银行资产的比重接近100%，出现了“养老基金新时代”、“养老金融新时代”。全球养老金改革的经济意义，远超当初基于财政压力进行财政改革的初衷，赋予了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的全新含义。

养老金融学家们对养老金改革动因、方向、结果进行了密切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文献。概括而言，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沿着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养老金改革对储蓄率、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三是人口结构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们则更多地关注金融结构、金融市场、金融发展等问题，Goldsmith教授于1969年开创金融结构研究的先河。关于金融结构研究的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结构优劣论，主要围绕金融市场“中介主导型”（即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型”（即资本市场主导）的优劣展开争论。二是金融结构决定论，讨论一国金融结构的决定因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金融功能学派”与“金融法律学派”。三是金融结构演进论，探讨一国金融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及其推动因素。

笔者认为：养老基金在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中异军突起并且后来居上，既是人口结构转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结果，也是金融结构变迁的标志。本文紧紧围绕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养老基金发展这一条主线，阐述了养老金制度差异导致养老基金发展差异进而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逻辑，挑战了金融法律学派即法律制度决定金融结构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我国金融改革和养老金改革协调互动的改革发展观。

二、养老基金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李健等（2005）将金融结构划分为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本文选取了两个衡量金融结构的核心指标：（1）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①，以衡量银行在金融中介市场的地位；（2）银行资产与股市市值的比重，以衡量银行与股市的相对地位。

①说明：由于无法获得统一的各国金融总资产的数据，本部分用银行资产+机构投资者资产作为金融总资产的近似替代指标。

此外，本文还选取了影响金融结构的3个重要因素：（1）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2）产业发展水平，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表示；（3）金融发展水平，用经济货币化程度，即M2/GDP来进行衡量。

我们选取了30个OECD国家198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养老基金资产、机构投资者数据来源于OECD《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sets》数据库；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M2/GDP、股市市值占GDP比重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银行资产占GDP比重来源于世界银行《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数据库；其他指标根据基础数据计算获得。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我们应用STATA. 11软件，分别选取相应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养老基金发展对金融结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

自变量	银行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				银行资产与股市市值比值（%）			
	混合效应	虚拟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混合效应	虚拟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1]	[2]	[3]	[4]	[5]	[6]	[7]	[8]
养老基金资产占GDP比重	-0.112***	-0.104**	-0.104**	-0.043*	-0.667*	-2.383**	-2.383**	-0.421*
	[0.0220]	[0.0497]	[0.0457]	[0.0389]	[0.462]	[1.009]	[1.157]	[0.780]
人均GDP（取对数）	-10.98***	-27.40***	-27.40***	-20.79***	-68.36**	-154.4	-154.4	-128.7**
	[1.359]	[5.611]	[4.683]	[3.245]	[22.48]	[181.4]	[115.1]	[54.77]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1.139***	-0.459**	-0.459**	-0.656***	-2.377	5.758*	5.758	1.819
	[0.140]	[0.158]	[0.177]	[0.167]	[2.668]	[3.285]	[4.258]	[3.771]
M2/GDP	0.0103	0.135***	0.135***	0.0794***	0.421**	1.871***	1.871***	0.866**
	[0.0170]	[0.0171]	[0.0166]	[0.0145]	[0.167]	[0.480]	[0.403]	[0.286]
常数项	242.3***	345.6***	344.5***	295.9***	1028.9***	1241.6	1214.9	1290.8**
	[14.27]	[49.72]	[41.72]	[29.68]	[250.0]	[1661.4]	[1067.1]	[535.9]
观测值	373	373	373	373	341	341	341	341
调整拟合优度	整体	0.534	0.855	0.2405	0.4249	0.08	0.444	0.0604
	组内			0.285	0.2583			0.0863
	组间			0.0365	0.3434			0.0122

说明：1.方括号里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5%和1%水平下显著；2.在回归结果[2]和[4]中，由于国家虚拟变量数量过多，并且不是主要关注指标，所以没有在此表中报告。

其中，回归结果[1]—[4]是以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5]—[8]是以银行资产与股市市值比重为被解释变量。另外，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别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对“养老基金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回归结果[1]用混合效应模型（Pool OLS）进行估计；回归结果[2]对每个国家设立

虚拟变量进行估计；回归结果[3]用面板模型中的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4]用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进行估计。整体上看，用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拟合度较高，用银行资产占股市市值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拟合优度较低，这可能与股市市值剧烈波动有关。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用哪一指标衡量金融结构，养老基金发展都对金融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四组结果中变量“养老基金占GDP比重”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养老基金占GDP的比重越高，即养老基金发展水平越高，无论是银行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还是银行资产与股市市值的比值都将降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基金的发展不仅导致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而且将使银行对于资本市场（股市）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也就是说，养老基金的发展推动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此外，从其他因素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影响来看：

第一，经济发展可以推动金融结构变迁。由于变量“人均GDP”的系数一般都显著为负（除第[6]、[7]组结果不显著外），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和家庭金融资产增加，导致资产选择和需求多元化，使得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下降，资本市场的作用在提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结构越倾向于向“市场主导型”方向发展。

第二，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并不明确。从第[1]–[4]组结果来看，变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从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结构有影响。由于银行只能提供“一元审查”机制，而市场能提供“多元审查”机制，在一国发展相对熟悉的传统工业时，银行的“一元审查”机制所需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银行的发展将优先于资本市场的发展(Allen, 1997)。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多元审查”将显现相对优势，从而使得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下降。但是，第[5]–[8]组回归结果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其中[6]、[7]、[8]中第三产业占比的系数都为正（虽然并不显著）。一方面该结果可能与股市市值的剧烈波动有关，另一方面可能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比较复杂，不能直接得出“商业银行作用下降则资本市场重要性上升”的简单结论。

第三，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并不必然导致金融结构变迁。从表1可知，除结果[1]以外，其他回归结果中变量M2/GDP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与传统的观点不一致。传统观点认为，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结构将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自发演进。而这一结果表明：金融结构并非遵循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自发演进的简单路线，存在复杂的演进过程；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历史趋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存在逆转的可能。

三、养老金制度差异与金融结构差异：案例研究

前面实证分析了养老基金发展从而导致金融结构的变迁。那么，各国养老金制度的差异是否直接导致养老基金发展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导致金融结构的差异呢？如果是，那么养老金制度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同时，养老金制度差异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金融结构的差异？为此，本部分选取美英和德日这两类金融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比较美英和德日养老金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和测算养老制度差异将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导致金融结构的差异。

（一）美英德日四国养老金制度比较

实际上，美英德日四国在三支柱养老金体系（system）“大同”的背后，却存在着制度安排（institution arrangement）上的“大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三支柱的相对地位有差异，美英重私人养老金制度（第二、三支柱），德日重公共养老金制度（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美国基本养老的替代率为38%-40%^①。英国为20%左右，德国和日本则达到70%^②。

第二，在启动养老金改革的时间上有差异，美英早，德日晚。美国于1974年、1978年分别建立了IRAs计划和401（K）计划，英国于1986年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推出基金积累制的职业年金计划；直到20世纪末期，德国和日本由于人口老龄化压力才开始推动基金积累型的私人养老金制度发展。

第三，在养老金税收待遇上有差异，美英力度大，德日力度小。

第四，在养老金计划形态上有差异，美英重DC（缴费确定型）模式，德日重DB（收益确定型）模式。

第五，在管理模式上有差异，美英重信托，德日重内部管理。

第六，在权益类投资比例上有差异，美英高，德日低。美国和英国养老基金主要进入资本市场，投资于股票、基金等权益类资产。

（二）养老金制度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

2011年，德国和日本养老基金资产占GDP的比重都在25%以下，而英美两国在70%以上；同时，德国和日本银行资产与股市市值之比超过300%，英国为162%，美国则低至

①王爱珠,1996,《老年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②英国、德国数据来源于《Sigma》1998年第8期；日本数据来源于田近荣治《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变：给付迅速扩大的后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1期。而且，日本在1986年改革之前替代率曾高达80%。

61%。

为了测算美英与德日两组国家养老基金发展的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幅度，我们选取美国和德国进行案例研究，基本思路为：假设两国养老金制度相同，即养老基金发展水平相同，那么两国金融结构的差异会缩小多少，从而考察养老金制度差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金融结构的差异。

为此，我们设置4个假定：（1）美国采取了和德国完全相同的养老金制度，导致养老基金规模相同，即养老基金资产占GDP的比重相同；（2）养老金制度的改变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总资产）不产生影响；（3）养老基金的资产部分来源于银行的养老储蓄，从而须将美国养老基金实际资产与假定资产之间差额的一部分划拨给银行；（4）分别考察将实际资产与假定资产差额的30%（采取权益类投资的方式来管理养老资产）、50%和70%（采取固定收益类投资方式来管理资产）划拨给银行的三种情形下，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的变化。

表 2 养老金制度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测算表

年份	德国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	美国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				两国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的差距（%）			
		实际	情形一（30%）	情形二（50%）	情形三（70%）	实际	情形一（30%）	情形二（50%）	情形三（70%）
1995	77.4	27.6	36.7	42.7	48.8	49.8	40.7	34.7	28.6
2000	73.1	23.0	31.5	37.2	42.9	50.1	41.6	35.9	30.3
2005	67.8	23.8	31.3	36.3	41.3	44.0	36.5	31.5	26.5
2010	65.2	24.2	30.8	35.2	39.7	41.0	34.4	29.9	25.5
2011	64.9	24.2	30.6	34.9	39.2	40.7	34.3	30.0	25.7
平均	70.6	24.6	32.4	37.5	42.7	45.9	38.2	33.0	27.9
养老基金制度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比重							16.9	28.1	39.3

说明：1.笔者根据基础数据以及假设条件计算获得以上数据；2.平均值为各年数值的简单数学平均；3.养老基金制度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比重=（两国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的实际差距—假设条件下两国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的差距）/两国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比重的实际差距*100%。

模拟测算结果表明：在情形一、二、三中，养老金制度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比重分别为16.9%、28.1%、39.3%；养老基金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美国和德国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将分别降低0.320%和0.119%。

从美国和德国的案例研究来看，养老金制度差异从而养老基金发展的差异，是导致金融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这样，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因为刻画金融结构差异而享有盛名的“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背后实际上是养老金发展模式的差异，即存在着养老金发展模式上的“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可以说，是养老金

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推动了金融结构上的差异。

四、对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市场化与货币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建立了具有宏观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体制，建立了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了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业发展也面临许多尖锐的困难，最为突出的是金融结构失衡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金融改革应该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养老基金、养老金融产业、获取金融改革红利，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

（一）我国金融结构失衡的现状

第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一方面，银行业的高利润率侵蚀了产业的投资回报率。2011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净利润为1.95万亿元，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总额达8750亿元，占比为45%。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实体经济发展乏力。

第二，金融结构失衡，银行业一枝独秀。2011年我国银行业资产113万亿元，保险业资产6.0万亿元，证券业资产1.5万亿元，信托业资产4.8万亿元，银行业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为90%。

第三，融资方式失衡，间接融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从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来看，人民币贷款（58.3%）和其他贷款类业务（27.7%）合计占比为86%，企业债券（10.6%）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3.4%）合计占比只有14%。

第四，流动性过剩与养老金短缺同时并存。2011年我国M2/GDP的比重为188%，养老金资产/GDP的比重不足10%。这种失衡的格局，直接带来两大不利后果：一是庞大的人口红利，表现为庞大的货币规模，导致宏观经济管理的困难。二是庞大的流动性，没有通过养老基金转变为长期投资，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很低。

第五，养老金短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一是养老金短缺不利于长期资金和机构投资者队伍发展，直接导致资本市场发展长期低迷。二是养老金短缺，迫使“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储蓄进一步固化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导致资金价格持续居高不下，伤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养老金短缺导致养老金资产占个人收入的比重、家庭财富的比重过低，导致消费需求从而国内需求提振困难。

（二）我国金融改革现有方案的局限性

针对我国金融结构失衡、融资方式失衡、流动性过剩、资本市场发展低迷、人民币国际化受阻等一系列与金融结构变迁相关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主要思路可以概括为：一是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二是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社会资金的使用成本；三是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应该讲上述三种思路既有针对性，也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以此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实施方案，其局限性很大：

思路一拘泥于银行体系框架，不可能推动金融结构的变迁。

思路二强调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来降低资金价格，确实很重要。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发展基金积累制的养老金体系可以汇聚长期储蓄，通过将长期储蓄转变为长期投资，是降低资金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讲，长期资金与短期储蓄分流，长期投资与银行借贷区分，是降低社会资金价格的“牛鼻子”。

思路三强调的是发展结果而不是发展路径。实际上，资本市场的发展，一要有好的制度，二要有优质的长期资金。没有养老金和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的进入，资本市场难以长期振兴。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我国金融改革的大逻辑在于实现金融改革和养老金改革的协调互动，大力发展养老金融产业，改变我国目前失衡的金融结构，是未来我国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养老金改革发展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基础！

（三）通过养老金融产业发展来改变金融结构的新思路

第一，金融大国的基础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一个舞台、一个平台，也可以说是一片河海，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穿梭其中，不同性质的资金穿行其中，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游走其中，才能真正改善和提高金融效率，才能有效防范和对冲市场风险。

第二，金融市场的基础是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金融市场如河海，以养老金和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是金融市场的源头活水，流动性和货币只是金融之流。将长期资金与短期流动性区分开来，开展长期投资，是降低资金价格、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

第三，养老金和保险市场发展是改变金融结构的主要力量。它们既可以分流银行的长期储蓄，又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资本市场注入长期资金开展长期投资，培育机构投资者，而且还可以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提升资本市场有效性。

第四，养老金融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后发优势。我国人口规模超过13亿，是美国的4.5倍左右。目前人均养老金资产规模不到4000元，是美国人均7.0万美元的1/100。通过养老金市场发展，我国可以积累庞大的长期资金，可以获取庞大的养老金发展红利和金融发展红利。

总而言之，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结构变迁，需要站到全社会金融资源配置的高度，跳出传统的金融框架，联通养老金市场和金融市场。单纯从银行、保险、证券、信托

四大传统金融领域出发提出金融改革建议，只能是局部改良思路，不是整体改革思路。

五、对我国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1.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1）尽快成立“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即“第二社保基金”，实现对分散在全国2000多个基层单位的2.2万亿资金（截止2012年底），进行集中、专业、市场化管理，实现保值增值。（2）尽快通过国有股减持、国有资产划拨、国家外汇资产划拨等方式，将个人账户“空账”部分做实，实现基金积累。

（3）进一步加大国有股划拨力度，将划拨比例从目前的10%提高到15%，再逐步提高到30%左右，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尽快将全国财政收入“超收”部分，全部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4）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并且尽快做到全国统筹。藉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大力发展基金积累制的补充养老保险。（1）大力推动企业年金市场发展。目前，对企业缴费部分有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扩大到个人缴费部分和投资收益部分，进一步激发企业和职工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2）尽快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覆盖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军人、教师、医生等人群。

3. 鼓励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1）尽快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的试点，并且将其覆盖农民、自雇人士、未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职工。（2）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退休者购买年金化的养老金领取产品，将个体面临的长寿风险，转移给有精算力量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的商业保险公司来承担。（3）针对“以养老为目的”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可以比照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制度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

1. 建立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完备法律体系。金融法律学派的核心观点，资本市场发展的国际经验，都表明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完备法律体系建设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为此，必须彻底改变向发行人倾斜的融资文化，强化上市企业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大力推进信托文化、股权投资文化、法治文化的发展。

2. 建立合理机制引导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容易对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造成不利影响。为此，美英等国都建立合理机制来引导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对此我们建议：（1）发行长期限的债券品种。针对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可以发行利率有吸引力的超长期国债（如30年期），既有利于长期负债与长期投资的匹配，又有利于为国家重点工程的长期建设提供资金。（2）可以尝试发行优先股。在新股

发行中，引导养老金和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获取稳定分红的投资收益。

3. 借助机构投资者和长期资金来推动金融创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工具，最初几乎都是面向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在加强监管、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我们建议：

（1）允许参与期货市场，实现风险对冲和绝对收益。（2）允许参与直接股权投资市场，分享经济增长收益。（3）允许参与风险投资市场，从推动经济创新中获益。

（三）做好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

1. 加快养老金发展的立法。建议对我国“居民退休收入保障”、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合格养老金计划”进行立法。

2. 尽快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养老金发展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税收、金融监管等多个部门和诸多事宜，为了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的困境，需要有一个超部委的管理机构来统一协调。建议成立“国务院养老金发展办公室”，具体负责筹划、指导、实施养老金发展战略。

3. 适当的时候成立统一的养老金监管机构。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由国务院成立“中国养老金监管委员会”，负责对养老金进行统一监管。

4. 适当的时候出台《中国养老金监管法》。养老金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养老金监管、养老金治理是确保养老金制度发展长治久安的核心内容，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制定《中国养老金监管法》。

参考文献：

1. Allen, Franklin, and Douglas Gale. 1997. “Financial Markets, Intermediaries, and Intertemporal Smooth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3): 523-546.
2. Bodie, Zvi. 1990. “Pension Funds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11-22.
3. Merton, Robert C. 1995.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23-41.
4. Goldsmith, Raymond William.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Vol. 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 李健、贾玉革，2005，《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研究》，《金融研究》第4期。
6. 刘云龙、傅安平，2004，《企业年金：模式探索与国际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
7. 周小川，2005，《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两点关注：养老金体制和机构成长》，《中国金融》第21期。
8. 刘云龙、肖志光，2012，《养老金通论——关于人口结构、养老金制度与金融结构变迁的一般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9. 刘云龙，2012，《养老金帝国 I——长期资本战略的百年大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0. 刘云龙，2012，《养老金帝国 II——长期资本战略的百年传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晨乔

· 国际经济 ·

“自动减赤机制”对美国经济之影响

谷源洋

摘要：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减赤”方案的立场和观点南辕北辙，难以弥合。“自动减赤机制”于今年3月1日开始启动，两党无休止的财政理念博弈，目的是刺激选民神经，利用民众舆论施压对手，把“协商无果”的责任加诸于对方，以利2014年中期选举。但事与愿违，两党在博弈中得失互见，都没有赢得绝对的优势。“自动减赤机制”生效仅是两党政治较量的开始，两党对未来9年怎样削减赤字以及如何调整“债务上限”将争斗不息，争斗焦点始终难以摆脱减支与增税的困惑，充分反映了美国开国初期就已存在的两大思想源流与治国理念之争，或者说是“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自动减赤机制”的影响业已殃及到国防和非国防多个重要领域，但由于减支规模仅占当年度联邦政府支出的2.4%，因而对美国经济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伤害，2013年美国经济仍可维持“温和复苏”势头。

关键词：美国经济 自动减赤机制 减支增税 温和复苏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预算控制法案》，其内容之一是由跨党派组建“超级委员会”制定“自动减赤机制”，规定10年内至少减赤1.2万亿美元。如果两党不能就“自动减赤机制”方案达成共识，那么，2013年初“自动减赤机制”就开始启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如何“减赤”进行了多次商谈，但其立场和观点南辕北辙，难以弥合。民主党提出的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小幅度地减少医疗保险与其他福利项目支出，以及增加对富人征税的“减赤”方案，不被共和党接受；而共和党反对大幅增税和削减国防支

出，提出的多项削减预算修法的建议，也被民主党所拒绝。

“自动减赤机制”正式启动：为避免坠入“财政悬崖”，2013年1月初两党达成了短期、临时性的妥协方案，同意2013财年约240亿美元的开支削减通过减少政府项目拨款等方式得以体现，剩余85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削减怎么办，由两党继续磋商，“自动减赤机制”启动时间被推迟到3月1日生效。然而，由于奥巴马坚持必须通过减少开支和增加税收并行方式削减赤字，要求对年收入百万美元的富人予以征税；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则说今年1月1日国会与白宫已达成了增税协议，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和收入高于45万美元的家庭的所得税税率从35%提高到39.6%，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从15%提高到20%，为未来10年联邦政府带来6200亿美元的新增税收。因此，麦康奈尔强调“美国人不会接受另一次增税”。由于两党始终找不到妥协的平衡点，各自提出的替代减赤方案均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因而“自动减赤机制”如期启动。

两党无休止的财政理念博弈，其目的是刺激选民神经，利用民众舆论施压对手，双方都想把“协商无果”的责任加诸于对方，以利2014年中期选举。但事与愿违，两党在博弈中得失互见，都没有赢得绝对的优势。实际上民主党抑或共和党心知肚明，增税或减支都会抑制经济复苏，但由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又不能不减少开支和增加税收。今年1月众议院和参议院虽然分别通过了举债授权延期法案，允许联邦政府在3月初用完16.47万亿美元举债上限时，可以继续借债以支付工资、养老金以及债券利息等各项支出，以防止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

然而，两党财政“纠结”依旧，“减赤”将成为美国两党长期的政治博弈。2013年3月1日“自动减赤机制”启动仅仅是两党政治较量的开始，两党对未来9年怎样削减赤字以及如何调整“债务上限”将争斗不息，争斗焦点始终难以摆脱减支与增税的困惑。3月12日和13日，共和党 and 民主党分别出台了今后10年的“减赤方案”，尽管两个方案都赞同逐步实现财政预算收与支的平衡，但共和党依然坚持通过削减联邦政府开支与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来实现，而民主党则依旧主张采取“减支与增税并行方式”来解决。这反映了美国开国初期就已存在的两大思想源流与治国理念之争，或者说是“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

但两党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围绕财政预算案仍在继续进行磋商。“自动减赤机制”生效后不久，参众两院就通过了临时拨款议案，让联邦政府在9月底以前能够获得运行资金，以维持政府各部门的正常工作。这一妥协的议案总体上保留了850亿美元减少开支内容，但做了一些调整，既满足了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增加国防部运作和维护预算的要求，又迎合了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对妇女及儿童营养补贴等项目的改革想法。然而，这种相互妥协只是暂时缓解了自动减赤的影响，而不是彻底消除其影响。

二

“自动减赤机制”启动的影响：它的启动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这是美国社会与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奥巴马连任后在国会山发表演说时虽曾表示“美国经济已开始复苏”，PMI等各项经济先行指标趋好。然而，美国经济仍不稳定，呈现难以预料的波动状态。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1%、1.3%、3.1%，受“桑迪”飓风、库存增长放缓及军事采购减少等影响，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速仅为0.1%，尽管此后修正为0.4%，但仍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因此，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承认美国经济复苏是一项“仍未完成的任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莫斯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也表示“美国经济距离完全健康和充满生气的全面复苏还很遥远”。

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对“自动减赤机制”启动早有应对准备和应对预案，自动减赤后既推出多种节约支出措施，包括对工作人员实施强迫性无薪休假；减少员工、缩短工时；削减对外援助^①；减少对贫困家庭的租房补贴，等等。“减赤”的后续效应现已逐渐显现，正向与政府开支关联较大的IT设备制造、航空和酒店等领域拓展，导致“航空股”承受下挫重压，以及预算紧缩持续已造成至少有30%与政府相关的华盛顿特区酒店业务收入锐减。特别是强制性削减联邦政府支出，使国防支出大幅减少，因而五角大楼审计官罗伯特·哈尔宣布，国防部将从4月开始让大部分文职官员不带工薪假期，以节约50万美元支出；美国空军减少战斗机购买数量，并减少飞行时间；美国海军舰队在未来10年可能减少约50艘军舰，等等。值得关注的是自动减赤生效后，奥巴马做出了两个举动：一是在国防开支遭削减的同时签署了放宽部分军品出口管制命令^②。根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调查，放宽部分军品出口管制可为美国经济增加640亿美元收入，并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二是自动减赤启动影响了美国民众和联邦政府人员的收入和生活，美国民众虽没有像欧洲国家民众那样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但存在情绪低落和不满。为了向遭受“减赤”影响的联邦机构人员和民众表示安抚，奥巴马主动将自己的薪金减少5%。

削减国防开支对美国军事和对外政策无疑会产生某些影响，但2014财年的美国国防预算仍高达5266亿美元，因此，不会撼动美国军事力量的根基，影响美国在世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包括美国军事力量向亚洲的倾斜与聚集。由于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上任后没有像他的前任希拉里那样首先出访亚洲，而是两次访问欧洲和中东，因而让日本等亚洲某些国家感到担忧，担心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生变。为此克里4月5日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发表了题为《21世纪太平洋伙伴关系》

①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减赤生效将导致国务院削减8.5亿美元预算和17亿美元外国援助。

②2013年3月8日。

的演讲，他将其演讲称之为美国的“太平洋的梦”，对有人产生的疑虑，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可以为太平洋地区定义为我们的梦想，这就是各个国家和人民打造一个塑造我们共享未来的伙伴关系。我们的太平洋梦想将是把我们最强的价值观移植于安全、经济和社会合作”。克里在日本的言行表明，削减国防支出并不会影响美国对亚太的全面关注和投入，继续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的既定方针。可能发生的变化或许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多管齐下的目标排序进行某种微调，也即奥巴马第一任期在亚太地区侧重于打“安全牌”，而第二任期有可能会运用更多的经济手段，进一步加强同亚洲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为加速推动包括日本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进程，美国现已开始降低标准，放宽要求，以所谓“例外”处理与一些国家提出的关切，旨在早日签署TPP，以分享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红利”。

“自动减赤机制”启动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就货币政策作证时表示，大规模自动减赤计划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不会导致市场动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联邦政府预算的大范围削减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自动减支将会被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开支削减和收入增长的计划所替代，因而强调不会影响美国的信用评级。从短期情况看，市场和投资者对“减赤”的反应较为淡定，没有引起奥巴马所说的“恐怖效应”，相反美国三大股指齐扬，道琼斯指数收复了2008年来的跌幅，标普500指数突破2007年10月9日创下的历史最高收盘点位^①。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股市攀升不是“非理性繁荣”^②，美股可能迎来“低波动时期”，美股上涨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基本面走强的支撑。实际上美股市上扬的重要原因是美联储实施的“扭转操作”计划，大规模购买长期国债，使10期债券收益率从2007年的5%降至2013年3月的1.86%。投资者为寻求更好的回报率，放弃了对债券的投资，而转向投资股市和房地产，带来了“财富效应”，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股市上涨并没有真正反映出股市是美国经济“晴雨表”。鉴于投资者纷纷逃离债市去追求股市高利润，反过来又推动10年期债券收益率重返2%以上，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抑制了经济复苏。长期国债收益率反弹违背了美联储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意图，因而迫使美联储只能继续维持“扭转操作”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支出减少和税收增加将使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缩减0.5个百分点，美国国会预算局则预测“减赤”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幅减少0.6个百分点。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为2.5%，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0.4%，但受“自动减赤机制”启动影响，3月份工厂活动指数下降，预计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将放缓，增长率可能降至2%以下。美国经济年均潜在增长率为2.5%—3%，扣除增税与减税对GDP造成的损失，美国经济

^① 2013年3月28日，标普500指数收盘报1569.19点。

^② 格林斯潘2013年3月15日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

大约只有2个百分点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春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已将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1.9%，低于美联储2%—2.4%的预期。

当前，国内外对年内美国经济走势轨迹的分析，大体有三种判断观点：一是“先低后高”走势；二是“先高后低”走势；三是“高一低一高”走势。不管是哪一种走势的判断都改变不了美国经济仍将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波士顿恐怖主义大爆炸和加州化工厂大火，部分抵销了利好因素溢出作用，使不温不火的美国经济蒙上阴影。预计今后两年美国经济尚难步入“强劲增长”阶段，只能呈现出美联储反复所说的“温和复苏”态势。所谓“温和复苏”是指美国经济既不会陷入衰退也不可能出现强劲增长的状态。

三

“自动减赤机制”后利好与利空因素并存：“自动减赤机制”将使美国经济面临长期的“缓慢折磨”，全面影响的评估尚需一定的时日才能看得清楚。但“减赤”的触角现正在逐渐浸透到国防、教育、医疗等多个重要领域，然而，由于减支规模仅占当年度联邦政府支出的2.4%，这对拥有超过15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来说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研判2013财年美国经济表现，既要看到“自动减赤机制”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同时还应看到美国经济在困境中也出现某些利好因素：

1. 金融危机爆发促使美国对其经济过度虚拟化进行反思，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重视提振实体经济，抑制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基石，经济过度虚拟化，长期依靠金融自由化积累财富，必然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和引发经济危机。过去5年间，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的同时，奥巴马倡导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与推动“出口倍增计划”。在第二任期首次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宣称，复兴制造业是其经济复苏计划的关键所在，声称要使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在这种“磁场”引力作用下，106家年销售额不低于10亿美元的海外公司中，现已有37%的公司表示正在考虑或计划把在海外的部分制造业务迁回到国内^①。美国有人高呼“制造业回家了”。

2. 美国是多元化经济体，具有科技创新的传统和精神。在世界500大企业中，美国占了174家，超出欧洲的154家，而科技产业更是美国的强项。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总开支的比例虽已由1999年的38%，跌至目前的31%，但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上研发投入金额最多的国家^②。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高科技企业继续引领经济增长，为再造类似互联网的经济增长热点，培育了多项技术创新，包括3D或4D打印以及页岩气革命、新能源产业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技术创新将成为撬动美国经济的新引擎。

^①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2 年发布的调查报告。

^②唐辉，2013，《美国国际竞争力正在复苏》，《解放日报》3月31日。

3. 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及商业化已使美国逐步减少对外的能源依存度，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到2030年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页岩气革命有助于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增加企业出口及创造企业盈利。高盛公司发布的报告认为页岩气革命重振了美国经济产业链，改善了美国经济环境，增加了就业岗位，使经济效应和政治效应同时溢出^①。非常规资源利用是能源深度开发的必然趋势，页岩气革命不仅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刺激素”，而且推动全球页岩气开发和生产进入“黄金期”。

4.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抵押贷款利率，加快房地产市场复苏势头。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估计，2012年房价上涨已让美国家庭房屋资产总额增加约7600亿美元，2013年则有望增加近1万亿美元^②。房地产业是美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其产业关联性强，银行业、房产中介、建材业、装修业、家具业、交通运输业等诸多行业都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房地产市场持续好转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美国整体经济转暖。

5.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银行借贷持续活跃，美国银行2012年第四季度净利润总额达到347亿美元，较2011年同期的254亿美元增长了近37%。2012年全年银行业净利润高达1413亿美元，同比增长19%，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上述数据表明，尽管银行业利息收入被超低利率所侵蚀，但多数美国大银行复苏迹象明显，拥有充足的资金流。

6. 美国家庭“去杠杆化”取得进展，家庭负债比率较2007年高点下降了24.5%，已基本回归1993年的水平。随着家庭“去杠杆化”趋向的结束，美国居民消费信贷有望增长，为推动占美国GDP70%比重的消费增长奠定了基础^③。步入2013年，在股市“财富效应”带动下，美国消费信心指数将持续趋于攀升。

7. “自动减赤”促使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下降。奥巴马于4月10日向国会提交了2014财年预算案，预算总额为3.8万亿美元，与上财年相比增长了2.5%，其特色是有减有增，国防和外交支出双双减少，而投资于教育、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等开支则予以增加，这种预算“加减法”折射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政策侧重点的变化趋势。预算案预期2013和2014财年预算赤字分别为9730亿美元与7440亿美元。这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财政年度赤字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预算案提出未来10年削减赤字1.8万亿美元，其实现途径是通过增税1万亿美元加上削减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开支。如果“减

① 2013年4月17日发布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俄亥俄州尤蒂卡地区页岩气开发，使该地区在2012年增加了3.9万个就业岗位，创造税收15亿美元。

② 2012年11月发表的预测报告。

③ 王捷，2013，《2013，美国经济向左走，向右走》，《国际金融》第3期。

赤”政策持续下去，那么到2016财年，财政赤字占GDP之比重将下降至3% 以下。

四

“自动减赤”将使美联储难以提前终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已实施三轮“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并把长期基准利率保持在近于零的水平。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银行业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降低了长期贷款利率、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好转、维持了经济温和复苏局面，并使美联储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根据美国法律规规定，2012年美联储向财政部上缴利润884亿美元，较2011年770亿美元增长了15%，创历史新高^①。

然而，美联储着重关注的失业率却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改善，美国劳工部今年3月8日宣布2月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创下2008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失业率从7.9%降至7.7%，4月5日发布的就业数据又将失业率从7.7%微降至7.6%。但失业数据下降的真实原因却是放弃寻找工作岗位人数增加所致。3月份非农部门新增岗位从2月的26.8万个骤降到8.8万个，为9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尚不及市场预期的一半。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指出，3月份的就业报告是“自动减赤机制”生效以来的首份月度就业“成绩单”。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850亿美元的开支削减可能带来约7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

美联储一直把失业率降到6.5%以下作为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重要门槛指标之一。但在美国公布的各项统计数据中，失业率居高难下始终是一个很难看的数据。重振制造业、扩大出口以及房地产业回暖等创造的就业岗位能否足以抵销“自动减赤”带来的就业岗位流失，目前依然是难以确定的因素。对美国失业率下降趋势，美联储给出的预测值是到2013年底失业率将降至7.4%-7.5%，2014年降到6.7%-7.05%，2015年降至6.0%-6.5%，然而，有人则认为到2020年美国制造业将创造250-500万就业岗位，届时美国的失业率才有可能减少2-3个百分点。为此，“自动减赤机制”开始生效后，美联储多次重申将继续以每月850亿美元规模购买长期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根据美联储2011年夏季制定的退出策略，美联储将通过逐步出售资产，使其资产负债表回归常态。但当时美联储并未预想到日后资产规模会膨胀得如此之快。数字显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现已超过3.3万亿美元，如果以现有速度购买资产，那么到2013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将达到4万亿美元。

美联储何时调整购债规模现已成为国内外热议的话题。概括地说美国“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走向，一是取决于就业市场能否出现持续的改善趋势；二是取决于减赤

^①美联储 2013 年 3 月 15 日公布的报告。

计划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度”。但对上述两点的认识与判断存在着差异，美联储内部意见分歧加重。“鹰派”愈益认为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中长期通胀风险，因而主张提前收紧货币政策；投资者则担忧相伴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联储可能上调基准利率，调整资产购买规模，种种忧虑引起汇股市情绪波动。鉴于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亲自出面力挺QE，宣称QE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复苏、增加汽车和其他耐用品销量、提升消费支出等，同时强调QE带动美国经济反弹势必将惠及全球经济。

由于美国经济“回暖度”不足，因而尚不能得出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接近尾声”的结论，以伯南克为首的“鸽派”年内不会给美国经济“停药”。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伯南克曾经表示过“自动减赤”计划对减少预算赤字而言是一项太过极端的方式，强调从经济复苏角度看，采取一种渐进方式会更加具有建设性。他所说“渐进方式”或许是避免大规模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而形成经济复苏的“明显逆风”。但现实状况却是自动削减开支与增加税收已经影响到就业和收入，因而美国经济不会丢掉美联储的“拐杖”，美联储也更加难以提前“收手”。但市场和投资者则认为，假若美国经济持续好转，即使美联储不提前终止QE，也不能不考虑根据就业、通胀、经济情况的变动，提前做好对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予以适当调整的准备，甚至有可能对QE进行微调，以降低QE在真正退出时冒出的风险。目前，“鹰派”声音虽然在不断增大，但“鸽派”仍占居上风，主导着货币政策。如何权衡退出时机将是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着重点，其内部争论有可能将从强化刺激转向弱化刺激。

责任编辑：晨乔

（上接第 56 页）

应加快结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总体来说，欧美自由贸易区建设和美国主导的TPP建设，反映了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不适应。美国、欧盟是中国主要经贸伙伴，如果不能较好地应对美国、欧盟发起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谈判攻势，中国将在未来的欧、美合作甚至国际经济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巩固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同时，对国内贸易企业进行分工，出口欧美自由贸易区市场的企业，加快贸易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产业标准，适应发达国家贸易规则调整，积极应对挑战。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不应将欧盟与美国启动自贸谈判视作威胁”，我们应将欧美规则的调整作为压力、动力和机遇，在新一轮贸易调整中及早谋划、应变，以保持中国贸易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晨乔

· 国际经济 ·

美欧速启自贸区谈判 中国需积极应对^{*}

陈炳才 田 青

摘要：今年2月，美国和欧盟正式启动了自由贸易区谈判。美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内容、谈判难点以及是否能够预期完成，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美欧自贸区谈判的背景和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探讨了美欧自贸区谈判的三大难点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提出了中国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应对美欧自贸区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美欧自贸区谈判 国际市场 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陈炳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田 青，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2013年2月12日奥巴马在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将正式与欧盟启动自贸区谈判工作。按照欧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将于今年6月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预期谈判在2年内完成。美国和欧盟两大地区的经济总量，几乎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一旦欧美自贸区谈判达成协议，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活力，也将重塑国际贸易、经济新格局。这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了分工和竞争并存的新时代。因此，美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内容、谈判难点以及是否能够预期完成，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要积极应对，以适应这种国际新形势变化。

一、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背景分析

（一）欧美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由来已久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2—2013 年度重大基金课题“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美欧早在1995年就签署了旨在加强双边经贸关系文件，后因美国通过带有歧视性质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惹怒欧盟而搁置；1998年欧盟又提出建立欧美自贸区构想，但美国主要精力在建立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加之双方某些谈判分歧大，无暇顾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美欧自贸区的吸引力。后经多次反复，仍难以出台。2007年双方成立了“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但谈判进展缓慢。2008年以来，被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折磨的美国、欧盟，把扩大出口、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措施。自贸区谈判提上议事日程。

2011年11月，奥巴马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共同授权设立了“工作与增长高级别工作小组”，2011年末奥巴马在总统竞选连任的“经济计划”中承诺继续推进与欧盟的自贸区谈判。2012年11月成功连任后，默克尔、卡梅伦等欧洲许多领导人力促奥巴马推动自由贸易协定。2013年2月12日奥巴马在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正式与欧盟启动自贸区谈判工作，双方此后发表了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联合声明。

（二）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双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基础

美国和欧盟两大地区的经济总量，几乎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成功，“成果几乎是无限的”。参与跨大西洋问题谈判的人，把美欧贸易合作称为“经济北约”。美国商会预计，如果美欧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双方的经济增长可提高1.5个百分点。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估算，消除贸易壁垒可能会使欧盟GDP增加1900亿欧元，美国GDP增加1000亿欧元。德国另有机构估算，如达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协议，可以令美国实现2.2%的GDP增长，欧盟整体GDP增长1.7%，德国GDP增长1.6%。美国对欧出口将增长94%，欧盟对美国出口将增长73%。两者之间的贸易更是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

（三）双方化解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的需要

对于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方面更为迫切和积极。欧洲债务危机不仅导致欧洲各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也出现内部分裂，凝聚力下降，希腊等面临退出欧元区的压力，英国甚至威胁脱离欧盟。同时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往亚洲，加重了欧洲国家的失落感和金融市场对欧洲的不信任。建立“全面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对欧盟各国克服经济困境，维系欧盟内部的团结，提升欧盟地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应对危机的举措集中在金融和财政手段上，收效有限，副作用明显。为解决失业率高，拉动经济增长，提出了2015年出口翻番计划。虽然与哥伦比亚、巴拿马、韩国等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这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谈判成果，动作缓

慢被商业界诟病。奥巴马虽然提出了TPP，取得了进展，但对贸易推动有限。英国和德国倡导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有利提振双方经济，成本也低，获得了美欧商界的一致推崇。因此，奥巴马积极推动这件事情，在正式宣布建设美欧自由贸易区之前，率先向欧方打招呼，要求欧方两年内达成协议。

（四）摆脱多哈回合谈判僵局的战略选择

欧美的贸易优势之一是服务贸易，而且发展水平接近，但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分歧严重，谈判至今无果。美国人看到，近年来贸易谈判已经分化，要么太大而不能成功，要么太小而不受重视，贸易协定的老旧模式几乎崩溃，而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证明了双边贸易协定更切实可行，但因这些国家体量不够，不能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产生明显收益。如果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成功，有利于美国贸易增长和市场开拓，有利于打破多哈回合谈判僵局，也有利于美国重新夺回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TPP在美国一些专家看来，就是一个有利于美国的“2.0版的WTO”，而欧美的自由贸易区实际是在WTO之外建立两个经济体“自己的WTO”。

（五）全球贸易和经济竞争压力下的战略合作需要

欧美看到，21世纪的10年以来，东盟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安第斯共同体应运而生，中、日、韩自贸谈判风生水起。这些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高速增长，与美欧贸易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比重迅速上升，欧美感到自己的贸易发展落后。1990-2011年欧盟和美国的全球份额分别从44%和13%下降到34%和9%，而“金砖四国”的份额则从5%上升至16%。美欧认为，新兴国家之所以得益、而欧美失利，是因为在现有多边体系下，新兴国家充分利用对其有利的商品贸易自由等便利条件，借助相对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得了对发达国家的大量贸易实惠。

欧美如何重新获得市场？寻找自己的优势，避免自己的劣势是必然的选择。实现商品零关税，彻底开放市场，以及在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农业等相关政策实行新的标准，统一监管规则，正是欧美的优势所在，双方也会有共同语言。因此，欧美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竞争及其压力下的战略合作，有利于自己的实体经济发展和贸易发展，也可以替代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其国内的部分市场。

（六）欧盟的战略调整也推动了欧美之间的合作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投资和消费持续疲软，减少贸易逆差、扩大出口成为欧盟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必然选择。欧盟委员会2010年11月对外公布了新5年贸易战略，将推动签署自贸协定作为拓展贸易增长空间的重要途径，希望至2015年与自贸伙伴的贸

贸易额覆盖其50%的对外贸易。并将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大国纳入自由贸易区战略。

欧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象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从谈判进展情况看，欧盟设定的谈判任务迄今已经完成过半，尤其在亚洲的推进速度较快，2011年以来，欧盟先后与韩国、香港、秘鲁、哥伦比亚、中美洲国家签署自贸协定，2012年12月新加坡成为第一个与欧盟正式签订自贸协定的东盟成员国。2013年3月6日，欧盟方面宣布和泰国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目前，欧盟还正在和马来西亚、越南进行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与印度、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接近尾声，与日本谈判已开始。2013年3月9日东盟与欧盟签订《2013至2014年贸易与投资合作计划》，双方重申将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联系。此外，欧盟也在积极筹划与独联体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等国，以及非洲的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的更进一步和全面自贸协定谈判。

欧盟的贸易战略调整和行动，与美国产生了市场竞争，但另一方面，也使美国认识到与欧洲在贸易合作上的重要。双方统一标准，可以重新制定全球贸易规则。

二、美欧自贸区谈判的内容、难点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分析

（一）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五大主要内容

美国—欧盟自贸区谈判高层工作组2012年6月向欧盟轮值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称，美欧自贸协定将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消除对服务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性措施；三是在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制定高于WTO现行标准的规则；四是消除或削减所有不必要的“边境后壁垒”；五是推进两大经济体的法规和标准体系的统一。其中第五项尚未在任何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中涉及。目前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仅涵盖前两项或三项内容，第五项内容从未涉及。美国、欧盟表示，谈判重点是打破剩余的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使技术规定、标准和认证变得标准化等，进而力争成为国际标准。

（二）欧美谈判的进程安排

欧美期待6月实质性谈判。今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3月12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启动欧美自贸协定谈判的授权书。欧美为谈判启动了各自内部程序，欧盟需要各成员国的授权，美国政府则需立法机构的批准。美国和欧盟已就谈判进行了广泛会谈，包括关税和内部监管问题。2月26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表示，期望双方能够推进有关自贸

区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夏天开始实质性谈判。

欧美预期2年内达成谈判协议。美欧自贸协定谈判计划于2014年完成，主要考虑到2014年现任欧盟委员任期届满，美国也将进行中期选举。欧盟贸易委员会的德古赫特表示，只要双方有强烈的政治决心，欧美之间的自贸协定最快在2014年年中就能完成全部谈判。目前，奥巴马的幕僚也正在考虑总统是否在夏天访问柏林的问题，3月中旬德国方面对来访的克里表示：这次协议不能因为氯化鸡就失败了。

（三）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面临三大难点问题

1. 航空、音视频、农产品和食品问题。一是波音和空客补贴，是欧美贸易长期纷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曾经上诉到世界贸易组织。二是音视频产业播出配额或播出补贴问题，这个问题上，欧美分歧比较大。三是农业补贴。欧盟长期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并坚持对进口农产品征收差价税，难以满足美国要求削减农业补贴和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要求。欧盟对农业补贴每年高达52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美国年度支持农业经费为110亿美元，居全球第三。四是食品问题。欧盟一贯坚持反对转基因食品，限制含激素的肉制品和肉鸡的销售。根据德国方面的统计，2012年美国88%的玉米、93%的大豆以及95%的牛肉都存在转基因种子。美国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保科斯致美国贸易代表柯克的公开信中，希望欧盟废除对转基因粮食的限制，允许对牛使用激素。这与欧洲消费者的观点南辕北辙。而美国进口食品类关税普遍高于平均关税4%的水平。因此，农业食品领域的谈判不容易。

2. 差异问题。该项谈判项目众多。谈判项目涉及农业、工业设计、卫生、食品安全、专业服务、金融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开放服务业、政府采购、交通体系、消费者数据保护等。谈判的目的是达成相互认同或提高标准、取消地方歧视性贸易壁垒的协议。如在美国进行过安全测试的汽车不再需要在欧洲进行安全测试；欧盟检测认为安全的药品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但由于美欧标准差异大，标准差异的法律体系、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不同，标准的统一或协调谈判难度大。如消费者数据保护方面，美国公司可以使用其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数据，欧洲有最低标准保护。欧洲当局声称，如果谷歌侵犯欧洲消费者个人数据，会将谷歌送上法庭。

3. 经济体的法规和标准体系的统一。双方提出的监管标准统一，对谈判是巨大挑战。一是面广。不仅有商品、服务贸易，还有投资。只有符合输入国标准、认证才能进入。二是美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监管体系，互不兼容。欧盟法律法规汗牛充栋，长达10万页之多，美国也不亚于欧盟。双方一直期望实现“贸易管理规则一方批准，两地自动适用”的设想，但17年没有解决。

国际贸易学者预测，谈判启动后，双方将首先聚焦削减贸易壁垒，然后谋求统一有

关产品技术、公共安全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监管机制。

（四）对欧美自贸区几大谈判内容的结果预测

关税谈判容易成功。目前，美国和欧盟双方之间的关税，除农产品外，已平均低于3%，可是非关税壁垒盛行。要打破剩余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将触敏感领域。如美国化工和纺织因政治原因而长期高关税。但美国商会希望免除全部关税，故可能提出交换条件，以获得利益。因此，大部分关税在谈判中会被清除。

农业谈判不易成功。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对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反对力量都很强大。欧盟预算协议规定今后7年共同农业政策支出达3700亿欧元，限制了欧盟在农业贸易自由化方面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乳制品是欧美都立场鲜明予以特殊保护的的商品；牛肉问题，欧盟处于守势，美国处于攻势；转基因产品欧盟明令禁止，而在美国正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农业谈判达成协议，也是边角地带。

谈判的突破口在非关税壁垒。人们相信，真正的谈判突破口是非关税壁垒，主要在工业产品标准和监管规定方面，制药、化工、汽车业产品的规范协调和相互认可，相对更容易。

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美国。专家认为，美欧自贸区谈判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美国。目前，欧美贸易冲突约占世界贸易争端的20%，美国务卿访欧主动表态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五）对美欧自贸区谈判 2 年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判断

对美欧自贸区谈判结果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存有不同判断，一些专家比较悲观，认为2年内达成协议有困难。但本文的分析结论较之乐观，总体判断欧美2年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1. 一些权威人士和机构对达成协议不乐观。一是认为不排除谈判搁浅的可能。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表示，美欧构建自由贸易区的需求和意向都很强烈，达成共识的前景较为明朗。然而，由于美欧在农产品补贴、高科技保护等领域分歧严重，谈判历程将不仅漫长，而且会十分崎岖，甚至不排除再次搁浅的可能。二是表示需要比2年更长时间。美欧双方在转基因食品、含激素肉制品、波音和空客补贴、农产品补贴、高科技保护、技术标准和会计制度等领域存有较大分歧，一些美国专家表示2年时间达成协议显得相当仓促。北美自贸区谈判4年，美韩自贸协定谈判6年。即使美欧贸易谈判能在6月启动，也可能要在多年之后才能实施协定。有关权威机构估计，没有3年左右的时间是谈不下来的。三是认为成功的概率不太高。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菲尔博梅伊表示，这个贸易协议达成的可能性是55：45，美国、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钟情于这个协议，但德国今年面临大选，法国态度不明朗，涉及到细节问题可能会出尔反尔。有专家指出，欧盟和美国此前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基本是小国，相互让步很少，欧美让步更不

容易，双方都需要妥协。

2. 本文认为2年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预计6月实质性谈判将如期举行。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始作俑者是欧洲，美国目前已经很主动、很积极，而且前期已经有了近2年的大量准备，预计6月进行实质性谈判会顺利实现，2年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最近3年，欧美与多个国家、地区、组织进行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积累了丰富的谈判经验，建立了成功的谈判范式 and 标准，因此，欧美自由贸易区2年内达成谈判协议，在时间上不仓促，因为已经很熟悉了，效率自然高。谈判中的一些难点、敏感问题，可以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以交换条件让步，这方面欧美谈判经验丰富。以配额、区域、时间限制等约束条件，灵活解决一些分歧比较大的难点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外界预期的谈判分歧点，不会成为巨大的障碍，不会影响整体谈判协议的达成。

三、欧美自由贸易区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和欧盟两大地区的经济总量，几乎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目前，欧美正式启动了自由贸易区谈判，一旦达成协议，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会为全球经济增长都带来活力。数据显示，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对亚洲投资的3倍，而欧洲对美国的投资是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和的8倍。一旦谈判达成协议，美欧自贸区范围将覆盖全球经济产出规模的一半，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为低迷的美欧经济注入新动力，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将产生积极影响。

将重塑国际贸易、经济格局。如果谈判达成协议，尤其是美欧自由贸易区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融合，世界经贸格局将发生转变。双边自贸协定具有排他性，对未参与协定贸易伙伴具有歧视性。欧美相关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不利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增长。因此，欧洲和美国贸易占全球市场份额会快速提高，经济占全球比重会再次恢复性上升。

将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WTO的作用将大大削弱。美欧自贸谈判工作组明确指出，未来美欧自贸协定必须成为“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在各重点领域的标准必须高于双方目前正在谈判或已签署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具体包括全面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政府采购领域给予对方企业全面国民待遇、全面消除服务贸易所面临的“边境后壁垒”等等；双边自贸协定尽管为世贸组织所认可，但其排他性、歧视性，与世贸组织的多边、开放和自由贸易精神相抵触。因此，也有看法认为，美国搞TPP和欧美自由贸易区，是抛开世界贸易组织，用多边主义替代贸易自由化，为未来全球贸易谈判提供新的指导性框架。显然，欧美自贸区将使现行的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发展中国家将被动接受美欧环境、知识产权、劳工、各领域技术标准等。

欧美将抱团夺回市场份额，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经济恢复缓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正是这种危机使两个最大经济体相互抱团，相互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促使欧美共同夺回正在日益失去的市场，稳固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这也预示着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遭受一定程度的变相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市场空间拓展将受到挤压。美欧在宣传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时直言不讳，该协定将为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制定贸易规则，也会给中国施加遵守这些规则的压力。《联合早报》发文认为，欧美自贸区与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一样，都是针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它们试图通过重新制定贸易规则，抬高贸易门槛，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拒之门外，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意志银行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是美欧联手应对中国实力提升而采取的防御性策略。当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欧美自由贸易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不同质，在外贸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短期内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影响有限。但长期看，中国外部市场的空间拓展受到挤压，自由贸易区谈判规则受到牵制，话语权将有所降低。

将对推动自由贸易恢复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客观地说，美欧自贸区一旦成功，对新兴经济体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气氛中，美欧自贸区谈判对推动自由贸易恢复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对发展中国家有利。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对其他正在进行中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产生示范效应或外在的压力，推动和加快其磋商进程。对于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国和欧洲都强调自由贸易，并致力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国内主流看法尤其是大的制造业企业都是国际化的大公司，他们都支持贸易自由化，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

四、中国应积极应对欧美自由贸易区建设

面对美欧加速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国应加快自贸区建设，加快结构调整，适应美欧自贸区建设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新形势。

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欧美自贸区谈判，以及TPP谈判等，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分工和竞争并存的新时代。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虚拟经济泡沫破裂，服务业市场萎缩，美欧等认识到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的危害，转向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提出了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等，并把发展贸易和自由贸易谈判建设作为战略调整的重要载体。原有的国际经济贸易分工格局结束，世界进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分工、竞争并存的时期，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快自贸区建设。

应尽快适应国际贸易新规则和旧规则并存现状，全面提高贸易标准。应该说，欧美建立自由贸易区，某种意义上是富人规则——高标准、统一监管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目前阶段仍然难以达到欧美国家的标准。因此，在贸易格局上，会出现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和相对低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两种标准并存的自由贸易区会持续一段时间。2001年以来的多哈回合谈判不成功也表明，美欧提高自由贸易区标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短期内很难提高贸易标准，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过程才能适应。因此，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中国主张以“东盟+3”（中国、日本及韩国）为主渠道，而美国则力推TPP，建立高质量的自贸区。中欧之间也会存在分歧。由于欧盟的高标准，中国与其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条件也不成熟。显然，不断提高贸易标准是中国不能回避和拖延的选择。

巩固和扩大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经济和贸易合作。欧美实行新的高标准贸易准则，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贸易会产生一定影响。在市场没有替代前，欧美仍然需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尤其欧美制造业的回归，以及制造业的数字化、绿色低碳、低排放的技术革命，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欧美市场的贸易份额可能下降。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市场会得到发展，因此，中国应更大力度发展新兴经济体之间，以及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合作。

加快与美欧贸易和投资合作，间接获取美欧自贸区利益。以中美双向投资为例，美国是世界第一投资大国，中国是世界利用外资大国，近几年双方虽加快了投资的步伐，但双向投资规模很小，与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和两个最大的贸易国”的地位很不相符。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约700亿美元，仅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2.6%，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的0.7%。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不足100亿美元，甚至远远低于一些小型的经济体对美国的投资，美国2.3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中只有1%来自中国。

中国与美欧要素资源禀赋以及产业层次不同，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当前双向投资规模偏小也正说明中美和中欧双向投资空间广阔。中国企业应该在结构调整中找到利益共同点，发挥各自优势，挖掘经济合作潜力，通过对美欧直接投资获得美欧自贸区资源和市场。

加快与周边发达国家之间双边合作。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和纠纷，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和矛盾激化，积极推动中韩、中澳、中加、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争取尽快取得积极进展，有效应对欧美自贸区和美国重返亚太的TPP战略。

（下转第 47 页）

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

冯 雷

摘要：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多元平衡发展中三个重要问题。其内部平衡、与经济发展需要平衡的交织关系是选择多元平衡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的重要参考因素。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 多元平衡 对外贸易 国民经济

作者简介：冯 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时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本文就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多元平衡发展的战略问题提出几点认识。

多元平衡发展战略是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对外贸易中多个具有平衡关系的战略及其相互之间的平衡发展，同时保持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多元平衡发展是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关键要素之一。多元平衡既要实现对外贸易内部的平衡发展，也要实现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二者共同构建起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与全球经济之间协调发展的基础框架。对外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包括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引进来与走出去、目标市场之间、商品结构之间、优势创新与传统优势之间以及贸易主体之间等八大平衡关系。此外，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平衡同样构成了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将重点就前三个平衡关系进行探讨。

一、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

出口的规模扩张与发展速度在过去20年中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口的业绩为我国带来了制造大国的口碑。然而，自1994年以来，出口大幅度的增长与进口缓慢跟进，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连续19年的顺差，长期积累起来的不平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贸易摩擦频繁，人民币升值压力，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的代价，都给进口与出口的不平衡敲起了警钟。从根本上讲，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发展不仅仅是贸易领域中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要求。

1. 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发展是实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战略的基点。实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我国走向贸易大国的三个阶段性节点。贸易大国地位的获得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转瞬成为持续发展的起点，实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发展战略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加以推进的内容。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贸易大国地位的实现依赖于30多年来出口贸易的增长，依赖于以国内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依托扩大世界市场占有率的发展模式。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贸易大国地位已经开始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惟一选择就是必须通过提升贸易质量，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是要通过对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对国际资源的有效利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进口与出口还应该在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层次上实现平衡。纵观世界贸易强国的贸易实践，大体保持着对外贸易与经济同步变化，实现了对外贸易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

2. 稳定出口是谋求进口与出口平衡发展的基础。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要实现出口与进口的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稳定出口的发展，为转向以内需为主发展经济战略的实施创造必要的过渡性支撑条件。为此，一方面要持续发掘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迅速调整出口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通过对优势要素的培养与整合创造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以稳定出口规模，拉动经济增长。

3. 稳定加工贸易是稳定出口的关键因素之一。加工贸易的稳步增长在当前条件下是稳定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关键环节。实现的主要路径：一是要积极地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二是要通过延长产业链在国内的拓展和增加国内采购的比重；三是要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扩张加工贸易的区域分布，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4. 发掘进口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效应是谋求进口与出口平衡发展的关键。在出

口的综合利益逐渐出现弱化的情况下，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具备了制度层面的拓展空间。一是外汇储备的规模早已不是对外贸易追求的目标，为满足国内的进口需求提供了实施的必要条件；二是设计组合政策手段，改进技术贸易体制，调整技术创新观念，鼓励适用技术进口，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基础技术水平；三是适应内需增长在规模和质量上跃上新台阶的要求，适当降低奢侈品进口的门槛与管制，重点放在那些国内无法提供的高端或品牌消费品的进口上，为消费资金进入生产经营循环开辟新的路径。

实现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发展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在三至五年内实现进口与出口在规模上的基本平衡，加大中小出口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稳定出口部门的基础，保障出口增长的潜在能力，为启动内需提供制度运行的空间；第二步，在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层面上充分发挥进口的积极作用，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充分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因素以及我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寻求突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限制，以推进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为主要抓手，实现进口质量与规模的跃升。

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平衡发展

1. 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为基础。货物贸易的发展以制造业为基础，制造业的大发展推动了我国货物贸易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已达10%左右；服务贸易的发展也需要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为基础。只有服务业发展起来了，服务贸易才能有竞争力；服务业的发展本身蕴含着巨大的服务贸易商机。

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国内市场发展的同时，适当加快服务业开放领域，鼓励外商投资于运输、金融和分销等生产性服务领域以及教育、旅游、文化和医疗养老等生活性服务领域。从制造业开放的经验来看，外资进入带来的外溢作用有助于本国企业的发展，为相关行业带来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等生产要素。引入国际竞争，为本土企业提供示范作用，也有助于服务行业标准的国际化。

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规范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合理利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一政策工具，引导外商投资于服务业以及合理的区域导向，“营改增”的试点与推广有助于创造服务行业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避免重复征收，降低服务企业运行成本，在资本运作层面上与制造业衔接。

2. 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旅游与运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强项，高端服务业占比则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基地向我国的转移，总部经济在大城市的聚集，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和贸易创造了条件。在计算机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中，我国更多地是作为

外包承接方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服务出口,较少地作为外包业务的发包方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服务。在出口与进口的平衡方面遵循着货物贸易的发展轨迹,即通过出口的增长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然后在更高的竞争力水平和产业层次上实施进口追赶、合理配置资源的战略。

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养老服务的引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而国内养老机构十分匮乏,相关行业只能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很不成熟。一方面是养老需求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养老机构,现有的养老机构服务不尽规范,消费者望而却步。适当引入境外的养老企业,以其成熟的运营模式,通过规模经营,弥补国内市场上养老服务供给的短缺以及养老行业品质结构性失衡的状况,为国内养老企业提供示范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有助于形成规范化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

3.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服务业的发展以社会分工的细化为前提,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发展服务业必须深化企业制造链条上的分工水平,大而全和小而全的企业运营模式通过市场机制逐渐会被淘汰,即使在企业集团内部,制造与服务的分工同样会为企业增进效率、降低成本、创造利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还应该通过服务业发展政策鼓励适当分离制造业本身所包含的生产性服务职能,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生存空间。

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前提。我国在人工服务提供要素方面有较强的潜力,受教育群体的规模、分布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工业聚集区、交通枢纽以及沿海区域相吻合,可以满足服务贸易初期开放的需求。

服务贸易的发展要走我国自己的路,抽象合理的国际分工模式是不存在的。应详细地制定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制定服务业标准,以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为先导,循序开放生活性服务贸易,着力吸引国际知名服务企业来华投资。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服务领域开放需谨慎,关注服务行业安全,关注服务贸易开放中的经济安全。

4.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平衡发展。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长期以来货物出口增长迅猛,货物贸易长期顺差,显示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大于出口规模,虽有增长但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货物贸易已经充分显示出了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但是在服务贸易方面,与世界上服务贸易大国或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平衡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顺应了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当前一二三次产业的结构特征表明,我国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远不是一个服务业大国。没有服务贸易的发展,没有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平衡发展,贸易大国的形象是不完整的,向贸易强

国迈进的战略目标也无法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平衡发展以国民经济结构特征和全球经济服务化的趋势为依据，在这方面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发展

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保持在我国对外贸易50%以上的规模水平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发展应该成为新时期我国贸易政策追求的目标之一。

加工贸易的历史作用在于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滩头阵地，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加工贸易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加工贸易的发展，把握20世纪末国际分工大变革的机遇也离不开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急剧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升级，我国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使得我们的贸易增长没有获得合理的贸易利益，加工贸易一方面要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还必须与一般贸易实现平衡发展。

1.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战略目标调整的需要。要素条件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最具竞争力的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工贸易以最便捷的方式实现了这一要素优势，推动了我国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进程。人口红利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式微，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目标必须加以调整，寻求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最大的综合经济利益。贸易规模的增长让位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让位于全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一般贸易的发展在这些方面是更为优越的方式。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发展需要植根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和条件的变化。

2.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发展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目标调整的需要。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加工贸易共生的经济现象。就贸易问题来看，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一方面受到外销比例规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囿于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开发，基本上都是以国际市场为主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我国劳动力要素更快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推动贸易的增长。随后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注重借助其非贸易方面的优势，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管理模式、国际渠道、企业制度变迁、品牌效应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投资目标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以我国国内市场为投资目的的分量越来越重，外资企业向我国内地转移的现象日趋明显，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模式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开始下降。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关键因素的作用开始弱化，成为推动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平衡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趋势顺应了我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内需驱动为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3.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平衡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本身的需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内容丰富，从本质上讲，是要在规模发展的基础上，以质量效益为推手发展加工贸易。一是要提升加工贸易参与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环节。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不能长期停留在微笑曲线的谷底，要顺应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优势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资本、技术、管理、人才、渠道、品牌的积累，向曲线的两端延伸，占据加工贸易链条的研发与设计，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关键生产的技术和设备，创建自主品牌和独立的销售渠道。二是要提升加工贸易的附加值。分工环节的提升必然带来附加值的提升，它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提升加工贸易附加值的关键路径之一是加大国内采购的力度，延长国内加工链条，这将有助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化。三是要在加工贸易发展中关注资源与环境问题。从优势要素的结合来看，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结果；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淘汰产业或落后产业的结果，这些产业往往会对承接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会过度消耗承接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通过制定并及时调整加工贸易发展的产业指导目录，包括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项目的产业引导政策，保障加工贸易的发展不会超出我国自然环境和资源能够承受的程度。四是要在加工贸易的发展中积极顺应国际产业转移规律，适时地淘汰落后产业，或配合“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把那些我国不具有或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调整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

4. 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推动一般贸易的发展是实现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还要积极推动企业改变业务模式，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化，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自主性。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关注一般贸易方式与加工贸易方式的平等竞争环境。就加工贸易方式而言，保税运行的特点使之较一般贸易方式具有更大的运行成本优势。应研究支持一般贸易发展的政策，借鉴、创新加工贸易保税政策的思路，给予一般贸易企业“缓缴增值税”的政策，即对一般贸易企业采购的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物品所包含的增值税部分给予提前抵扣（可以采取建立一般贸易发展基金的方式提供资金来源），使之获得与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料件保税的同等政策环境。这也有助于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采购以及在资金积累、技术创新、掌控国际销售渠道后，向一般贸易方式的转化。

责任编辑：刘英奎

TPP 与 RCEP：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新秩序下的挑战与策略

汤 婧

摘要：当前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呈现两大明显趋势，RCEP谈判开启与TPP扩大谈判逐步推进，二者所呈现的竞争态势也使得亚太区域未来的贸易格局变得不甚明朗。有鉴于TPP与RCEP将带领亚太区域整合进入新的阶段，作为亚太区域生产链中重要一环的中国，TPP与RCEP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正视TPP与RCEP的竞合关系，二者对亚太经济整合趋势所带来的冲击与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是中国政府亟需面对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亚太区域经济整合 TPP RCEP

作者简介：汤 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法学博士。

近10年来，由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推动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各国为拓展出口市场，强化国家整体竞争力，已逐渐将贸易政策的重心转为推动洽签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FTA）或经济合作协议（ECA）。根据WTO统计，截至2012年底，已有329个FTA或ECA生效实施；其中，过往10年内生效实施的协议共有229个，超过前述总数的一半；而经由FTA协议所进行的跨国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50%。

目前，亚太地区为全球洽签经济合作协议最多的区域之一，这反映了亚太地区经贸活动的日益活跃及其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从整合路径来看，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呈现两大趋势，“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架构”（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已于2012年11月第7届“东

亚峰会”(EAS)宣布启动谈判;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则持续扩大成员,迄今已有11国正式参与谈判^①。随着RCEP谈判的开启与TPP扩大谈判的逐步推进,二者所呈现的竞争态势也使得亚太区域未来的贸易格局变得不甚明朗。有鉴于TPP与RCEP将带领亚太区域整合进入新的阶段,作为亚太区域生产链中重要一环的中国,TPP与RCEP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正视TPP与RCEP的竞合关系,二者对亚太经济整合趋势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是中国政府亟需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新途径: TPP 与 RCEP 的竞合关系

TPP与RCEP这两条整合路径之间有竞有合,而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它们在推进贸易自由化以及经济整合方面,二者有着相同的目标,尤其在体系准入、成员范围和合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多重交叉;但同时,二者在谈判议题、弹性条款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本文将针对TPP与RCEP的异同(见表1)进行深入对比分析。

(一) TPP 与 RCEP 的分与异

首先,从主导国家与成员范围来看,TPP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经济手段之一。TPP谈判从2010年初启动,目前成员国已扩大到11个,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值得注意的是11个成员国中有四个东盟国家(新加坡、文莱、越南及马来西亚),使得在东盟内部有出现TPP成员国与非TPP成员国两大阵营,东盟很可能面临被边缘化、分裂化的危险。而2012年底RCEP的启动适时地增强了东盟在地区内的中心性,其成员包括了东盟10国以及东盟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将实现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二者相比较,从GDP总量来看,目前拥有11个谈判国的TPP略胜于16个谈判国的RCEP,但根据IMF的预测,到2015年RCEP以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3成,将超过TPP成为目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在人口总数上,RCEP远胜于TPP。同时,目前RCEP16国商品贸易总值占全球比重的28%,却远高于TPP的21%。

其次,从谈判进展来看,TPP自2010年3月开启首轮谈判至今,已进行了16回合的正式谈判,其参与谈判成员也从当初的太平洋4国(Pacific 4, P4),扩增到第16回合

^①日本政府于今年(2013年)3月15日正式宣布加入TPP,但仍需得到美国等若干国家的同意,最早也要在今年6月以后才能坐上谈判桌,如果日本获得批准,则TPP成员将扩大至12个。

的11国。同时，在第15回合首度制定了完整的谈判时间表，计划2013年10月完成谈判。而RCEP尚未制定出详细的谈判时间表，仅仅提出2013年初正式展开谈判工作，目标是在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前达成谈判。由此可见，按照推动自由贸易体制既定的议程而言，TPP因条件大致已设定，且规则内容与谈判时间表较为具体明确，其对于RCEP有“先发制人”的时间优势。但是由于TPP在四年的谈判时间里两次错过谈判结束日期，久拖不决的症结使其2013年结束谈判计划充满变数。但是，从谈判基础而言，RCEP是在“东盟+N”的架构上而建立，东盟早已和中、印、日、韩、澳及新西兰制订自由贸易协议，RCEP比TPP更有优势。

第三，从谈判议题来看，TPP所涉及的议题范围广而深，其目标是要构建一个高标准经贸集团。因此，TPP偏重于新议题的规则及制度问题，谈判议题除包括货品市场进入、跨境服务贸易、技术性贸易障碍、知识产权、投资、政府采购、食品安全检验及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原产地规则、纺织品与成衣、贸易救济、商务人士暂准进入等传统FTA贸易议题外，还包括合作与能力构建、电子商务、环境、金融服务、竞争政策、电信与劳工等FTA新兴贸易议题，谈判范围将会涉及到国内经贸制度与会员之间的衔接，这已远超过WTO旨在降低关税的内容范围，所以又被称为“WTO plus”。相较于TPP的高标准，RCEP的议题更为集中，以传统议题为谈判重点，主要包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与技术合作（含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争端解决等）。除此之外，RCEP更强调根据参与国的不同发展水平，给予其适当的开放与调适弹性。其中，除在尽可能符合既存“东盟+1” FTAs的情况下，给予会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额外弹性外，更将透过技术协助与能力构建条款，帮助RCEP中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完全参与谈判、履行RCEP下的义务，并得以享有RCEP的具体利益。

综合来看，TPP与RCEP的分与异使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并非分庭抗礼。两种路径整合成功的可能性虽各有变数，但由于RCEP的标准设定比起TPP更为弹性化，容许发展程度较落后的成员国设置关税例外措施，以及较长的过渡期，同时其加入条件也比强调高标准、高质量的TPP来得宽松，因此相比较RCEP比TPP更为实际、可行；但由于RCEP谈判包括开放水平较低的印度，且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谈判进程也将面临很大挑战。TPP和RCEP的进程谁更快，将决定最后的成败，二者之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两种途径并驾齐驱为亚太国家提供亚太和东亚两个合作框架，使得区域内的各国能够自由选择，且彼此间形成的良性刺激作用能够加速两种整合路径的推动进程。

表 1 TPP vs. RCEP

	TPP	RCEP
成员范围	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墨西哥、加拿大	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名义GDP（万亿美元）	2011年：20.7（29%） 2015年：24.4（30%）*	2011年：19.9（28%） 2015年：26.2（32%）*
人口（十亿）	0.66（9.4%）	3.4（48%）
商品贸易（全球比重）	21%	28%
谈判进程	2010年3月启动，已进行了第16回合，预计2013年10结束谈判	尚未设置谈判时间表，计划在2013年5月举行第一轮谈判，2015年底则完成谈判。 现已成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等3个工作小组，并已分别召开工作小组会议。
谈判议题	贸易自由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劳工标准与环境等其他议题；	贸易自由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技术合作、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方式
谈判模式	单一许诺（single undertaking）方式：申请加入的国家需要同所有成员国进行“一对一”谈判，并接受TPP的相关条款，完成所谓「一步到位」的高质量FTA的谈判签署工作。	由东盟提出协议文本，六国分别根据本国能够接受的对外开放程度（对部分经济落后的东盟成员国区别对待，实行特殊政策），讨论最终是否在协议上签字。

数据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October 2012 database；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Database；* 代表IMF的预测。

（二）TPP 与 RCEP 的合与同

第一，TPP与RCEP有利于亚太区域内贸易规则的统一以及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目前，在亚太地区内同时存在数个自贸区协定，该局面说明本地区经济合作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各种双边与多边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签署协定中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多重交叉，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使自由贸易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尤其对东盟成员国来说，一方面，各国已在东盟区域贸易协定这一平台下达成了多个“东盟+1”FTA，另一方面，各国还积极推进本国双边FTA的签署（见表2）。由于区域内双边自贸区交叉重叠，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可能会面临不同的关税税率、降税步骤以及原产地规则，由此出现歧视性的贸易自由化。错综复杂的规定使得企业要根据不同产品填不同表格或者利用不同的自贸区优惠待遇，导致企业运用这些优惠待遇的成本大幅增加，该局面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由区域经济整合所带来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因此，TPP与RCEP的诞生，促使在较小的区域内几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将有助于解决当

前FTA规则过多，调和操作不易的现状，以减少目前这一局面的复杂性，提高目前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质量。就原产地规则而言，TPP与RCEP均主张建立客观、合理、透明的规则制度。如RCEP将调整各种“东盟+N”模式的原产地规则，并引进横跨多国供应链相适应的“累计方式”，以解决所涉及的跨国生产的产品面临的优惠关税差异问题。这对于有效搭建区域内生产网络和强化区域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整合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2 各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情况汇总表

	FTAs	WTO	TPP	RCEP
文莱	Y (16)	Y	Y	Y
柬埔寨	Y (10)	Y	---	Y
印度尼西亚	Y (20)	Y	---	Y
老挝	Y (12)	Y	---	Y
缅甸	Y (11)	Y	---	Y
马来西亚	Y (25)	Y	Y	Y
菲律宾	Y (13)	Y	---	Y
新加坡	Y (36)	Y	Y	Y
泰国	Y (25)	Y	---	Y
越南	Y (17)	Y	Y	Y
中国	Y (26)	Y	---	Y
韩国	Y (31)	Y	---	Y
日本	Y (23)	Y	---	Y
印度	Y (33)			
澳大利亚	Y (21)	Y	Y	Y
新西兰	Y (19)	Y	Y	Y
美国	Y (14)	Y	Y	---

说明：（1）Y代表“加入”（数量），---代表“非成员”；（2）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该国已经签订或正在洽谈的双边FTA；（3）数据来源：ADB ARIC Database; US FTAs (WTO网站)。

第二，TPP与RCEP有利于各成员国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以及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从全球来看，WTO经过几轮多边贸易谈判，缔约国关税已有大幅度的削减，世界货物贸易市场大部分已经开放，而服务贸易自由化刚刚起步，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同时更面临诸多贸易障碍。服务市场的开放，因此成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主要议题。可见，除关税外，TPP与RCEP可以做出改变并发挥最大潜在利益的领域在于“服务贸易”，它是亚太区域贸易一体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缩小区域内个成员国内部经济差距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更大范围FTA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这要求TPP与RCEP需制定合适的、具有较高质量的规则 and 标准方能发挥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一直是发达国家在双边及诸边协定中重视的

领域。美国主导的TPP更是要求成员国高度开放本国服务业市场。例如，在服务业开放承诺方式上，TPP采用了美国一直倡导的“负面列表”的方式，列出同意开放的部门类别，摒弃了WTO所采用的“正面表列”的方式。在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上，广泛涵盖了服务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1）原则性规定，如非歧视性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原则等；（2）市场准入，不限制服务提供者数量、不得限制服务交易或者资产总值、不得限制雇员人数、不得限制特定法人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3）禁止要求服务提供者在缔约一方设立营业据点；（4）相互承认服务提供者的专业资格认证；（5）政府监管法规适用与发展的透明化；（6）许可规范内服务业领域的资金支付与外汇转移。这些规定都体现出TPP追求的是服务贸易更大幅度的自由化。相比而言，RCEP更多以发展中国家为考量，提倡适当开放服务贸易，并赋予发展中国家较长的过渡调整期。但无论是高标准的TPP还是较为灵活的RCEP，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阶段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可能到来的区域合作的新框架。

第三，TPP与RCEP有利于推进各成员国国内改革的步伐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TPP与RCEP在关税、非关税贸易措施，以及与贸易投资有关的边境内（behind the border）议题，如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制度性安排，均涉及各国境内法规制度的调和（harmonization），即形成深度整合。当前东亚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越南等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后，即将或者已经进入改革瓶颈和攻坚阶段，尤其在国企改革方面困难重重。国企资本实力雄厚，对GDP贡献很大，尤其在能源、矿山、电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国企的特殊地位和绝对优势使得国家培育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开放政策大打折扣。TPP与RCEP两条整合路径给这些国家一方面提供一个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经济的最佳平台，另一方面二者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能够给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增添压力和动力。另外，TPP与RCEP视为在各个成员国间形成的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承诺，将对成员国国内经济政策产生深入而广泛的影响。成员国想要达到TPP与RCEP设定的较高标准，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

二、TPP 与 RCEP 对中国经济福利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TPP与RCEP福利对比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多数学者针对TPP对中国经济福利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多数基于一般均衡模型（CGE），且对于TPP不断扩大成员的发展趋势以及相关模拟情景设定等方面的考虑略显不足，但是基本结论一直明确显示出TPP对中国经贸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若将CGE模型以及模拟情景设定进一步完善，并针对TPP与RCEP进行对比分析，那么结论会有哪些变化？美国学者Peter A. Petri等根据TPP与RCEP中各成员国间已实施的FTA调整模型中的关税假设，并

根据TPP的谈判进展、和谈判议题不断扩张等情形，全面将关税减让、服务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等多种影响因素纳入福利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中。但遗憾的是，有关投资、劳工、环境保护、竞争政策条款等重要因素，尚未纳入该福利分析中，同时，由于TPP与RCEP协定的具体条款仍未形成，导致计量分析的情景假设在现实的经贸活动中并不一定成立，这些因素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福利效应分析结论的有效性，但至少为决策者面对复杂多变的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路径提供了一个选择参考值。

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3），TPP将在2025年前为参与国创造740亿美金的收入，其中美国可得到240亿美元的收益。但对于中国，目前加入TPP的时机尚未成熟，排除中国的TPP，若整合成功会使得区域内的贸易关税降为零，导致参与协定的部分亚洲国家产品挤占中国在美国的出口市场份额，中国因此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将达210亿美元。相比较，RCEP如果最终达成协议，所创造的收入远远胜过TPP，16个成员国总收益将达6440亿美元，其中中国可得到2970亿美元的收入。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对RCEP成员的出口与其他RCEP成员之间的贸易多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RCEP对非成员国美国的出口基本上不产生冲击。这也可说明，为何在2012年在美国与东盟国家峰会上，美国对东盟国家力推RCEP的举动表示谅解，并认可RCEP是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中的一环。

虽然目前TPP对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不及RCEP，但上述研究也提及，如果日、韩、印尼、泰、菲等五国均加入TPP，TPP的利益将会与RCEP接近，达到5000亿美元，其中，美国收益更高达1080亿美元，日本也可得到1290亿美元的收入，而对于中国的损失却更大，有高达84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但该收益损失远远不及中国加入RCEP所带来的2970亿美元的收入。从上述经济利益的简要分析，TPP与RCEP的竞合，也等于是美、日、中三国的区域经济战略的竞合。对此，更优化的目标是融合TPP与RCEP，形成亚太自贸区（FTAAP），这样将使各方获得最大的收益，美国收益约为2670亿美元，中国收益更是达到6780亿美元。

表 3 各国参加 TPP/RCEP 国家收入情况（2025 年，10 亿美元）

	2025年	TPP（11）	TPP（16）	RCEP	FTAAP
美国	20273	24	108	0	267
中国	17655	-21	-84	297	678
日本	5338	-1	129	96	228
韩国	2117	0	50	82	129
印度	5233	-1	-7	91	-30
东盟	3635	50	218	76	210

数据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报告，Peter A. Petri1, 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综合比较来看，RCEP更符合中国参与区域整合的战略利益：（1）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TPP所确立的涵盖服务贸易、投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等内容的高标准条款，中国在中短期内无法满足加入条件，难以面对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2）在WTO框架下各国制成品最惠国关税税率基础上，TPP谈判中制成品关税税率下调的空间非常狭小，而中国的出口优势又集中在制成品而非服务贸易等领域。（3）从建立多元化的出口市场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不断提高针对亚洲市场的出口份额，从而降低对欧美传统最终消费市场的依赖。（4）日本从过去很长时间对TPP态度摇摆不定到近期高调加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亚洲更多的国家最终加入TPP，中国会因此受到更大程度的贸易转向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以及排他性效应的影响。因此从中长期来看，RCEP会刺激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快速增长，在美国、欧洲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以东盟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成为中国出口重要的支撑。

三、中国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对策

TPP与RCEP的竞合对中国与亚太国家增进经贸合作形成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参与亚太区域整合的重大机遇，其影响是双面的，既对中国区域合作战略产生一定的冲击，也对中国进一步推动东亚一体化建设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与TPP相比较，虽然RCEP更具弹性化和灵活性，但其目标始终是促使东盟+6成员国之间的商品与服务流通更加便捷与顺畅，实现更广泛的、高品质的区域整合。就商品贸易而言，其成员国的出口利益集中在货品及农产品出口，零关税待遇预期将成核心工作，但其零关税的比率至少也会在9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要加入RCEP区域经济整合，必须积极开放市场、加速贸易自由化，这也是中国应对亚太区域贸易整合新挑战的必然政策方向。

具体而言，对策措施需要达到以下三个效果，才能使中国加入RCEP时为中国带来可见的利益。（1）要针对国内经济环境，有利于让产业角逐国外市场，并吸引有竞争力的产业进驻国内市场，有效支撑加入区域经济整合带来的经济利益；（2）化解RCEP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市场开放压力、产业调适等各种国内阻力；（3）寻求RCEP内的制度设计，强化中国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统一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等议题。

（一）以中日韩 FTA 为突破口，积极助推 RCEP 合作机制的构建

要在2015年达成RCEP“一揽子”协定，关键在于RCEP中七成员之间现在双边谈判中逐一取得共识。特别是中、日、韩三国面对更大的开放难点和压力。目前，中日韩分别与东盟10国签署了FTA，良好的现实基础并未推进三国的有效整合，而是形成各自的10+1局面，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因此，构建“中日韩FTA”是推

进RCEP的关键突破点。虽然中日韩三国已生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预备会议计划，但经济方面的掣肘力量与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使谈判面临重重阻碍。对此，中国应依“从易到难”的原则，先主动推动中韩FTA的谈判。目前，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韩自贸区建成，经估算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将增加277亿美元，超过日本，这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压力。原因主要在于日韩在电子、家电、汽车等产业具高度重合性，面对中国市场，日韩出现竞争态势。日方会因担心失去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而积极参与三边FTA谈判。可见，中韩先启动FTA谈判，与启动中日韩三边FTA谈判并不对立，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如果在两年时间内中韩FTA和中日韩FTA可以在谈判进程上先行完成，那就对RCEP的建成有推动和示范作用。

（二）采取更开放的谈判战略，注重 RCEP 品质、谈判议题的把握

中国应采取更开放的谈判战略，对加速自由化的效益有正确认知，才能在未来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谈判中得到FTA对象国的同样开放市场的互惠待遇和认同。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过程当中，中国议题的选择可弹性、作法应务实、管道要多元、谈判分阶段。针对部分议题需要针对谈判策略详细设计和规划，如贸易救济措施、原产地规则等也可以针对中国有利的方式加以争取。中国也要考虑FTA的对象与品质，不能抱持有FTA总比没有好的心态。同时，要把握好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中产业开放的谈判原则，并非只有一个全面性的FTA才能达到效果，而是要在部分关键产业取得成果，对中国的利益就有显著的增进。

（三）加速国内经济自由化建设，推动经贸制度安排与国际接轨

在TPP与RCEP竞争性驱动的影响下，面对必须开放的挑战，中国需要的不是片断的经济开放要求，而是需要中国自身经济自由化的全面改造。由于推动经济自由化政策通常都会遇到国内既得利益团体的阻碍，参与国际区域整合、与国外签署FTA是化解此种阻力的有效方式，也是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关键一环。此外，内部产业政策方向的引导及投资更重要，不仅要培育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更要积极协助相关优势产业进行全球布局、产业升级及调整产业发展高附加价值产品，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更要打破不合时宜的众多垄断事业，政府应检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并进一步松绑，同时加速经贸法规制度改革与调和，不断完善劳工、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才能顺利参与到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与国际制度接轨。

（四）全面评估各项区域经济整合的经济效应，规划完整的产业冲击协助措施

中国政府应先行评估各项区域经济整合协定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产业级别分类，可分成“超敏感”、“敏感”与“一般”三个级别，针对不同级别逐项确定市场开放程度。“超敏感”产业要重点保护，“敏感”产业可适度保护，“一般”产业应提高开放度。切不可将在“敏感”度以上的产业都列为例外，这将会影响贸易自由化促进公平竞争而产生的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导致总体福利收益减少而削弱中国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协定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因此，应尽量少设置例外，以保证区域经济整合框架下各国最终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更大收益。针对“超敏感”与“敏感”产业，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争取较长的过渡期安排，利用过渡期加强对自身产业、贸易与金融结构的监控、调整与优化，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另一方面，先行拟定弱势产业的补贴及救济政策，例如设置产业转型基金与贸易受害补助方式，从而降低这些弱势产业因参与区域贸易整合可能产生之负面冲击。

综合而言，目前在区域经济整合的大背景下，各国彼此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相互给予贸易自由化的互惠待遇，已是全球的主流趋势。中国要在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构建中积极争取公平贸易机会，同时必须有开放市场的准备与承诺。开放市场措施不但可协助中国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行列，获得进入国际市场取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能逐步的开放市场，更可以减少国内产业因为突然开放而可能承受之冲击；国内各产业界因为开放措施所激发出来的动态调整能力，则是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与整体经济资源做更有效的利用与配置的动力，对于国家整体竞争力必可产生向上提升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Das, Sanchita Basu. 2012. “RCEP: Going Beyond ASEAN+1 FTAs.” ISEAS Perspective, 17 August.
2. Petri, P. A., M. G. Plummer, and F. Zhai. 2011.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119.
3. Fukunaga, Yoshifumi, and Ikumo Isono. 2013. “Taking ASEAN+ 1 FTAs towards the RCEP: A Mapping Study.” No. DP-2013-02.
4. 沈铭辉，2012，《透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个比较分析框架》，《拉丁美洲研究》第3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征信体系项目建设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发展

林钧跃

摘要：金砖五国政府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将会逐步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征信系统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开展业务工作所依赖的重要基础设施，应该使用自主的技术进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是征信体系及其运行环境一齐建设的方法，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作为咨询项目推介给受援国，从根本上解决受援国市场效率和市场秩序问题。金砖五国应该发挥各自所长，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办好，中国比较全面地掌握社会信用体系的相关技术，拥有10多年的体系建设和运行经验，应该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征信系统 征信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

作者简介：林钧跃，中国市场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013年3月26和27两日，“第五届金砖国家峰会”在南非德班举行，峰会取得了一系列震动世界的成果。在峰会发表的《德班宣言》中，五个金砖国家政府就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新开发银行”）达成了一致，自此拉开了改变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序幕。

新开发银行的基本宗旨业已明确，它将为金砖国家、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并作为对全球增长和发展领域的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在具体职能方面，新开发银行将建立外汇储备和应急基金，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有效保障成员国之间的资金流通和贸易往来。另外，新开发银行将制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放贷和投资规则，支持受

援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受援国的工业进行中长期投资。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或财政困难时，除了可以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之外，也可以向新开发银行求助。

在性质与作用上，新开发银行是一家政策性的国际金融机构。但是，它不同于亚洲开发银行或加勒比开发银行这种地区性金融机构，它是一家跨越洲际的金融机构。毫不夸张地说，新开发银行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成立的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机构，它的职能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并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相类似的作用。但是，新开发银行不应被视为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对手，反而应被视为是对现有的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当然，自1946年开张以来，世界银行一直由美国掌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在传统上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美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制定游戏规则，建立起一整套国际金融秩序，并在向受援国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输出普世价值观。

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诞生了新的一极，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多极化。这一举措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符合金砖五国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可以预见，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着不同的政治目标，很有可能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形成。在如何对待受援国问题上，新开发银行不会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充当“国际资本交通警察”和“价值观输出者”的角色。

金砖五国政府决定为新开发银行注资1000亿美元的原始资金，各国是根据各自的外汇储备情况和经济总量比例原则出资的。据有关机构的统计，金砖五国共有近4.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中国为3.2万亿美元，俄罗斯为5600亿美元，巴西为3500亿美元，印度为3000亿美元，南非为400亿美元。从各国的外汇储备及经济总量看，中国的两个总量都是最大的，中国政府因此允诺了410亿美元的出资额。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均允诺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同意出资50亿美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比例应是根据各国的经济状况、资金能力和出资意愿确定的。因此，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

在话语权方面，如果新开发银行依据理事会成员国出资额的大小决定其话语权的现行国际惯例，中国出资逾四成，获得相应比例的话语权和投票权应在情理之中。中国向新开发银行注资的比例最大，是新开发银行理事会成员之中的领头羊，权利和义务都必定与之相符。因此，中国负有“经营”好这家政策性银行的莫大责任和义务。不论新开

发银行的经营团队如何组成，总部设在哪里，我们都可以预期，能否将这家国际金融机构成功运营，中国肩上的担子应该是最重的。

新开发银行即将开始运营，它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尽快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例如本息回收率和不良贷款率等，主要经营指标要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类指标可比。新开发银行的业务系统建立、特色新业务设立和赶超计划等一系列问题很快就将摆在新组建的经营团队面前，其中包括受援国的政经情报分析、信用风险控制和内部信用评级等保障系统的设计和设施建设重要问题。对于新开发银行的理事会成员国来说，不见得各理事会成员国都能意识到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但作为大股东的中国应有所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建设性方案，这既是对新开发银行展示负责任的表现，更是“中国理事”高瞻远瞩和高素质的体现。在可行性上，设计和建设上述系统是理事会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将此事办好能让各理事会成员国取得共赢的效果，应不存在原则上的争议。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数十年来，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商业银行都在使用征信系统和内外部信用评级方法，主要用于筛选客户和支持授信决策，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美国邓白氏公司（D&B，1994）在其著名的函授培训教材《信用和财务管理》中就提到过，横贯北美的铁路建设是依靠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及其分析增加，为征信服务提供了市场。赵以邺提到，中央银行建立和使用公共征信系统（包括贷款登记系统）支持授信业务最早始于德国，德国中央银行在1933年就建立起了公共征信系统。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西欧多国的中央银行建立起公共征信系统。^①在我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97年开始研究建立贷款登记咨询系统，并于2006年实现了全国联网运行。同年，人民银行总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也初步建成，并实现了全国联网运行。^②由此可见，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具备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内部作业都需要征信系统的支持。

对于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来说，公共征信系统是用来解决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通常，由中央银行建立和运营公共征信系统，向全国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会员单位提供企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世界银行专家Jerry Caprio Majnoni说：传统意义上，征信系统能够有效地筛选出合格的信贷申请人，以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为例，一家

①赵以邺，2010，《法国和德国企业征信系统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征信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②叶天华、费宪进等，2010，《企业征信系统信用信息拓展研究》，《征信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平均放贷率为60%的商业银行，在得到了公共征信系统提供的信息支持之后，能减少大约30%的违约风险。^①由此可见，征信系统对于一国的金融安全，特别是银行系统的安全和效率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征信系统不仅仅能对银行的授信业务提供支持，当它拥有了一国全部企业的信用档案及其动态变化情况之后，它就成为能够预测和深度分析受援国经济稳定性或国家信用风险的经济情报系统。另外，征信系统还能为中心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新旧《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内外部信用评估提出“强制性”要求。但是，正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玛格丽特·米勒在2004年5月举办的“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这样说，尽管她鼓励各国建立和使用征信系统。鉴于征信系统在经济情报方面的作用和信用信息的敏感性，很多国家对公共征信系统的应用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鉴于包括公共征信系统、私营征信系统、银行内外部信用评级系统在内的大征信体系对各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世界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1997-2001期间，世界银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部门，对全球的公共征信系统和私营征信系统做了若干年相当深入的摸底调查，并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若干国家的征信系统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玛格丽特·米勒曾在上述国际研讨会上介绍过这项研究的情况。

新开发银行是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性质相同的政策性银行，银行内部需要建立一个先进和高效运行的征信系统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内部征信系统不仅能支持授信决策和经济情报分析，还能够采用技术手段检测受援国的征信体系运行效果，让系统起到“准监管”作用。建立那种完整的征信体系和运行状态的评估工具。^②在新业务支持和开发上，新开发银行可以借鉴世界银行的做法，重视受援国的国家征信体系建立健全问题，在技术和方法上对受援国“授之以渔”，提供给受援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作为新开发银行设立的一项业务，可以考虑向受援国和任何有需要的国家提供设计和建设征信系统乃至征信体系的技术咨询和施工监理服务。

在征信体系的设计和建设方面，中国采用了征信体系及其运行软环境一齐建设的方法，即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林钧跃，2011）。《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探索》一书汇集了十数篇文章，说明这种模式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征信体系，而且能避免拉美式的征信系统运营低效率或失败^③。美国个人征信局—Equifax公司的副总裁

① Jerry Caprio Majnoni 2004 年 9 月在北京举办的“征信体系公共政策：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对话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② 林钧跃，2013，《城市信用体系完善程度和运行效果的指数评测方法》，《征信》第4期。

③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编，2012，《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探索》，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William R. Phinney 2004年介绍该公司是怎样设法帮助拉美国家改进这种状况的^①。中国应该向新开发银行提供社会信用体系设计相关全套的技术和方法，在技术上支持它的研究部门，使之尽快形成对受援国的一项咨询业务，也研发出检测和评估受援国征信体系功能优劣的工具。这样做还会为新开发银行建立起业务特色，形成赶超其他政策性银行的潜力，这对提升金砖五国的经济情报分析水平有利。对中国来说，这还是输出制度性文化的机会。

三、金砖国家征信系统建设和运营现状

五个金砖国家各自国内都有征信系统在运行，但是五国在企业征信技术、个人征信技术和信用评级领域的技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建设经验各有长短，系统运行的效果也不相同。

在征信市场的发展方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巴西的市场上就出现了征信服务^②。巴西市场上主要有4个征信系统在运行，分别采用公共、私营和行业合作式的运营模式。巴西的中央银行有相当丰富的公共系统运营经验，它的信用信息登记系统（CRC）始建于1998年。巴西的行业合作式的征信机构Serasa和SPC分别建于1968和1956。巴西最主要的私营征信机构SIC建于1974，现在由美国的征信机构控股。在巴西的征信体系中，不论是公共还是私营的征信系统都使用了美国人提供的技术，不仅有美国的艾奎法斯特（Equifax）和邓白氏等专业征信机构参与其中，美国花旗银行（Citibank）也有专家团队为巴西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各种征信数据库和数学建模技术咨询服务，关键技术不见得掌握在巴西人手中。

在印度，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国会动议是在1998年提出的。2002年，印度政府财政部和央行开始联合建设公共征信系统。印度的公共征信系统名为“信用信息局（CIBIL）”，下设企业征信局和个人征信局，它们分别使用了美国的邓白氏公司和环联公司的设计和技术^③。也就是说，尽管印度以计算机软件人才一流而闻名于世，但征信技术并不完全掌握在印度人手中，甚至连公共征信系统中还留有美国征信机构的股份。

在金砖五国之中，南非市场上出现征信服务的时间更早。大约在100年前，英国殖民者就将征信服务带去了南非。美国个人征信局之一的环联公司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

① William R. Phinney 在 2004 年“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的以“私营征信系统与公共征信系统关系”为题的发言。

② Kumar, A. 2002.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in Brazil. The World Bank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30858).

③ 祁红、张宏宇、彭宇松，2010，《印度征信体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征信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第 157-163 页。

入南非（拉尔夫·索里斯，2004）。但是，南非的征信市场并不很发达。南非的公共征信系统—国家贷款登记系统始建于2000年底，由南非的中央银行负责运营，向比较广泛的会员提供征信服务。在南非的金融市场上，一家名为CompuScan的征信机构在提供企业和个人征信服务，它是在1995年建立的，主要向南非、纳米比亚和伯兹瓦纳小贷微贷公司提供征信服务（Frank Lenisa，2004）。

俄罗斯的征信系统建设更是滞后，2006年俄罗斯的公共征信系统才开始建设。但是，俄罗斯的征信立法却是先行的，自2004年12月起，俄罗斯的国家杜马陆续颁布实施了《联邦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等三项征信相关法律，覆盖了企业征信、个人征信、金融征信和信用信息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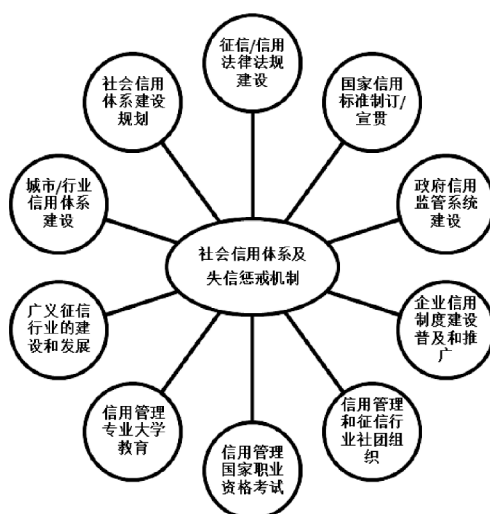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模式示意

在五国之中，中国的征信体系设计和施工没有依赖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而且中国还创新出了征信系统与其运行软环境一齐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模式（见图1）。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理论是在1999年提出的，中国政府是在2003年宣布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经过10多年的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发挥出了巨大作用。社会信用体系使得信用工具投放系统的功能愈加完善，达到了扩大市场信用交易规模的目的，金融类信用工具的市场投放和商业信用类的企业赊销规模都数十上百倍地大规模增加，保证了银行系统的内外部信用风险控制措施满足“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另外，中国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为核心的大征信行业，形成了包括企业征信、个人征信、信用评级、信用保险、保理、信用担保、商账追收、市场调查等行业分支的大征信行业，在市场上提供了门类齐全的征信报告产品、量化信用风险度量和预测系统、信用管理软件产品和信用管理咨询服务。将中国设计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经验加以总结，不难发现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赶超发达国家的征信体系建设方式，奥妙在于这个模

式强调征信体系与其运行环境一齐建设，而且让二者相当协调地齐头并进，这便能产生出征信体系高效运行的效果。按照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这种模式去建设征信系统，征信系统就可以运行在适宜的市场环境之中，征信系统的工作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而且不太会产生社会问题。中国式的征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能发挥增加市场信用投放、信用风险控制、诚信道德教育和政府信用监管功能（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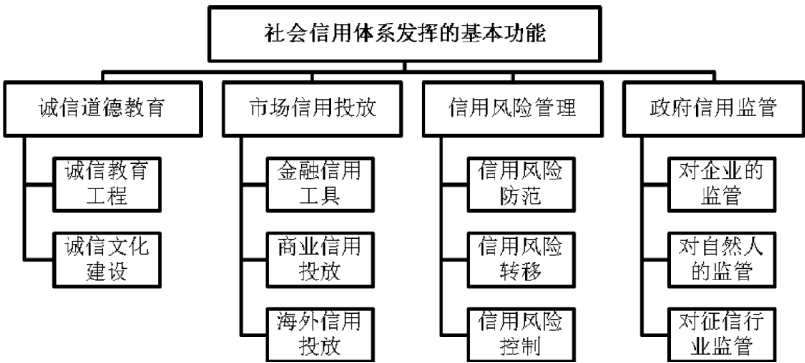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信用体系应该实现的基本功

中国的征信行业分支林立，拥有全面完整的建设经验，还有统筹各类资源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征信技术方面，中国拥有征信数据库系统设计、企业征信量化指标开发、个人信用评分建模、征信体系评测技术等。中国在征信体系相关的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管理理论建设、信用管理大学教育、从业执照考试、国家信用标准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等领域是世界领先的。在城市信用体系设计、政府信用监管和企业诚信评价等方面，中国更是领先的探索者。因此，不论是新银行内部的征信系统建设，还是向受援国推广社会信用体系模式，中国理应发挥关键作用，也是最有能力发挥作用的成员国。

在信用评级领域，中国的技术比较全面，量化评级技术在开发之中，而且颠覆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新评级理论和方法也有考虑。中国拥有10多年的国家风险评估经验，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甚至也能提供国家主权评级服务。

当然，新开发银行的五个理事会成员国在内部征信系统建设方面，中国也应该与新银行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共同合作，取长补短，让各成员国的长处得以发挥。

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授信决策系统的征信支持问题

一旦新银行开张，细节便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组织机构设立、经营团队组建、设施设备建设和业务设置都是新银行即将面临的“细节”。对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银行是一个后来者，固然可以学习和借鉴先行者们的经验，但因新银行的政治和政策目标不同又不能完全照搬，更何况还须在“业务”操作和管理的技术水平上使自

已尽快成熟，并尽快地在经营效率和效果方面赶上那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在另一方面，金砖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政治与经济差异，各国在政治体制、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差异较大，对外战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且与欧美国家的关系紧密程度不同。所以，新银行在建设和业务开发上需要寻求共同可接受的点，形成互补互益关系。

征信系统将是新银行需要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一个有效运行的征信系统对新银行的成败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征信系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征信系统是指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它的最基本功能是解决授信和受信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用于采集信用信息和分析客户信用状况，具有事前防范来自客户的信用风险和做出正确授信决策（包括授信与否和决定授信额度）的作用。银行建立和使用狭义的征信系统是为了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在筛选、评估、贷后跟踪、发现潜在风险等方面做出正确的决策，直至项目完成，收回贷款。广义的征信系统可以被称为“征信体系”或“大征信系统”。根据信用管理理论，征信体系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即所有能够帮助银行防范、转移和控制信用风险的风险防范系统组成。具体而言，最大的征信体系应包括企业征信、个人征信、信用评级、诚信评价、信用保险、信用担保、保理、商账追收、市场调查等子系统。新银行的业务操作所需要的征信系统功能大于狭义的征信系统功能，却小于广义征信系统的功能。

对于新银行来说，它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业务操作规则，需要提供信息和支持决策的征信系统。具体而言，新银行的业务部门需要内部的征信系统提供受援国的国家风险评估、受援国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负责慈善或救援项目实施单位（组织和机构）的征信、援建项目的施工单位筛选和评估（内部评级）、对受援国经济发展潜力的评估和预测、项目信用保险等等。仅以受援国的国家信用风险为例，就有10多种风险因素存在（见表1）。因此，新银行若要对项目做出正确的评估，绝对需要一个大型的征信数据库来支持决策系统和各类评估系统。这个体系最起码需要企业征信和信用评级两个子系统，用以提供最基础的组织机构信用调查、组织机构信用评级、国家风险评估和预测等几类决策信息或成品报告。

表 1 国家信用风险因素示意

政策政局风险	所有权风险	经营风险	转移风险
革命 颠覆 骚乱 侵略 制裁	国有化 政府干预 政府征用 强行收购 强行修改或废除合同	进出口限制 税收政策变化 价格控制 外国雇员控制 劳工罢工 不公正待遇	汇率 资本利润返回 利息 技术转让 酬金额度限制

新银行处于筹备阶段，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还没有确定。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下设职能部门，它设有行政管理部、政策发展与检查部、货币汇兑事务部、法律事务部、财政事务部、对外关系部、研究部、秘书部、统计部、司库办公室、语言局、计算机服务部、IMF学院。如果新银行有类似的组织机构设置，除了专事内部管理的行政管理部和秘书部、语言翻译和学院之外，其他部门都需要使用征信系统。

新银行应该重视征信体系建设问题。首先，鉴于征信系统的经济和政治的情报系统特征和敏感性，新银行应该依靠自己股东的技术力量，解决自己的征信系统设施设计和建设问题。作为新银行大股东的中国应该有条件承担新银行征信系统的设计和建设问题，因为中国在公共征信系统建设方面有10年以上的经验，企业征信行业、信用评级行业和信用保险行业出现得更早，而且征信产品和服务基本上门类齐全，在大多数领域的技术水平在五个理事会成员国之中是最高的，IT和计算机设备制造也是最好的。

五、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设立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咨询特色业务

纵观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公共和私营征信系统，更提不上建立国家的征信体系了。一些国家即使建立了征信系统，鉴于运行环境建设的滞后，征信系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市场上的失信惩戒机制依然没能有效地建立起来，甚至征信系统本身的运行都处于不畅或停摆状态。但是，除了世界上极个别的非市场化国家之外，拥有一个有效运行的征信体系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

如前所述，世界银行向来是重视征信系统建设问题的。世界银行不仅专门建立部门研究这个问题，还出资援助一些亚非拉三大洲的若干个国家建立征信系统。由此可见，帮助受援国建立征信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显然是新开发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应该设置的业务。但是，当初世界银行只是雇佣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征信机构组合负责设计和建设系统，例如美国的邓白氏公司（D&B）和环联公司（Trans Union）联手在世界上各大洲替一些国家设计和建设征信系统；英国的益百利公司（Experian）替东欧和亚洲国家提供征信系统建设技术服务；美国的艾奎法斯特公司（Equifax）在拉丁美洲提供同类服务；美国的费埃哲公司（Fair & Isaac）为全球的征信系统提供量化技术服务。现如今，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依然关注世界各国的征信系统建设和运行情况。但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设计和施工单位局限于征信系统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没能提供运行环境改进的方法，致使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征信系统运行效果不佳。

既然世界银行扶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征信系统，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就不能忽视这一点。新开发银行应该发挥理事会成员国的优势，将“升级版”的社会信用体系设计、建设和运行作为一项咨询服务项目提供给受援国，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征信系统运行水平或填补空白，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效率得到提高，市场交易的秩序转好。作为一项业务

或政策，新开发银行完全有可能比世界银行做得更好。当然，在提供这种咨询服务和设施建设的交钥匙工程的同时，新开发银行也极有可能在新银行和各受援国之间形成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有利于自己的征信系统更好地发挥经济情报功能。

六、结论

征信系统是新银行开展业务工作所依赖的重要工具，是一项必不可缺的基础设施，但它具有经济情报系统般的敏感性，新银行自身的征信系统应不会交予发达国家的征信机构提供设计和施工。在理事会的五个成员国之中，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水平是最高的，体系设计、建设和运行的经验也是最丰富的，中国应该帮助新银行设计和建设征信系统。

作为政策性银行应该重视的业务，新银行应该向其受援国提供设计和建设征信体系的先进模式，即“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展示出真正扶持受援国的诚意。作为新银行大股东的中国，应该向新银行推介中国升级版的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帮助新银行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设计和建设的咨询服务项目，让新银行产生出经济效益和政治影响。在这一点上应该很容易与新银行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国达成共识，让中国和其他理事会成员国取得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2013，《德班宣言》3月27日。
2. 林钧跃著，2003，《社会信用体系原理》，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3. 玛格丽特·米勒编，王晓蕾等译，2004，《征信体系和国际经济》，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4.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编，2004，《“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5. 国际金融公司编，2007，《信贷登记机关知识指南》（内部资料）。
6. 石晓军、刘宇，2008，《征信体系的巴西模式及国际实证比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7. 北京大学 ACOM 金融信息化研究中心译，2008，《日俄个人征信相关法规汇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8. 林钧跃，2011，《社会信用体系：中国高效建立征信系统的模式》，《征信》第2期。
9. Stefano Stoppani，2007，《征信机构发展：国际趋势与最佳实践》（国际会议发言）。
10. 拉尔夫·索里斯，2004，《南非征信局有关情况》（国际会议发言）。
11. Lenisa, Frank. 2004. “Credit Reporting by Micro Lending Institutions in South Africa.” Speech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责任编辑：晨 乔

领先市场培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徐梦周 吕 铁

摘要：领先市场形成是一个国家建立并控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关键所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更要树立起领先市场培育的战略意识。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市场培育面临着创新产品价格劣势、企业需求开发能力劣势、创新产品转移和出口劣势以及区域非竞争市场劣势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市场培育的可行路径，具体包括强化用户基数、提高互补性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创新商业模式，以及培育基于渠道控制的市场势力等。

关键词：领先市场 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设路径

作者简介：徐梦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

吕 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技术和市场是产业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国务院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强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两大基础，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许多研究已经指出，除了技术创新外，长期稳定而广阔的市场需求也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Romer(1990)认为，新技术的产生主要是在市场利益驱动下追求新技术之最终赢利的结果，新技术的生产量是由新技术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的。Murphy等(1987)认为，由于现代产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落后经济体在跳出“贫困陷阱”的过程中，市场需求规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规模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10AJL008)。

的市场需求不仅能够带来企业规模报酬递增,而且会诱导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Schmookler(1966)提出的“需求拉动”假说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导向变化、有效需求规模与意愿支付能力是促使微观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推动新产品和新产业兴起的最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重技术轻市场的问题一直存在,在一段时期内还实行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导向。从目前来看,这种发展思路已延续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工作中,市场需求开发的严重滞后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许多重要行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便呈现出传统产业般的疲态。典型的例子是光伏产业。随着大量资金投入到制造环节,我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全球光伏产品的生产大国,太阳能电池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国内光伏发电市场的发展却极为缓慢,光伏产品主要以出口为主。对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中国光伏产业在遭遇美国“双反”以及欧债危机后陷入严重困境,库存积压、价格大幅下跌,大量企业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境地。这种现象的反复出现提醒我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巨大潜在市场空间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有效培育和充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应该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战略。

进一步还需要认识到,大量的新兴产业确实发轫于高端市场,而不是低端市场(柳卸林、高伟,2012)。因为只有存在足够规模的收入处于增长阶段的消费者需求和对高价格的新产品有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研发活动等高级要素投入才有可能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进而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实现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张杰、刘志彪,2007)。另一个事实是,在本土市场获得成功但在全球市场遭遇失败的创新设计比获得全球性成功的创新设计多很多。例如,Minitel的在线系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法国迅速扩散,但并没有被其他的国家广泛接受,而因特网在20世纪90年代却成为全球标准(邢小强、王玉荣,2010)。这就表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树立起领先市场培育的战略意识十分重要。

二、领先市场的战略意义及其支撑要素

一项成功的创新设计在被国际市场广泛接受之前,通常首先被一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继而才被其他国家所采用。如北欧首先采用无线电话,并引导无线系统的国际扩散,最终形成全球移动电话的标准;而美国则首先采用个人电脑,且IBM、Microsoft、Intel的创新设计已经成为全球个人电脑的主导设计。对于北欧、美国这样首先采用某项技术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将其称为“领先市场”,而对随后采用的国家或地区则称为“后进市场”。很多时候领先市场并不一定是技术的发明地,但却为主导技术的商业化提供了最适宜的市场环境,并使主导创新不断发展完善并最终扩散到其他市场。

（一）领先市场培育的战略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般都具有高、新技术的特征，这些产业能否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实际上并不仅仅依赖于创新技术的先进程度，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创新技术是否符合用户或消费者的要求。当今条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上升的研发成本以及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意味着即使再先进的技术也需要以商业化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从创新激励的角度来看，领先市场的形成首先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收益回报补偿空间。通过需求增长、成本下降、价格趋于合理，进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内生激励机制。更为重要的是，领先市场能够让市场内企业处于领先位置，先行获得各种优势，如学习能力、质量提升、建立分销渠道系统、品牌忠诚、产品线的差异和长期市场份额（Robinson和Fornell, 1985）。

领先市场的战略意义还远不在此。从国家层面来看，领先市场的形成是一个国家建立并控制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所在。全球价值链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对基于全球需求市场的产品价值链所创造的利润的控制与分配格局。在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如果仅仅具有对产品价值链的核心技术环节的控制力，而不具有对产品终端需求市场的控制力，则并不能实现对其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研发投入活动的补偿与收益，以及对其背后所隐含的更为关键的利益分配的控制力和主导权（张杰、刘志彪，2007）。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所采用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恰恰是忽略了发达国家对终端市场的控制意愿和控制能力。以市场份额为目标的跨国公司会利用在技术和市场上的先发优势，占领和控制国内外市场，并且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挤并原有企业、阻止新企业进入，努力将本地企业纳入其生产加工体系，使自身获取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为维持其垄断地位提供了更大程度的保障。

（二）领先市场形成的支撑要素

Beise（2001）认为，支持领先市场形成的国家和地区通常需具备五大优势：一是价格优势。价格的大幅下降是大众市场出现的一个重要特征，价格下降来源于规模经济或是要素价格的变化。Scherer（1992）指出，当传真机在日本市场获得成功后，日本制造商获得规模经济和较低的价格，进而能够成功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二是需求优势。三是转移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背景增加外国用户对一项国内偏好创新设计的可察觉收益，那么这个国家就具有转移优势。四是出口优势。五是市场结构优势。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厂商可以更快发现潜在的全球性需求。在以上五种优势中，价格优势、需求优势和市场结构优势支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特定地区的商业化，转移优势和出口优势主要影响主导技术的全球扩散。Walz等（2009）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领先市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高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的需求；高人均收入；对产品有

高质量要求并乐于采用创新产品的用户；供应商可以实现快速学习；具有测试新产品的条件；具有问题驱动的创新压力；创新导向的政策。

另外也要看到，尽管领先市场具有较多优势，但是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持续性。在制度、产业、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领先市场地位也将可能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Beise（2001）总结出可能存在的四种情况：后进国家在工资成本方面的差别较高；关于旧技术的经验相对新技术的有用性较低；与经过改进的旧技术相比，新技术起始生产率较低；当新的经过改进的新技术与旧技术相比生产率优势较高。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市场培育面临的主要困难

领先市场的建设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形成技术的本土市场优势；二是将该优势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各国都把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突破口，能否把握机会谋求领先市场决定了未来各国在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利益格局。通常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都偏弱，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通常是引进国外成熟的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尽管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言所呈现的技术差距相对较小，但是原有的产业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发国家对领先市场的建构。具体而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先市场培育主要面临以下困难：

（一）创新产品价格劣势

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一般产品由初创走向成熟，然后才能走向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创新的重点也逐渐从产品创新转向工艺创新。但是，后发国家的创新活动由于有先发国家的引导，起初主要是致力于降低生产成本的工艺创新，然后逐步培养出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产品创新能力，最后培养出独立地提出新的产品和技术理念的能力（郭熙保、文礼朋，2008）。传统产品在我国能够以低成本生产得益于国内成熟的生产配套体系和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但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一是产业链并不完整，除原材料缺乏外，很多零部件也难以找到本地供应，大多依赖进口。特别是很多发达国家出于战略考虑，并不愿意出售相关零部件及相应的生产机器和设备。二是在新兴产业的生产中，我国劳动力优势并不明显，很多产业所需的高端人才也是从国外引进，需要外国专家顾问的帮助。虽然创新产品的价格通常都居高难下，但受以上两个条件的制约，我国很多创新产品的价格远高于国外同类产品，由此形成市场推广上的价格劣势。

（二）企业需求开发能力劣势

从需求发现再到产品开发，企业通过生产适合本土市场特定偏好与需求的产品，

就能够占据一部分附加值更高的细分市场，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创造更多的价值。Day（1994）把市场营销能力看作一种整合过程，旨在运用集体的知识、技能和资源来解决市场相关问题和创造优异的顾客价值，具体包括市场研究、管理营销渠道和顾客关系、识别并对竞争对手行动做出快速反应、顾客知识与顾客获取等能力。不同于简单的产品销售，市场营销是企业通过有效而快速的流程和活动来配置组织资源以满足顾客需要的潜能，反映了生成和整合市场信息的能力，甚至被认为是企业实现其公司创业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往我国多为后发市场，企业可以充分借鉴国外同类产品的市场推广经验，另外国内市场的旺盛也让很多企业的市场营销停留在产品销售。这一点使得我国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市场需求开发劣势。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发达国家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层面都在产品需求预测、市场化路线上作了大量研究，并以示范、体验为核心开展需求开发引导。更应注意的是，各大汽车跨国公司都在积极组建联盟以推进配套设施建设和产品商业化等工作。相对而言，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市场需求开发上往往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这种情形下，市场需求不能引致创新，创新也不能推动需求，特别是国内有限的高端市场需求还将面临国外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张杰、刘志彪，2007）。

（三）创新产品转移和出口劣势

领先市场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创新能够实现全球扩散，但这一点比本土市场开发还有难度。一是由于不同市场的差异化需求所引致。本土市场是当地企业的管理者所熟悉了解的市场，由于历史、文化、语言、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本土市场与在位企业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互动。这就意味着一旦市场需求以某种形式向外界传递信息，本土企业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张国胜、胡建军，2012）。而在本土企业和国外目标市场之间，存在市场隔层，对于微观企业来说，无法有效及时地洞察外部市场的消费特征与需求结构，市场隔层会制约企业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驾驭不确定性、组合潜在资源、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二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封锁策略所导致的。发达国家对本土市场需求的高端环节牢牢掌控，并以专利标准、贸易政策等构建起国外竞争者的进入壁垒。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在进入国外高端市场时，都遭到了各种“围追堵截”，包括设计封锁、技术封锁、市场封锁等，光伏产业如此，新能源汽车也如此。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很多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启动各种示范运行和验证实验项目，形成了市场领先之势。凭借知识产权控制、市场渠道控制、经营控制和建立企业间合作联盟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形成了较强的国际市场势力，从而获取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额利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国企业不仅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单一，而且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力也堪忧，更谈不上掌握国际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制定。

（四）区域非竞争市场劣势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对于需求的敏感性更高。Parente和Prescott（1999）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垄断权力遏制了技术的扩展和发展，进而造成落后。很多情况下，“大而不倒”的市场竞争特点让很多企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市场上处于被动的跟随策略，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强。Hobbs等（1992）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结构的相关研究做了一个文献综述，发现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着不完全竞争，且更多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在我国，政策制定者对新兴产业发展核心能力的认识或多或少也存在理解的偏差，比如将技术能力和创新意愿的不足归结于企业规模过小。路风和封凯栋（2005）指出，这实际上是政府部门为政策失误和被扶持大企业的无能编造规模神话。目前来看，我国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大量人为造成的市场进入壁垒和市场竞争限制。即使是在光伏产业等一些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产业中，也由于牵扯到大量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而显得竞争不足。尚德、赛维等大幅亏损的光伏企业捆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其背后反映出国内市场还是一个基于规模而非技术优势的竞争淘汰机制，仍然关注的是重点企业而非市场环境。当这些重点企业享受垄断地位时，往往缺乏创新动力，当从外国引进技术的成本比本国自主研发要低时，更倾向于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利用市场优势坐享其成。

表 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市场培育面临的主要困难

主要困难	成 因
创新产品价格劣势	产业链不完善、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劳动力优势不明显
需求开发劣势	缺乏市场需求预测和微观需求引导能力
转移和出口劣势	异质性需求差异、跨国公司市场封锁
非竞争市场劣势	基于规模而非技术优势的竞争淘汰机制、大型国企占优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市场的培育路径

早期用户和大众用户对产品需求的差异使得新兴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会呈现出创新设计的“鸿沟”（见图1）。原因在于，早期采用者与大多数用户对产品的关注点不一样。以操作系统为例，早期用户通常都是大企业和研究机构，他们对计算机的性能和程序的稳定性要求较高，而普通用户对程序的易操作性和功能的快速发布要求较高。一个创新产品即使能征服早期用户，但并不等于就能够让大众用户接受，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鸿沟”。而这个鸿沟能否跨越所涉及到的便是一个主导设计的问题。主导设计是一个产业发展从混沌走向稳定的分水岭。主导设计并不是技术、设计最优，而是市场最为广泛接受的产品。典型如电脑所使用的QWERTY键盘，早期打字机很容易卡键，设计者特意

设计很别扭的键盘降低打字速度以减少卡键，在消费者逐步熟悉之后，这种并非最优的设计便成为了市场上的主导设计。同样，Rosenhioom和Cusuman（1987）也发现，松下公司的家用录像系统按照技术性能来衡量不一定比索尼的大尺寸磁带录像系统好，但它最终成为了主导设计（谭劲松、薛红志，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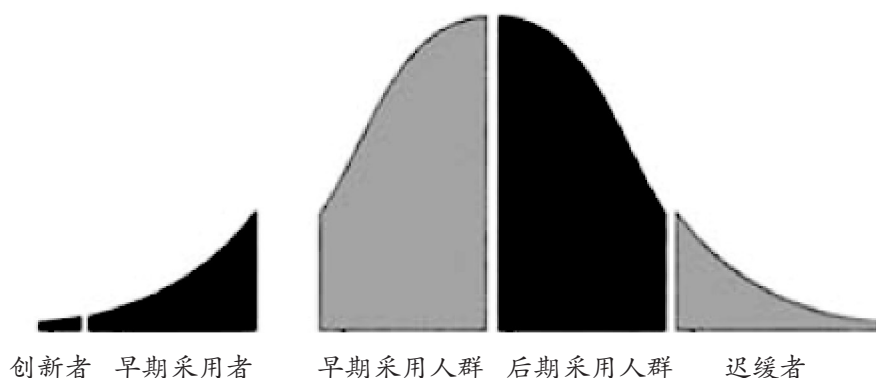


图1 创新设计的“鸿沟”

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先市场能否形成的关键就在于本土企业能否克服种种困难形成产业的主导设计，实现以产品为基础的价值领域过渡到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领域。根据已有研究的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先市场培育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

（一）利用用户基数实现自我强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具备了独立的具有一定高端需求容量的本土市场空间，才能实施“自主独立”的产业发展战略。然而，大多数普通人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更多地是采取观望的态度，因此新产品要获得市场认同，就需要具备独特价值，而这种独特价值的发掘和实现是基于特定的人群，这类人群即是创新设计的用户基数。尽管创新设计可能适用广泛人群，但在其应用早期仍然应该更加聚焦自己的潜在消费群。由于网络效应和转移成本的作用，用户基数是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企业应当利用这点，尽早进入市场，形成初始用户基数的规模优势和声誉优势，特别是能否获得声誉优势是从小众市场走向大众市场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初始用户的评价和看法就构成了重要影响因素。相比早期用户，在后期采用者的宣传中过分强调技术和功能性并不可取，因为后期用户往往是实用主义者，技术好并不一定会吸引消费者来购买，要更多追求用户体验的便捷性和消费习惯的协调性，形成消费者“当前状况下的最佳购买选择”心理体验。

（二）互补性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

互补性产品的可得性程度影响了消费者在不同设计之间的选择（谭劲松、薛红志，

2007)。若没有相关的互补性产品(如计算机和软件、录像机和录像带以及打印机和墨盒),很多产品对顾客而言用处不大或者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为什么人们倾向于用安全性较差的Windows而非安全性极佳的Linux,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Linux支持的应用软件很少,用户使用起来不方便,这也是目前互联网企业纷纷推出开放平台的原因。谁能够拥有最多的第三方应用,拥有更多的支持力量,谁就更有可能成为市场领导者。如苹果手机的App Store。在App Store模式出现之前,运营商在手机中预装软件是推广手机软件的最佳途径。这是因为,一方面手机用户很少自己下载程序,另一方面,原来的手机多采用封闭式平台,并不允许用户自己安装软件。而App Store模式出现后,手机软件的销售模式根本改变,从厂商预装到自由销售,极大减少了手机厂商的软件成本。App Store模式使手机也能像个人电脑一样,在出厂时只装上基础软件,而其他个性化的软件由用户自己购买、安装。App Store在价值链中,既吸引了大量的第三方开发商,开发商利用这一平台将产品直接推向用户,从而建立起一个直接的销售渠道,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的各种需求,iPhone不再是简单的手机,而转变成一个良好的功能体系平台,使其可直接面对客户。除了产品之外,相应服务的可得性也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极大提高创新产品的价值。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相比传统汽车随处可得的加油服务,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少之又少,这直接降低了产品使用便利性,也降低了用户的消费欲望。

(三) 商业模式创新

多年来我国的研发活动均以技术水平为创新导向,注重了技术参数和指标的先进性,却忽视了技术成果转化,缺乏将新技术推向市场、实现盈利的完整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由四个密切相关的要素构成:客户价值主张、盈利模式、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创造新的市场或者在已有市场上获得新机会。如果从广义上来看,无论是用户基础强化还是互补性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都属于商业模式的范畴,但是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商业模式四大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即盈利模式。它是“企业如何在为客户、商业伙伴等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获得收入和利润”,主要活动包括成本控制、有效定价、收入获得等。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其盈利模式包括设计收益来源和完善成本结构。其中,收益来源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取收入的手段。收益来源越丰富,表明产业的盈利模式越有效。在设计收益模式的同时,也要注意成本结构的优化(荆浩等,2011)。

(四) 基于渠道控制的市场势力培育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既有以产品研发占优的跨国企业,也不乏沃尔玛这样的销售渠道的控制者。这些企业既没有技术优势,也没有生产优势,但却在国际市场和产品价格制定上有着广泛影响力,其关键在于企业“市场势力”的建构。能否建立市场势力影响

着领先市场的转移优势和出口优势。所谓市场势力是指能掌握影响产品价格和市场份额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能力。包括企业的经营控制、市场渠道控制、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及企业联盟等（张小蒂、朱勤，2007）。市场势力作为影响企业创新的利润实现与利益分配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可以防止企业创新被迅速模仿及利润受损。企业市场势力的获取，既可以来自产品上游研发环节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可来自产品下游渠道环节控制能力的增加。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到众多行业，其所提供的创新产品的形式多样，流通过程也较复杂，但是，该类产业所提供的大部分创新产品仍需要通过渠道商销往最终用户或消费者，如新材料行业的功能陶瓷、改性塑料、高性能涂料等创新产品，往往需要通过零售企业销往最终用户。因而，在利用市场势力向价值链两端升级的过程中，可以从下游的渠道控制入手，通过对销售终端、物流、订单等环节的控制提升自己的市场势力，进而获取产品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较多利润（张小蒂、赵榄，2009）。这其中，收购有良好销售网络的国外贸易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实现海外渠道控制的重要途径。

表 2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市场的培育路径及战略意义

培育路径	战略意义
利用用户基数实现自我强化	明确需求人群，强化引导能力
互补性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	提高产品价值，减少价格劣势
商业模式创新	改变需求模式，转移价格成本
基于渠道控制的市场势力培育	利用非竞争市场形成转移和出口优势

五、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市场培育的政策建议

（一）发挥产业政策在需求端的预测和引导作用

相比技术的瞬息变化，政府对需求的预测和引导更具可操作性。而且需求政策面对消费者，没有指定某个企业，不是挑选赢者的过程，因而更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也更为隐蔽，不易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在这个过程中，产业政策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应得到充分考虑。领先市场培育涉及立法、产品标准、公共采购、资金支持等一揽子政策，政策工具之间只有相互统一才能发挥最大效应。另一方面，政策的全局性也应值得重视，我国地理分布辽阔、文化多元、市场容量巨大但异质性也较强，特别是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的本地市场封锁行为更是削弱了应有的规模优势，片面追求地方局部的经济利益，影响了市场在全国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增大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成本（王枫云，2002）。因此，政府出台的相关需求政策应在全国层面统筹考虑，整合市场资源，消除区域间壁垒。

（二）强化公共采购的实际效用和早期体验价值

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大众用户多数采取观望态度，此时初始用户的评价和看法便构成了潜在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共采购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或者相关公共产品的使用者成为特定技术的早期用户。但目前公共采购仍存在采购分散、过程不透明、效率不高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多公共采购都是为示范而购买，产品用于展览、展示后便搁置，并没有发生实际应用，或者使用后没有相应的评价反馈机制，这使得原本十分重要的初始用户失去了其作为早期消费者的体验披露，难以实现对后期消费者的触动和引导。为此，政府应当树立利用新技术优化政府管理的意识，切实强化公共采购产品的实际应用，通过有效说服力建立起示范效应。

（三）以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提高创新产品服务可得性

便捷是大众消费者在不同设计之间进行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相比传统汽车随处可得的加油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少之又少，这直接降低了产品使用的便利性，也降低了用户的消费欲望。为了提高产品使用性能，政府可从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两方面着手。首先，基础设施方面，可在城市市区、大型社区、风景名胜等交通环境敏感地区规划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占比等。又如，规划建设低碳建筑或小区，引导和鼓励公用设施、宾馆商厦、写字楼、居民小区采用高效节能建筑材料、太阳能辅助供电设施、节能办公设备和电器等。其次，配合企业开展各类服务平台的建设也十分关键。不少新产品，如新能源装备产品等，采用了全新的产品架构设计，传统的实体商店难以满足产品展示和销售的要求，需要创新实体商店形式。又比如，政府可以帮助一些中小企业统一设立产品咨询、售后等客服平台，以提高消费者对创新设计的理解，实现创新企业和消费者良好互动。

（四）鼓励并配合创新主体开展盈利模式创新

良好的盈利模式是经营的核心，能够对创新主体产生极大激励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已呈现出了不少区别于传统产业的经营模式。以新能源产业为例，面对普通消费者的需求滞后性，涌现出了“节能效应分享合同”和合同能源管理等创新商业模式。例如，很多国家由于租房人较多，在水电账单由租客支付的背景下，业主没有动力翻新房屋，此时在新能源企业的推动下，业主和租客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合同，业主实施节能改造，而租客将节省的电费在固定的年限内按比例返还给业主，业主依赖所获节能收益弥补节能改造的费用。同样，合同能源管理也具有类似性，像飞利浦照明这样的公司可与某一城市签订合同，为所有公共和户外照明设施提供高效的LED照明，飞利浦为城市的照明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回报，城市将节约的能源费用在固定年限内支付飞利

浦作为项目成本。面对以上创新模式，政府可以成为创新模式的应用者，比如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来优化城市公共照明体系，也可以分别对消费者和创新企业采用补贴、贷款等方式，在刺激需求的同时提高供应的积极性。

（五）指导企业建立、培育和发展海外渠道

由于国外市场在新兴产业上的贸易壁垒较高，如何绕开壁垒形成转移优势是领先市场培育必须考虑的问题。除了直接投资生产、并购国外企业等方式，销售渠道的培育和建设也同样值得重点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到众多行业，但是所提供的大部分创新产品仍需要通过渠道商销往消费者。为建立基于渠道控制的市场势力，政府可通过制定政策帮助海外代理商在网络和实体两个层面建设有序高效的全球销售体系，从而能为潜在的全球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生产资本品的企业可逐步建立海外组装工厂和商务代表处，与国外组装企业和销售公司建立信息通道和进出口协调机制；生产消费品的企业要跟踪国际市场消费动向，运用柔性生产技术使生产系统能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积极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外资讯中心，接收来自欧美等主要高端市场发送回来的产品质量投诉和问题咨询，专业市场分析人员对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后将结果反馈给新兴产业政府管理部门、科研机构 and 高校、行业协会、联盟组织和企业，共同探讨新兴产业市场需求变化方向以及新出现的市场问题。

（六）积极改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可以起到扩大消费需求、保护合法企业和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改善消费环境对电子信息、生物农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与最终消费需求相关性较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譬如，通过改善绿色产品消费环境，可促进消费的重点由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向环保型、低能耗产品转移，促使全社会形成“改善绿色产品消费环境→促进绿色消费需求→推动绿色产业生产→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绿色消费品”的产业发展良性循环。一是要加快推进相关产品认证，建立产品标识认证体系，让公众了解创新产品相对传统产品的优越性，正确识别新产品。二是要完善消费信用体系，发展消费信贷。三是要加强产品打假活动，大幅度提高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或冒用产品标识认证标志等行为的违法成本，保护合法企业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1. Beise, Marian. 2001. Lead Markets: Country-specific Success Factors of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Vol. 14. Physica Verlag.
2. Day, George S. 1994. “The Capabilities of Market-driven Organizations.”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37-52.

3. Hobbs, Clement, et al. 1991. "Implementing Multicultural Policy: An Analysis of the Heritage Language Program, 1971 - 1981."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34(4): 664-675.
4. Murphy, Kevin 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5): 1003-1026.
5. Parente, Stephen L., and Edward C. Prescott. 1999. "Monopoly Rights: A Barrier to Rich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216-1233.
6. Robinson, William T., and Claes Fornell. 1985. "Sources of Market Pioneer Advantages in Consumer Goods Industri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05-317.
7. 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S71-S102.
8. Schmookler, Jacob. 1966. 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Vol. 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Scherer, Frederic M. 1992. "Schumpeter and Plausible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3): 1416-1433.
10. Walz, Rainer, Nicki Helfrich, and Alexander Enzmann. 2009. "A System Dynamics Approach for Modelling a Lead-market-based Export Potential." No. S3/2009. Working Paper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11. 郭熙保、文礼朋, 2008, 《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后发国家的技术成长之路》, 《南京大学学报》第 1 期。
12. 荆浩、陈静、孟左飞, 2011, 《基于商业模式设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第 6 期。
13. 柳卸林、高伟, 2012, 《从光伏产业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 1 期。
14. 路风、封凯栋, 2005, 《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谭劲松、薛红志, 2007, 《主导设计形成机理及战略驱动因素研究》, 《中国软科学》第 7 期。
16. 邢小强、王玉荣, 2010, 《全球领先市场视角下的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科技进步与对策》第 9 期。
17. 王枫云, 2002, 《地方市场封锁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江汉论坛》第 6 期。
18. 张国胜、胡建军, 2012, 《产业升级中的本土市场规模效应》, 《财经科学》第 2 期。
19. 张杰、刘志彪, 2007, 《需求因素与全球价值链形成——兼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封锁型”障碍与突破》, 《财贸研究》第 6 期。
20. 张小蒂、朱勤, 2007, 《论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构建的良性互动》, 《中国工业经济》第 5 期。
21. 张小蒂、赵榄, 2009, 《基于渠道控制的市场势力构建模式特征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第 2 期。

责任编辑: 晨乔

美国棉花产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解运亮

摘要：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和第一大棉花出口国。本文概述了美国棉花生产和流通情况，论述了美国棉花产业政策的总体特征。对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和2008年农业法案中的棉花补贴政策进行了归纳整理，研究其实施的影响，并分析了美国棉花补贴政策的新动向。最后，给出美国棉花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棉花产业 产业政策 棉花补贴

作者简介：解运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一、引言

棉花是集大宗农产品和纺织工业原料于一身的重要物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棉花产业链长，棉花产销不仅关系到我国4000万户棉农的经济收入，也关系到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关系到2000万纺织工人（其中大多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社会稳定。当前，我国棉花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国内外棉花价差高位运行，国内棉价远高于国际棉价，对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的不利影响；二是棉花生产成本高企，同时国家对棉花生产的保护和支撑不够，植棉的比较利益偏低，农民植棉积极性不高；三是新棉绝大部分入交国储，棉花市场的价格调节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大大弱化，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遭到破坏。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和第一大棉花出口国，对世界棉花市场和棉花贸易格局有重要影响，其棉花产业政策也富有特色、卓有成效。因此深入研究美国的棉花产业政策，对于完善我国的棉花产业政策，促进我国棉花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美国棉花产业政策的总体特征

（一）美国棉花生产和流通概述

1. 生产和加工实现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美国棉花生产的主体是大农场，全美有棉花种植农场3万多家，一般每家植棉面积为1—2万亩。美国棉花生产的现代化和规模化程度非常高，从整地、播种、灌溉、施肥、植保到收获，全部采用大型现代化机具作业；种植和管理技术非常先进，如使用GPS（卫星定位技术）对棉田病虫害、施肥、棉花成熟程度进行管理，用飞机对棉田喷洒农药等。采摘时，美国已经实现100%机械化采摘，其中大约70%的棉花使用摘棉桃式机械采摘，另外30%为水平摘锭式机械采摘。轧花厂在全国几个主要产棉区大量分布。棉花采摘后，绝大多数直接在棉田把籽棉打成棉膜运到轧花厂，只有小部分以拖车和棉垛的形式就地储存在棉田，之后再运往轧花厂。轧花厂一般为收取加工费的形式，并不直接参与经营。总之，美国棉花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和加工，具有用工少、效率高的特点。

2. 若干大棉商主导棉花流通和出口。美国棉花农场主可以通过无追索权的贷款将棉花抵押给政府，或是直接出售给棉商。经过长期竞争和集中，美国现只剩下数十家棉商，这些棉商既做国内贸易，也做出口贸易，棉商做何种业务视其自身能力和实力而定，政府没有进出口经营权限制。其中最大的10家棉商占据了全美90%以上的棉花资源，因此，美国棉花流通和出口高度集中在少部分大棉商手中。目前，年棉花经营量比较大的棉商有达利文公司、爱伦堡公司等。美国棉商进行棉花经营：一是注重防范风险，棉花是大宗农产品，影响因素多，价格波动大，棉商购进棉花的同时往往通过纽约棉花交易所卖出，进行“套期保值”，避免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注重信誉，棉花现货贸易以书面传真合同为主，但双方口头协议也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一旦违约就会被美国棉商协会和利物浦棉花协会列入黑名单，这对棉商履行合同有很强的约束力。

（二）美国棉花产业政策的总体特征

1. 棉花市场机制高度发达和规范，市场在棉花体制中居于支配和基础地位。美国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棉花产销上同样拥有高度发达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市场居于支配和基础地位，由市场配置棉花资源是美国棉花体制最根本的特征。（1）灵敏的供求和价格信息系统是美国棉花市场运行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政府建立了棉花统计评估制度，美国农业部设有专门机构统计棉花产销情况，研究和分析国内国际棉花供求形势，每月定期发布美国和世界棉花供求预测报告、棉花市场价格表等，并不断修正上期预测数据。（2）放开经营是美国棉花流通的基本格局。棉花经营不需要政府的资格认

定，只要符合有关法律和遵循有关贸易规则，任何市场主体都可以进入棉花经营领域，交易方式有现货合同、远期期货合同、期货合同等多种。（3）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十分发达。一方面在棉花产供销各个环节中为会员方提供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帮助协调棉花产业上下游相关主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棉花政策制定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2. 政府重视棉花产业发展，财政补贴对于棉花产业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在棉花产业运行中发挥着不容替代的作用，事实上，丰富的棉花补贴政策是美国棉花产业政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1）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对棉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发挥其导向作用，政府重视并制定和实施棉花调控政策，调控的手段分经济和法律两种，调控的范围从棉花生产扩大到流通、科研、质量控制等领域。（2）美国政府制定棉花产业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保护棉花生产者利益，二是促进棉花对外出口。（3）财政补贴对于棉花产业运行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稳定棉花生产、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对外出口、决定进口配额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3. 棉花相关立法较多，健全的法律体系为棉花调控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棉花产业方面的立法较多，最重要的是约每五年修订一次的美国农业法案，该法从总体上规定了政府调控棉花市场的措施。此外，联邦和州政府还就棉花问题专门制定了相关法律，如《美国棉花期货法》等。有关实施政府项目和规范市场各主体行为的法律，是政府介入棉花市场的主要依据；建立生产者收入支持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是政府介入最基本的方式。美国政府对于棉花的管理和调控，严格按照法律赋予的权限，操作上很规范，时效性很强。

4. 棉花行业组织众多，在棉花产业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美国棉花行业中介组织众多，这些组织在棉花产业中发挥着政府部门或单个企业难以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美国棉花行业协会遍布棉花产业上下游各环节，大的全国性协会下面还分许多专业性的和区域性的行业协会分会，如美国棉花协会、美国棉商协会、美国国际棉花协会、美国棉花公司、生产者协会、合作社联合会、榨油协会、棉籽协会、纺织业协会、仓储协会等等。其中美国棉花协会由包括生产、加工、销售、榨油、仓储、合作社及纺织等多个行业的企业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充分反映全行业的整体利益。棉花种植者也成立了合作社，如美国棉花供销合作社由平原棉花合作社（Plains Cotton）等四家分社构成，拥有数万棉花种植者，将美国棉花种植者与纺织企业直接联系起来，每年为世界各地的纺织企业提供大量品质优良的棉花，以满足其纺纱需求。

三、独具特色的美国棉花补贴政策

美国对于农业的保护和支持是举世闻名的，就棉花而言，美国也是世界上对棉花补

贴最高和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棉花补贴政策以保障农民收入和促进棉花出口为主要目的，取得了很大成效。深入研究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并借鉴其中的合理之处，对于完善我国的棉花产业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棉花补贴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以法的形式出现

1. 棉花补贴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农业法案。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是棉花补贴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农业法案（简称Farm Bill）。美国农业支持政策（包括棉花补贴政策）通过立法的形式出现，提高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自1933年产生第一个农业法案《农业调整法》至今，美国一共施行了16个农业法案，平均每五年修订一次。农业法案的核心部分是“农产品计划”，即对农产品的各种补贴政策，得到补贴最多的作物也是美国农产品出口中最重要的农作物，棉花即在其中。

2. 增加农民收入 and 市场化是美国农业法案的两大主旋律。长期以来，美国农业法案一直坚持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1933年第一个农业法案出台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此后一直到80年代，美国农业支持政策主要以1933年农业法案为基础适度调整，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为主要中介目标。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对农业的政策支持方式逐渐实现了由价格干预向市场化方向的调整。1996年《联邦农业改进和改革法》首次从法律上把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同农产品价格脱钩，该法案当时被誉为美国政府自新政以来最重要的市场导向改革。

（二）美国近 10 年来的棉花补贴政策

1. 2002年农业法案中的棉花补贴政策。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主要向棉花生产者提供了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和营销贷款补贴。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补贴，如针对棉花出口商的贸易补贴等。在2002年农业法案实施的2002-2007年间，美国政府给予了其棉花产业巨额财政补贴，平均每年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和营销贷款补贴三项补贴合计约25亿美元（Leslie Meyer et al, 2007）。如果加上其他的补贴，平均每年给予棉花产业的补贴高达30亿美元左右，这一补贴额度约为同期棉花产业净收入的1.55倍。（1）生产性补贴。包括直接补贴（Direct payments）和反周期补贴（Counter-cyclical payments）。这两种补贴直接补给棉花种植者。其中直接补贴是政府直接付给棉农的停耕补贴。根据政府的生产种植计划，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需要棉农停耕一定比例的棉田，该比例每年从5%-20%不同。棉农要得到直接补贴，必须与政府签署年度种植合同，并在合同中确定自己的基础种植面积和补贴单产的情况。反周期补贴是当棉花的有效价格（Effective price）低于目标价格（Target price）时启动。从每个棉花农场接受到的政府补贴来看，反周期补贴所占比重达到41.04%，直接补贴所占比重达到35.02%（谭

砚文，2009），这说明美国政府实施的棉花补贴政策主要是给予棉农收入上的支持。

（2）营销贷款补贴，又称贷款不足补贴（LDP），也是给生产者的补贴。即棉农在销售棉花过程中可以在棉花价格较高时直接出售棉花，也可以选择价格在低时卖给政府以得到贷款，取得资金的融通。如果将来棉花价格升高，棉农可以选择归还贷款赎回棉花重新在市场出售；如果将来市场价格持续低迷，棉农可以选择将棉花直接留在政府手里，由政府统一拍卖。2002年农业法案实施期间，每个棉花农场接受到的贷款不足补贴占全部补贴的14.2%（谭砚文，2009）。（3）贸易补贴，又称出口价格补贴，是给棉商、出口商的价格补贴，是三步竞争条例（3-step competitiveness program）中的Step2。实施这一补贴的目的是提高美国棉花的国际竞争力和扩大出口。因该补贴被巴西向WTO提起诉讼，认为违反WTO原则，且最终巴西胜诉，因此2006年8月起美国已经取消该补贴。

2. 2008年农业法案中的棉花补贴政策。有关棉花补贴政策方面，2008年农业法案保留了2002年法案的基本框架和措施，仍然将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和营销贷款补贴相结合，但针对上一期法案执行期中存在的问题，2008年法案内容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增加。（1）新增“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ACRE）。该方案是一项基于收入的、而非基于价格的反周期补贴，实施目的是克服2002年农业法案中反周期补贴在单产下降、收入减少时的补贴也减少，而在产量增加、收入提高时又给予过多补贴的弊端。该方案的实质是补偿农民的收入损失。选择接受该方案的农民就不能再接受原有的反周期补贴，同时还必须同意减少20%的直接补贴和30%的营销贷款补贴。（2）对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为了鼓励农民参加新推出的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2008年农业法案对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一是调整了直接补贴的面积，对2009-2011年间，直接补贴的面积定为基准面积的83.3%，降低了1.7个百分点。二是调整了反周期补贴的目标价格，陆地棉的目标价格比2002年降低了1.15美分/磅，还设立了目标价格和有效价格之间的最大支付额度为12.58美分/磅。（3）对营销贷款补贴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在2008年农业法案中，虽然仍执行无追索权的商品贷款计划，营销贷款率也保持不变（对于接受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的农民，营销贷款率要降低30%），但是法案却赋予了农业部长一项新的权力，即农业部长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对营销援助贷款率进行适当的修改，一旦出现营销困难或者有关交通和基础设施发生严重破坏影响了正常的市场销售时，农业部长有权对贷款偿付率进行调整。显然，这项规定为美国政府对棉花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4）新增“陆地棉经济调整援助”。2008年农业法案新增了另一项补贴方案，即陆地棉经济调整援助（Upland Cotton Economic Adjustment Assistance），对使用美国产陆地棉的用棉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并且规定该补贴援助只能用于用棉企业进行采购、发展、转型等现代化建设，对厂房的扩建以及

对设备、设施的更新等。显而易见，该政策旨在推动美国棉花生产销售和纺织企业转型升级走上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三）美国棉花补贴政策实施的影响

1. 促进了美国棉花生产。美国的农业补贴通过三种方式来鼓励相关农产品的生产，棉花作为补贴作物中的大户，自然也不能例外：（1）直接补贴，使农民愿意保持和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2）营销贷款补贴和支付基于收入的补贴（如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通过保障农民取得平稳的收入鼓励农民多种植棉花；（3）反周期补贴，使农民解除了对于市场行情风险的后顾之忧而稳定棉花种植。巴西向WTO诉讼美国棉花补贴违反WTO规定时，也利用美国农业部数据证明美国高额棉花补贴支持了其棉花生产（韩一军，2006）。即使是在棉花价格大幅走低的年份，美国的棉花生产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上。

2. 促进了美国棉花出口。美国农业补贴中得到补贴最多的农作物也正是美国农业出口中最重要的农作物。小麦、棉花和大米的出口率都超过了50%，且美国的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出口占到了世界总出口额的40%。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农业补贴就引起了其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传导路径是：高额补贴引起农产品过量生产，过量生产使政府储备激增，扩大出口成为减少政府农产品储备的一种手段（Jostling et al, 2008）。尽管美元实际汇率曾相对于世界其他棉花主要生产国（如巴西和非洲国家）大幅升值，本应引起棉花出口下降，但在高额棉花补贴的影响下，美国棉花出口不降反升。

3. 压低了世界棉花价格。美国的农业补贴显著压低了相关农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研究表明，美国农业补贴压低了世界玉米价格的0—9%、世界小麦价格的6%—8%、世界大米价格的4%—6%（Sumner, 2005）。而对于棉花，价格压低的效果被估计处于0—5%之间（Sumner, 2003, 2006）。另外，其他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棉花补贴政策压低了世界棉花价格。尽管所估计的具体数字有所不同，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表明，美国棉花补贴对于棉花生产、出口和价格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4. 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棉花产业。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大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棉花产业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普遍而言，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和美国高额的农业补贴相竞争。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没有像美国农业补贴那样的雄厚资金来源以促进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虽然巴西曾就棉花贸易补贴在WTO胜诉美国，但这仅是个例，发展中国家普遍仍不具备在WTO框架下成功挑战美国的能力。因此，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无疑产生了双重破坏效果：其一，通过高额补贴，美棉在世界棉花市场上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其二，通过抑制世界市场棉花价格，也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棉花产

业比较优势。

（四）美国棉花补贴政策的新动向

2008年农业法案已于2012年底到期，新的农业法案正在制订过程中，新法案将形成2013-2017年美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目前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已经分别通过了《2012农业改革、食品和就业法案》和《2012联邦农业改革和风险管理法案》，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committee）正在协调这两个版本，这也许是个很长的过程，协调整合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版本送交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新的法案。总的来看，两个版本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很多不同，但基本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涉及到棉花补贴政策方面，主要的变化是两个版本都不再对棉花进行价格和收入支持，取消了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和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而是专门为棉花建立一个“累计收入保险计划”（Stacked Income Protection Plan，即STAX）。政府将对该保险计划的购买者提供80%的保费补贴，当一个县范围内的棉花种植收入低于预期收入的10%时，该计划将被触发，超过预期收入10%以上的损失由该计划进行补偿，但补偿上限为预期收入的30%。

新农业法案上述变化的原因是：（1）未来5年农产品的预期价格将普遍高于目标价格，原有的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和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等对保障农场主收入的作用减弱，因此予以取消；（2）尽管上述补贴被取消，但是由于建立了替代性的农业收入风险保障计划，仍然能够保障农场主实现收入目标；（3）从美国农产品大量出口的实际出发，减少对农产品价格和收入的直接支持，而是通过农业收入风险保障计划和作物保险对农场收入进行较为间接的支持，既能延续对国内农业的支持，又能更好地适应WTO规则，从而避免更多补贴起诉争端。

四、美国棉花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我国自2011年9月起实施的棉花临时收储制度，在起到基本保护棉农利益、稳定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同时，也对棉花价格造成了扭曲，国内棉价虚高、内外价差显著拉大是价格扭曲的集中表现。目前的收储价格已经很大程度上偏离市场需求，导致新棉大量入储，库容趋于极限，市场调节能力弱化，也对纺织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而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反观美国棉花体制中，市场始终居于支配和基础地位，政府对棉花的高额补贴并不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的形成，在其棉花价格形成过程中市场机制仍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又如埃及对棉花实行市场自由化政策后，棉花产销也走上了良性轨

道。市场机制在棉花价格形成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这应是我们坚持的方向。

（二）应加强对我国棉花生产的支持和保护

目前我国对棉花生产的补贴较少，只有棉花良种补贴一项，补贴标准为每亩15元。农业生产具有弱质性，因而对农业生产予以支持和保护是世界通例，美国对其棉花产业的支持和保护具有很强代表性。近年来印度频繁出台棉花出口禁令也警醒我们一定要稳定本国棉花生产。这就启示我们应继续加强对我国棉花生产的支持和保护，切实保护棉农利益。首先，作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为了保证在世界棉花市场上拥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避免国际棉价的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别国手中，我国应将棉花进口依存度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由此引出的必然要求就是要稳定国内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而在植棉成本不断上涨、植棉比较效益仍然偏低的情况下，保护棉农利益是保证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的逻辑起点。其次，保护棉农利益并不必然和维护纺织行业的利益相冲突，事实上，农村是纺织品销售的重要潜力市场，未来纺织行业的发展将迎来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积极转变，增加棉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纺织品销售的市场。最后，目前从事棉花种植的农民，除新疆以外，大多为农村的老弱病残人士，即使在农村，他们也属于弱势群体，保护他们的利益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应以直接补贴为主对棉花生产进行补贴

我国现行的棉花临时收储制度对棉农的补贴实际上是间接补贴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款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环节间接给予补贴。这固然对棉花生产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这种补贴对棉花生产的直接刺激作用较低，而且容易在中间环节流失。美国对其棉花生产给予高额直接补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且直接补贴属于WTO规则下的农业支持的“绿箱”政策，既不会扭曲市场，又对棉花生产有更强的激励效果。因此，我国应对现行的棉花临时收储制度和收储价格进行适当调整，探索以直接补贴为主对棉花生产进行补贴，形成棉价内外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具体在直接补贴方式上，可以考虑根据籽棉产量进行补贴或根据种植面积进行补贴两种方式。

（四）应着力提高棉花生产的集约化和机械化水平

我国除新疆地区以外，棉花生产普遍是小农种植模式，机械化难以推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美国棉花生产的主体是大农场，一般种植面积很大，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很高，因而便于推行大型现代化机具作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用工成本。这启示我们应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鼓励提高棉花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棉花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棉花生产成本。

（五）应加强棉花调控立法以提高政策透明性和延续性

我国棉花调控主要依据相关政府规定和文件，如棉花临时收储预案每年由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棉花进口配额的发放则由发改委负责管理。而美国对棉花产业的调控和干预是建立在《农业法案》和其他相关法律条款规定基础之上的，政策的稳定性高，延续性强，执行的力度和效果也高，从而使得棉花产业上下游各环节可以据此合理安排生产经营计划。相比之下，我国的做法固然保证了较大的政策灵活性，却也有透明性不高和延续性不够明确的缺点。因此，建议我国探索和加强棉花调控相关立法工作，发挥法律和政策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使棉花调控建立在坚实的法律依据之上，降低政策出台的不确定性，也有助于提高调控的力度和效果。

参考文献：

1. 2008 Farm Bill side-by-side, <http://www.ers.usda.gov/farm-bill-resources.aspx>.
2.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 <http://www.nationalaglawcenter.org/farmbills/>.
3. 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 of 2008, <http://www.nationalaglawcenter.org/farmbills/>.
4. Meyer, Leslie A., Stephen A. MacDonald, and Linda Foreman. 2007. Cotton Backgrounder.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5. Chite, Ralph M. 2012. "The 2012 Farm Bill: Comparison of S. 3240 and H.R. 6083 with Current Law."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www.crs.gov.
6. 蔡海龙、韩一军、倪洪兴，2013，《美国 2012 年农业法案的主要变化及特点》，《世界农业》第 2 期。
7. 迪姆·卓斯林（Tim Jostling）等，2008，《美国 2007 年农业法案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上、中、下），《WTO 世界导刊》第 4、6、7 期。
8. 丁好武，2003，《借鉴美国棉花流通模式，加快推进我国棉花市场体系建设》，《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第 5、6 期。
9. 穆月英，2008，《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及实证分析》，中国农业出版社。
10. 谭砚文，2009，《美国 2008 年新农业法案中的棉花补贴政策及其启示》，《农业经济问题》第 4 期。
11. 田彩云、郭心义，2006，《印度、墨西哥和埃及的棉花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新疆农垦经济》第 2 期。
12. 王建红，2005，《关于美国棉花协会的考察报告》，《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第 3 期。

责任编辑：晨乔

· 案例研究 ·

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比较研究^{*}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课题组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达沃斯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的比较研究，分析、比较两个论坛之间优势互补的可行性与合作途径，探求如何搭建两个论坛之间的互补机制，优化论坛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用，并为两个论坛的主办单位分别提供改进论坛组织、筹备和运行模式等方面的政策建议，进一步提高这两个论坛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达沃斯 博鳌 论坛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曹文炼，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

夏季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是目前中国最具有国际影响的会议组织。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都非常关注经济发展问题，但达沃斯论坛更多地从全球的角度关注和探讨经济发展问题，而博鳌亚洲论坛则主要从亚洲的角度关注和探讨亚洲地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焦点问题和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在当今全球经济低迷时期逆势上扬的出色表现，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责任重塑亚洲世纪，亟待将博鳌亚洲论坛和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影响力扩展到全球范围，彰显亚洲影响力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 本文是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受外事司委托组织开展“搭建达沃斯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互补机制，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达沃斯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比较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课题于 2012 年 3 月启动，由曹文炼研究员任课题组长，主要成员包括周静、刘建兴、迟洪涛、盛思鑫等。

一、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的全方位比较与分析

达沃斯论坛是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立的非官方国际性会议机构,博鳌亚洲论坛则是在亚洲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立的,它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在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其办会理念深受达沃斯论坛成功经验的影响。后者在确定世界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创建一个“亚洲版”的区域经济论坛,就成为博鳌亚洲论坛创设的主要目标。然而,博鳌亚洲论坛发展过程中的“外溢”效应十分显著,已逐渐由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发展成为一个以经济功能为主、兼具其他功能的区域性国际论坛。

(一) 运作模式

1. 达沃斯论坛的运作模式。达沃斯论坛是一个以基金会形式成立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国际会议组织,每年都要召开主题年会。2007年起,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始在中国举办,参会企业主要是新兴经济体中的领军企业,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中迅速发展的企业。此外,达沃斯论坛每年还发布年度报告和全球风险网络评估报告,以及不定期地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报告和其他专题报告。

2. 博鳌亚洲论坛的运作模式。博鳌亚洲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会议组织,也是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且经常举办各种会议,如论坛大会、研讨会、座谈会和讲座,独立或合作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各类研究活动。博鳌亚洲论坛每年也发布论坛年会报告、亚洲经济一体化年度报告、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和亚洲竞争力年度报告,以及其他专题研究报告。

3. 对两个论坛运作模式的比较分析。达沃斯论坛可称是世界级论坛运作模式最为成功的代表,其运作模式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非官方性,二是非盈利性,三是研究力量强大。达沃斯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作为最具权威的排行体系,被全世界各国的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达沃斯论坛善于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来达成组织目标。全球性挑战具有的高度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要求国际性论坛的主办者必须整合官、产、商、学、媒各界的力量来共同应对这种挑战。目前,在各种国际性会议组织中,只有达沃斯论坛能够提供这种全球性合作框架,博鳌亚洲论坛则缺少提供外部智力支持的松散型社区网络。另外,博鳌亚洲论坛的非官方性不是特别突出,应努力淡化官方色彩,追求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相互交流平台,使每一个发言者都能各抒己见、指点江山。

(二) 会员特点

1. 达沃斯论坛的会员特点。达沃斯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国政界和经济界的高层领导人、企业首脑以及著名专家,达沃斯论坛的影响力就在于其成员组的实力。达沃斯论

坛的会员按照不同功能和层次具体划分为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基金董事会会员和全球成长型公司。各个成员组的人们都代表着各自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和潮流领导者,具体包括各行业领袖组、未来全球领袖组、媒体领袖组、论坛嘉宾组、政界人士组和文艺精英组。

2. 博鳌亚洲论坛的会员特点。博鳌亚洲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政府要员、商业领袖和知名学者。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博鳌亚洲论坛正日益发展成为全球政府高官、工商界代表和学术界精英就亚洲以及其他地区重要事务进行平等对话的高层次平台。上述各界人士为了亚洲走到一起来,这本身就是亚洲合作的象征,而通过论坛产生思想、凝聚共识、催生政策和行动,则是对亚洲经济一体化实实在在的贡献。

3. 对两个论坛会员特点的比较分析。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员有着相似的宗教和文化背景,而参与亚洲博鳌论坛的亚洲各国的宗教以及文化趋向多样化,因此博鳌亚洲论坛的会员在价值观念方面显示出了更多的差异性。相较而言,博鳌亚洲论坛虽然在名义上也是采用会员制,但是在会员分类方面更接近于美国财富论坛的赞助商分类模式,不如达沃斯论坛按照功能和层次分类那样能够凸显论坛会员各自的特点。

(三) 品牌形象

1. 达沃斯论坛的品牌形象。达沃斯论坛已然成为一个成熟的品牌。经过40多年的发展,达沃斯论坛参会者层次不断提高,议题日趋重要和广泛,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已成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别论坛”。在中国举办的新领军者年会借助达沃斯论坛的品牌效应,其会议的筹备、议题和内容的选择等等也都是地道的达沃斯模式。

2. 博鳌亚洲论坛的品牌形象。博鳌亚洲论坛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品牌。博鳌亚洲论坛较之作为一个成熟品牌的达沃斯论坛还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博鳌亚洲论坛是亚洲的论坛,关注的是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与达沃斯论坛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3. 对两个论坛品牌形象的比较分析。博鳌亚洲论坛是由三位亚太国家的前政要,即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共同发起倡议的,论坛发起者的影响力很大。利用论坛发起者的良好声誉可以迅速确立品牌形象,如果论坛的发起者影响力不大的话,其品牌建立就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所以达沃斯论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逐步建立品牌的过程。

(四) 年度议题

达沃斯论坛设立有全球议程中心,通过基金董事会充分调动全球的资源,使论坛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从全世界收集最新热点、难点问题以及讨论的焦点,并将这些焦点问题在其会员中进行充分酝酿,选择对世界、区域或行业有影响力的议题,最终形成达沃斯论坛年会和高峰会的主题与议题。此外,达沃斯论坛非常注重发挥外部专家团体的作用,外部专家团体为论坛年会的议题选择提供智力支持。博鳌亚洲论坛设立有研究

院和咨询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并调用论坛所有资源保证搜集高质量的年会议题，非常注意把握时代脉搏，议题设置能够与时俱进，收入分配、教育机会、公共卫生等关乎民生等柔性议题的设置，也是博鳌亚洲论坛面对现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选择。

表 1：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近十年议题对照表

达沃斯论坛的年度/夏季议题		博鳌亚洲论坛的年度议题	
2012年/夏季	大转型：塑造新模式/ 塑造未来经济	2012年	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2011年/夏季	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 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	2011年	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
2010年/夏季	反思、重设、重建：改善世界的状况/ 推动可持续增长	2010年	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2009年/夏季	重构后危机时代的世界/ 重振增长	2009年	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
2008年/夏季	合作创新的力量/下一轮增长的浪潮	2008年	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
2007年/夏季	变化中的力量格局/ 变化中的力量平衡	2007年	亚洲制胜全球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2006年	开拓创新把握未来	2006年	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机会
2005年	负起艰难抉择的重任	2005年	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角色
2004年	安全及繁荣伙伴关系	2004年	亚洲寻求共赢：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亚洲
2003年	构建信任	2003年	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
2002年	脆弱时代的领导：一个共同未来展望	2002年	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合作与发展

（五）政府支持

1. 达沃斯论坛的政府支持。达沃斯论坛的政府支持力度较小。瑞士格劳宾登州是达沃斯论坛的政府运作主体，专注于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协助政要接待；二是安全保卫；三是媒体公关；四是旅游推介。其余的诸如会议后勤服务等均由“阳狮公司”承担。
2. 博鳌亚洲论坛的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对博鳌亚洲论坛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历届论坛年会均有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因此，尽管博鳌亚洲论坛将自身定位为非官方组织，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区域性论坛，在论坛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的特色和政策的趋向都非常明显。
3. 对两个论坛政府支持的比较分析。与达沃斯论坛相比，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服务保障工作几乎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全部承担，这显然与博鳌亚洲论坛特殊的发展背景有

关。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对这一服务保障模式进行优化。博鳌亚洲论坛可参考、借鉴达沃斯论坛的一些成功做法,按国际惯例走商业化服务保障之路,在会务接待和后勤保障领域率先尝试实现商业化运作。此外,还应向达沃斯论坛的政府运作主体格劳宾登州学习,提高东道主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建立常态化的公共服务保障机制。

(六) 资金来源

1. 达沃斯论坛的资金来源。达沃斯论坛实行会员制,资金来源主要有会员会费、会议赞助费和参会费。达沃斯论坛年会和区域高峰会的资金完全来源于会议收入本身,包括会议费、合作伙伴赞助费和实物赞助。因此,达沃斯论坛的每一次会议实际上都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而其收入用于论坛自身的发展和改善服务。

2. 博鳌亚洲论坛的资金来源。博鳌亚洲论坛也实行会员制,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会员费、参会费、各界捐款和政府资助,在论坛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论坛资金的利息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其稳定的会员费收入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而且各家赞助商提供的实物赞助也非常普遍。

3. 对两个论坛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冬季达沃斯论坛是自负盈亏的,而夏季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则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政府支持,尤其是东道主政府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因此,非常有必要提升夏季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的商业盈利能力,逐渐淡化二者的“官方”色彩。

(七) 社会影响

1. 达沃斯论坛的社会影响。达沃斯论坛能够影响全球舆论,关系网遍布全球。40多年来,达沃斯论坛的参会者层次不断提高,议题日趋重要和广泛,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被视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论坛”。

2. 博鳌亚洲论坛的社会影响。博鳌亚洲论坛致力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目前已经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

3. 对两个论坛社会影响的比较分析。博鳌亚洲论坛是个主要面向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地区性论坛,而达沃斯论坛是个主要面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全球性论坛。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都集中关注经济发展问题,但达沃斯论坛更多地从全球的角度关注和探讨经济发展问题,而博鳌亚洲论坛则主要从亚洲的角度关注和探讨亚洲地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焦点问题和挑战。两个论坛从不同的角度,引导人们共同思考当今世界和亚洲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各自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

博鳌亚洲论坛和夏季达沃斯论坛对于举办城市的经济拉动效应十分显著,为各自的举办地赢得了资金、技术、人才、合作机会等优厚的资源,提升了举办城市知名度和美

誉度，增强了举办城市的辐射和聚集能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为举办城市赢得了潜在的或长远的发展动力。因此，有必要总结两个论坛各自的成功经验，以便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论坛影响力；同时，分析各自的不足之处，便于寻找搭建优势互补合作机制的现实切入点，更好地实施全方位、多层面、深层次的合作。

（一）达沃斯论坛的成功经验

1. 善于构建简捷高效的组织机构。达沃斯论坛的基金董事会全面负责制定论坛长期发展目标和方向，执行董事会负责管理论坛的活动和资源，驻日内瓦、纽约、北京和东京的四个代表处负责与驻在地的官方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合作。

2. 选择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议题。达沃斯论坛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其对政治、经济、技术领域敏感议题的把握能力。达沃斯论坛将基金董事会和执行董事会在全球的资源加以充分调动，使论坛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在全球收集热点问题，形成年会和高峰会的主题及各讨论焦点。

3. 特别注重长期品牌形象的培育。达沃斯论坛品牌的成功和权威端赖于其研究力量的强大，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国际性会议组织，它还拥有自己创办的刊物和研究力量。达沃斯论坛所发表的全球年度竞争报告已经被各国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4. 注意培养强大的商业盈利能力。近几年来，达沃斯论坛的总收入一直保持着超过一亿美元的规模，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所有盈余均交由基金董事会所管辖的资源管理中心进行资金运作，以维持论坛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5. 达沃斯精神价值超越论坛本身。达沃斯论坛为各个领域的决策人提供了一个融洽的氛围，使与会者能够平等地讨论问题、愉快地交流和分享各领域中的成功经验。不同领域、不同国界之间的平等讨论、融洽交流和相互促进已经超越了达沃斯论坛本身，而升华为一种“达沃斯精神”。

（二）达沃斯论坛的不足之处

首先，达沃斯论坛的不足之处在于交际有余，预警和创新能力不足。达沃斯论坛在资讯非常丰沛的条件下，没有能够预警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问题，因此其创新力度和预警能力还有待提高。其次，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与会者层次不够高、智识之声稍嫌不足，除极少数收到论坛邀请成为演讲嘉宾的知名人士之外，没有为更多专家和学者开辟参会的特殊通道。最后，从议题设计来看，夏季达沃斯的议题设置“洋味”太浓，在反映我方关切的问题方面尚存在某些不足。

（三）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经验

1. 论坛组织机构严谨高效。博鳌亚洲论坛的组织机构包括：论坛会员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咨询委员会和研究院。目前，博鳌亚洲论坛已和世界银行签署了协议，后

者将帮助论坛建立一个国际智力支持网络，推进松散型的智力支持社区网络建设。

2. 初始品牌创建能力非凡。博鳌亚洲论坛发起者的影响力巨大，而且每次年会都要请来不少重量级的主讲人为论坛壮大声威，吸引全球媒体的注意力，使博鳌亚洲论坛的初始品牌形象得以快速确立。

3. 论坛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资金运作模式上，博鳌亚洲论坛基本上与国际接轨，运作资金主要靠企业支持，并实行会员制。资金来源除了会员费外，还有参会费、捐款、政府资助，以及在论坛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论坛资金的利息和其他合法收入，形成了稳定的收入渠道。

（四）博鳌亚洲论坛的不足之处

首先，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亚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交流首选平台的作用还有待加强。其次，博鳌亚洲论坛尚未在亚洲之外的地方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论坛影响力的发挥受到局限。最后，论坛会员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却对提升中国乃至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缺乏足够的热情。

三、关于进一步改进夏季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进一步改进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夏季达沃斯论坛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建议将我方的关切与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办会宗旨结合起来，将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服务性工作与对论坛的影响、干预、改造和利用工作结合起来。具体而言，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供有关方面斟酌参考：

1. 提升论坛的功能定位。我方应将夏季达沃斯论坛逐步转变为传播和发挥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帮助我国将经济方面的硬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安全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帮助中国在新时期更好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特别地，可以让夏季达沃斯论坛承载讨论和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的任务，促进我国在全球治理新体系的形成中占据发声平台并抢占战略制高点。

2. 改变论坛当前的运作机制。目前，夏季达沃斯论坛是类似外商独资的运作模式，未来可以采取类似“中外合资”的形式，以委员会治理的形式来实现中外双方在论坛中的平等位置。我方对于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投入和筹资渠道应该多元化，从主要由政府投入的局面逐渐转向商业化和社会化，创新性地探索出一套可持续的、行之有效的中外合作举办国际会议的运作模式。

3. 依托强有力主体加大对论坛的影响力度。依托一个强有力的参与和支撑主体，加强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干预、影响和利用能力。为增加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了解与研究，使之能够为我所用，我方应尽快着手成立一个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常设机构，可考虑将其命名为夏季达沃斯论坛研究院。该研究院主要负责研究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政策

事宜，加强我方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影响和干预。

4. 大力提高论坛的层次与规模。在提高论坛层次方面，可考虑将其他一些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会议与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议时间衔接起来，尽可能地放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之前举行，这样方便一些大腕级的人物更大可能性地参与夏季达沃斯论坛，从而与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声势形成合力。

5. 创建夏季达沃斯中方常设机构。建议加强中方牵头单位的协调组织力量，设立夏季达沃斯中方的常设机构。目前我方主要是由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国际组织处和宏观经济院外事办负责指导夏季达沃斯办会事宜，鉴于国家发改委外事司人员少、事务多，国家发改委可以指定一家下属事业单位专职负责与夏季达沃斯论坛外方的对接和论坛的组织，具体落实上述各项政策建议。

（二）关于进一步改进博鳌亚洲论坛的政策建议

博鳌亚洲论坛自成立以来，在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博鳌亚洲论坛在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乃至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以及战略定位、议题设置、智力支持、国际化发展、政府关系、平台建设等方面还有可以改进之处。

1. 提升中国乃至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博鳌亚洲论坛要充分体现中国外交新思维，鼓励非军事性合作联盟和论坛成为国家间交往的主流形态，积极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亟待提升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影响力，将之打造成为能够体现中国自身形象的多边论坛，以及为中国乃至亚洲争夺全球政治、经济事务话语权的重要舞台。提升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影响力将为亚太国家在TPP之外提供一个新的选项，以制约美国推出的亚太“战略再平衡”。

2. 完善战略定位和议题设置。首先，博鳌亚洲论坛的战略定位可以更简洁一点，范围也可以再稍微拓宽一点，使博鳌论坛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探讨亚洲和新兴经济体问题的首选平台。其次，提高博鳌亚洲论坛对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速度，围绕亚洲和新兴经济体企业界的需求，紧扣一些紧迫问题设置议题。最后，博鳌亚洲论坛应逐步提高非经济类议题的比重，推动亚洲一体化进程，促进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3. 加强外部智力支持和松散型社区网络建设。一方面，加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的建设，推进同亚洲各国民间和官方智库的联系，整合亚洲各国的智库资源，以共谋亚洲的合作与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全球智库网络建设，整合全球智力资源。博鳌亚洲论坛可以从会员网络、大学合作、伙伴布局、议程收集等方面入手，建立广泛的“官产学研媒”各界人士组成的松散型社区网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未来发展提供外部智力支持。

4. 进一步提高论坛的国际化程度。首先，加大力度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影响力。除了去欧美等经济发达地区办会之外，还应定期到亚洲其他国家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国家去举办会议。其次，积极吸引东亚之外的其

他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与到论坛中来，这是博鳌亚洲论坛今后应该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最后，积极吸收来自其他大洲的会员和理事。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举行换届选举时，可以考虑增加来自亚洲之外国家的理事名额。

5. 处理好政府与论坛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公共品投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达沃斯论坛的东道主政府格劳宾登州相比，海南政府的日常公共服务水平还有继续提高的空间。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海南省应像格劳宾登州一样，用高水平的常态化公共服务来保障论坛年会的需求。

四、搭建达沃斯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优势互补机制的政策建议

博鳌亚洲论坛站在“东半球角度”放眼亚洲和世界，探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为博鳌亚洲论坛与达沃斯论坛等“西半球视角”的知名论坛相互对话，实施全方位、多层面、深层次的合作，建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为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提供广阔的空间。

（一）促成双方签订优势互补合作协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外交部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两个论坛的协调和引导，加快推进两个论坛签订优势互补合作协议的进程，这是搭建两个论坛优势互补机制的首要步骤和必经之途，并以此推动两个论坛互补合作、强强联手，推进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

（二）建立两个论坛间的合作组织体系

在双方签订优势互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确立两个论坛的基金董事长—理事长联席会议制度和执行董事长—秘书长协调制度。此外，可由曾培炎同志牵头组建跨论坛合作与交流的管理机构，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处理跨论坛互补合作等相关事宜。

（三）搭建两个论坛优势互补合作机制

在建立并完善合作组织体系的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互补合作机制，这是实现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两个论坛的主办方要在健全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上狠下工夫，确保优势互补合作机制的成效，实现中国政府和两个论坛之间的三方共赢。

（四）发挥合作优势共同拓展全球市场

博鳌亚洲论坛具备面向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地缘优势和客户网络优势，而夏季达沃斯论坛则具有遍布全球的社区网络资源优势 and 智力支持方面的优势。双方可以基金董事长—理事长联席会议制度为依托沟通情况、统筹协调，加强在博鳌亚洲论坛“走出去”办会方面的协作，提升夏季达沃斯论坛开拓亚洲市场的竞争力，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共同开拓全球市场。

（五）两强互补联合推动服务外包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在服务外包的发展方面还与夏季达沃斯论坛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两个论坛之间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可以提高会务服务外包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借鉴达沃斯论坛与“阳狮公司”合作的成功经验，将博鳌打造成为中国会展事业服务外包试验场。

（六）搭建优势互补机制的主线和推动力

一方面，以议题互补作为双方搭建优势互补机制的主线，促进两个论坛各自功能定位的明确和双方价值诉求的平衡，尽量减少竞争性议题设置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以中央政府和主办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为双方搭建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提供推动力。

责任编辑：刘森

（上接第 114 页）

作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容之一，两国最近同意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气候，为在这个严重危及全球经济和生态系统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提供了机遇。另一个是网络安全，可能会围绕这个危及美-中关系的棘手问题形成共同立场。除了应对这两个关键问题，增加跨境投资也非常必要。在推动市场准入磋商和争取平等竞争条件的同时，实现这个目标的另一个手段是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此类协定将加强对双方投资者的保护。

如果中国想要打造新的经济模式，就必须在经济中引入竞争，例如金融服务行业，如果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开展平等竞争，将会开辟更加开放而高效的资本市场，帮助中国过渡成为投资者而不光是储蓄者的国度。北京还应该引入更多的竞争来帮助本国私营企业。反竞争行为对中国私营企业的伤害几乎不亚于外国企业。尽管国有企业享受着种种补贴、好处以及获得信贷的优惠条件，但私营企业才是中国就业岗位的主要创造者。

归根结底，两国需要资本实现更自由的流动：对美国人而言，他们需要创造就业岗位的资本流，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人而言，北京需要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中国抱怨说，美国的管理框架不够明晰。美国可以实施更透明的投资政策，让中国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从而帮助消除这种顾虑。

这对两国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继续采取被动态度，但也可以采取主动态度，通过措施使两国经济更加平衡。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将会懊悔不已。

（摘编自 2013 年 6 月 4 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 名人观察 ·

磋商使中美两国经济更加平衡

美国前财政部长 亨利·保尔森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促进了经济改革，与美国磋商达成新的经济协议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和新领导班子意识到，改革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致力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力，他知道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前提。

中美启动重要经济谈判的理由非常充分。首先，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2011年的双向贸易额达到创记录的4930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的对华出口是原来的5倍多，增长速度超过了进口。事实上，中国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出口市场。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出口减少了将近18%，但对华出口仅减少了大约2%。这说明，从长期来看，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产品的需求驱动力。这同时也表明，两国经济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这种相互依存性触及了美国和中国百姓的生活：美国的创新有助于提高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其中也包括无数中国家庭。就中国而言，美国是主要债务国，中国则在出口资本。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赤字开支提供了资金，使美国的利率保持在低水平。

考虑到如此强烈的相互依存性，经济紧张气氛未免过于浓厚。在中国，出口游说集团在争取有利于自身利益和限制外来竞争的政策；尽管美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但国家安全忧虑和中国日益增加的网络入侵行为导致反华情绪上扬，加大了中国在美投资的难度；贸易赤字持续存在；许多美国企业认为，北京在改变游戏规则，偏袒本国重点企业。

但是，根本问题在于，如果美-中经济更加平衡，走上更具可持续性和互补性的轨道，两国的经济关系将会更加稳固。

眼下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储蓄得太多，生产得太多，向美国销售得太多，自己消费得太少。美国则储蓄得太少，消费得太多，希望能生产并向中国销售得更多。好消息是，中国的新领导班子已经着手采取有可能使该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举措，目的是改变过分倚重政府投资和出口增长的模式，代之以强调家庭消费和竞争的模式。这并非易事。但是，如果他们取得成功，就会为美国企业创造新市场和新机遇。很显然，如果华盛顿利用双边磋商来帮助北京完成这一过渡，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

（下转第 113 页）

让中国进一步融入开放的全球体系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法里德·扎卡里亚

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一系列关键会谈，讨论了指导双边关系的广泛战略框架，恢复了中断23年的中美关系。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近期的会晤有可能成为具有类似历史意义的峰会。

自从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在40多年和8位总统任期内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华盛顿试图让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世界。该政策对美国有好处，对世界有好处，对中国极有好处。

但是，推动两国并肩合作的许多作用因素正在消失。在两国关系的最初20年里，华盛顿出于战略原因与北京结盟，改变与苏联的力量对比。中国处于发展初期，迫切需要美国的资本、技术和政治帮助来扩张本国经济。如今，中国的实力强大了许多，行为方式（从网络攻击到在非洲的政策）违背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华盛顿则必须对亚洲的现状拿出对策，因为其长期盟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忧心忡忡。

正因为如此，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晤非常重要。两国都需要象尼克松和周恩来1972年所做的那样，以清醒的眼光看待双边关系，找到可以为未来确立合作框架的新途径。双方应该谋求打造一种信任的广阔的氛围，而不是草草拟订一份“待办事项”清单。

有些美国人想把此次会晤看作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两国集团”同盟。这样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利于全球稳定和一体化。

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考虑到其规模，有朝一日会成为最大经济体（按人均计算，它是中等收入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它可能永远超不过美国）。但是，实力是从许多层面衡量的。按照大多数政治、军事、战略和文化尺度，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全球大国。北京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也希望形成稳定的外部环境。原因之一是中国面临着艰巨的国内挑战。北京希望在崛起的同时不要激起亚洲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华情绪。

美国应该谋求与中国发展良好的深层关系。由此将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繁荣、和平的世界。让中国进一步融入开放的全球体系，将有助于维护该体系，以及建立在该体系基础上的开放的全球经济。但是，要想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就必须承认并尊重该体系，行为方式要像个全球大国，而不是一个只谋求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缺乏气度的”国家。

换言之，当中国开始像个超级大国行事时，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超级大国看待。

（摘编自 2013 年 6 月 6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

中国的和平共处战略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丹麦皇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泽洛特·奥德高

中国不再只是世界秩序的消极接受者，它已成为决定其他国际行为者在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做出何种选择的关键因素。北京似乎将本国定位为一个政治方面的全球大国。中国通过最近在国防白皮书重申的和平共处战略实现了这一定位。这一战略旨在改变其他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背景，但不推动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中国版本的世界秩序建立在修正对现有联合国体系的阐述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绝对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这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秩序，旨在保护中国不受外国干涉，以及在不接受进行广泛合作之义务的情况下维持国际和平稳定。北京更多地是试图影响国际背景，而不是直接决定其他国际行为者的行为。这种和平共处战略不需要中国拥有美国那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发挥这种影响力，因为这种战略依赖的是中国版本的世界秩序的说服力，以之为优势，不推动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互动模式。

和平共处战略突出了在目前的讨论中被忽视和轻视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若干特点。首先，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说明的事实是，中国这个国家在一群二等强国——包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中表现良好。第二，中国远非美国那样的具有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1/3。美国的国防预算几乎是中国国防预算的6倍。第三，虽然处于这种相对不利的地位，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实力方面的可比性要大得多。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地位扩展了二等强国和小国的活动空间。因为中国赋予他们除与美国之间的联盟之外或能够取代与美国之间的联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他们拥有了额外影响力。二等强国和小国能够与中美都结盟而不必选边站。中国版本的世界秩序的存在令国际体系面临危险。在这种体系中，缺少一套协调一致、普遍地规定国家行为之对错的原则。因此，是通过冲突管理的临时框架来应对安全威胁。

在实施层面，和平共处涉及其外交关系中的5种行为。第一行为是，仅在所涉及到的所有政府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接触。这与西方支持的一旦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危及国际和平稳定，可在未经当事国政权同意的情况下，由联合国批准干涉的做法相反。第二，不鼓励在国际体系中为冲突管理提供武力。第三，鼓励各国奉行最适合本国历史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发展模式。第四，不对其他政权品头论足，鼓励与所有国家合作，依此作为促进所有国家繁荣的最佳途径。第五，鼓励国际多元化。

从西方角度看，北京提出的世界秩序模式对既有的国家实践构成了一些挑战，在普及全球的美国同盟体制之外，中国和平共处模式正在形成。中等国家和小国通常欢迎这种与西方模式不同的替代品。这种挑战促使华盛顿及其盟友集中精神振兴经济，加强金融能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与中国展开竞争。

（摘编自 2013 年 5 月 23 日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

责任编辑：刘英奎

保加利亚的投资合作环境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摘要：保加利亚是我国在中东欧地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为了帮助我国企业加大对保加利亚市场的开拓力度，本文简要介绍了该国的投资合作环境，并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应注意的问题给予了提示。

关键词：保加利亚 贸易 投资 风险防范

一、概况

（一）地理环境

1. 地理位置。保加利亚面积为111001.9平方公里，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约占该半岛面积的22%；边界线总长2245公里，其中陆界1181公里，河界686公里，海岸线378公里；北隔多瑙河与罗马尼亚相望，西与塞尔维亚、马其顿相邻，南与希腊、土耳其接壤，东濒黑海（紧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2. 自然资源。保加利亚自然资源贫乏，主要矿物有煤、铅、锌、铜、铁、钨、锰和铬，以及矿盐、石膏、陶土、重晶石、萤石矿等非金属矿产；森林面积408万公顷，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7%，其中75%是阔叶林，25%是针叶林。

3. 人口分布。保加利亚全国人口736万（2011年初），其中城市人口占73%；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为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瓦尔纳、布尔加斯等。

（二）宏观经济

保加利亚经济属外向型，经济规模小，对外资依赖度高，因此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经济发达的欧盟大国。希腊是保加利亚邻国，也是保重要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之一，希腊债务危机对保加利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更为直接。2010年之后，保加利亚经济有所好

转，2011年财政赤字显著降低，债务风险整体可控，金融市场基本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所增长，对外贸易增长强劲但势头趋缓，外国投资同比大幅下滑，国内市场需求疲软，失业率上升。

2011年保加利亚经济增长1.7%（见表1）。在保加利亚GDP构成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的占比分别为5.6%、31.2%和61.2%；政府财政收入129.81亿欧元，同比增长6.0%；财政支出137.9亿欧元，同比增长0.8%；财政赤字8.09亿欧元，同比下降43.9%；通货膨胀率为4.2%。

截至2011年底，保加利亚的外汇储备为133.49亿欧元，外债总额354.31亿欧元，其中净外债158.03亿欧元。

表 1 2011 年保加利亚宏观经济数据

经济指标	2011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10亿欧元)	38.5
GDP增长(%)	1.7
GDP人均(欧元)	4787
人口(百万)	7.35
失业率(%)	10.4
人均小时工资(欧元)	1.80
出口占GDP比(%)	52.6
进口占GDP比(%)	57.7
FDI(百万欧元)	1341.2
FDI占GDP比(%)	3.5
通胀率(%)	4.2
财政平衡占GDP比(%)	-3.9
外债占GDP比(%)	91.0
美元与列弗汇率	1.51
基准利率(%)	0.20

资料来源：保加利亚央行、统计局。

（三）基础设施

保加利亚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大部分基础设施建于上个世纪60-80年代，由于近年投资不足，普遍存在老化、失修、设备陈旧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保加利亚国家级公路总长度为1927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31公里、一级公路2961公里、二级公路4012公里、三级公路11730公里；地方级公路24000多公里。目前保加利亚铁路总长度为7326公里，共有8个国际机场，客运机场主要是索非亚、瓦尔纳、布尔加斯和普罗夫迪夫机场。保加利亚60%的进出口货物通过海运，港口在保运输业中占重要地位，主要海港是瓦尔纳港和布尔加斯港，主要河港是多瑙河的鲁塞港、维丁港和斯维斯托夫港。保加利亚的移动网络建设近年来发展较快，2009年互联网普及率约38%，移动网络覆盖86%的保加利亚领土和98%的人口。固定电话覆盖87%的住宅。保加利亚是东南欧地区能源生产大国，目前装机总量为12000MW。出口占其发电总量的10%-12%。

二、贸易与投资

（一）对外贸易

保加利亚位于欧亚要冲，是欧亚贸易、能源走廊，辐射面广、潜力较大，近年来一直受到外资青睐，是重要的新兴市场之一，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

2011年保加利亚进出口均大幅增长，总额达435.91亿欧元，其中出口202.35亿欧元(FOB)，进口233.56亿欧元(CIF)，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同比增长25.2%、30.0%、21.3%，贸易逆差31.21亿欧元，同比下降15.3%，贸易不平衡现象有所缓解。

保加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2011年与欧盟贸易总额达264.82亿欧元，其中保加利亚出口126.53亿欧元，进口138.29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27.7%、33.6%、22.8%，分别占保加利亚当年进出口、出口、进口总额的60.8%、62.5%、59.2%；对欧盟贸易逆差11.76亿欧元，同比下降58.5%。下表为2011年保加利亚前十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占同期贸易总额的64.51%。

表 2 2011 年保加利亚前十大贸易伙伴

（单位：百万欧元）

国家	保出口	同比	保进口	同比	进出口总额
德国	2414.02	45.5%	2565.83	14.7%	4979.85
俄罗斯	526.04	19.1%	4126.45	31.9%	4652.48
罗马尼亚	1933.55	36.4%	1612.69	20.2%	3546.24
意大利	1721.48	13.9%	1667.83	17.6%	3389.31
土耳其	1724.45	30.9%	1110.13	6.0%	2834.58
希腊	1425.98	15.2%	1307.06	14.4	2733.04
西班牙	544.04	30.7%	1171.56	223%	1715.60
法国	857.70	36.4%	758.72	20.4%	1616.42
比利时	1034.42	76.1%	397.19	9.0%	1431.61
乌克兰	283.53	43.1%	937.80	16.7%	1221.33
合计	12465.22		15655.24		28120.46

资料来源：保加利亚统计局。

（二）投资环境

1. 外资规模。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低运营成本、加入欧盟等有利条件使保加利亚受到国际投资者青睐，近年来外资流入数量呈跳跃式增长态势。2011年保加利亚引资额为13.4亿欧元。截至2011年底，外资存量约368亿欧元，未发生明显外资回流现象，保加利亚的外资流入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2. 外资来源。受欧债危机的影响，2011年保加利亚引资额下降，希腊、德国等对保加利亚新增投资减少，但保加利亚主要投资来源地仍然是欧盟发达国家，投资额最大的分别是荷兰和奥地利。从投资存量来看，欧洲国家仍是保加利亚主要外资来源地，尤其是荷兰、奥地利、希腊、英国、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在保加利亚投资存量一直维持在较

高水平,投资排在前10位的国家为荷兰、奥地利、希腊、英国、塞浦路斯、德国、俄罗斯、匈牙利、西班牙和卢森堡。

三、优势产业

保加利亚优势特色产业主要有玫瑰油、乳制品、葡萄酒生产行业,以及旅游、纺织服装、化工等行业。

(一) 纺织服装业

保加利亚纺织服装企业约2000家,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行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8%,就业人数约占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1/3。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纺织业实现3.3%的年增长,欧洲仍是保纺织服装出口的主要市场。

(二) 化工业

化工工业是保加利亚的传统优势行业,布尔加斯市是化工工业的生产基地。2011年化工产品出口额约16亿欧元,同比增长28.8%。生产和出口的化工产品主要有:无机化工产品、化肥、碳酸灰、塑料、PVC,聚酰胺、化纤、油漆、酞酸盐、清洁剂、医药原料、香水、化妆品、香精等。

(三) 玫瑰油产业

保加利亚因独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为最适合种植高品质油玫瑰的国家,享有“玫瑰之国”的美誉,其玫瑰油的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一。“玫瑰谷”是保加利亚玫瑰的主要产地,集中了全国油玫瑰3/4以上的产量。2010年,保加利亚玫瑰油产量近4吨,绝大部分出口法、英等国,玫瑰水主要出口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四) 葡萄酒酿造业

保加利亚是酒生产和出口大国之一,酿酒业是保加利亚经济的重要传统产业,前任总统珀尔瓦诺夫称“葡萄酒是保加利亚的象征,是国家经济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每年在保普罗夫迪夫国际博览会举办的专门的葡萄酒国际展会——Vinaria,是中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酒类国际展会。

(五) 乳制品加工产业

保加利亚的乳制品历史长、品种全,是酸奶的发源地,主要乳制品是奶酪(白酪和黄酪)。2010年保加利亚肉奶制品同比大幅增长20%,农产品占出口总量的17%。2011年,保加利亚政府专门设立了基金以进一步推介其奶制品。

(六) 旅游业

保加利亚拥有美丽多姿的地形地貌、宜人的气候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相对的

价格优势，被誉为“上帝的后花园”。保加利亚主要旅游项目有:海滨(优质的海滨浴场和海滩)游、冬季(滑雪)游、文化历史(1300年历史)游、生态环境游、SPA浴疗旅游、葡萄酒旅游、探险运动游等。其中，夏季海滨游和冬季滑雪游是保加利亚旅游业的两大支柱。2011年，保加利亚旅游业收入达28亿欧元，同比增长3.8%。

四、财税政策

(一) 税收政策

保加利亚主要税赋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等。

1. 企业所得税。从2007年1月1日开始，保加利亚政府将企业所得税调低到10%(单一税率)。目前世界企业所得税的平均水平约28.6%，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保加利亚自动按照直线折旧法计算，最高折旧标准如下表。

表 3 保加利亚最高折旧标准列表

折旧类别	折旧资产	折旧率标准 (%)
I	建筑、工具、通讯设备、电子设备、通讯线路	4
II	机械、生产设备、仪器	30或50
III	交通工具(不包括汽车)、道路、飞机跑道	10
IV	计算机、软件和软件使用权	50
V	汽车	25
VI	合同或法律对使用年限有规定的有形或无形固定资产	100/规定年限(不超过33.3)
VII	其它可折旧资产	15

2. 个人所得税。从2008年1月1日起，保加利亚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0%，并取消了个人所得税200列弗的起征点。

3. 增值税。保加利亚实行20%的增值税税率。自2011年4月起旅游业实行9%的单一税率。免除增值税的产品及服务如下:出口欧盟外的有关产品、服务;与国际运输有关的产品、服务;与免税贸易相关的产品、服务;代理、中间商及经纪人提供的产品、服务。

4. 消费税。2005年11月15日，保加利亚实施新消费税法，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消费税征收的主要商品主要有:白酒、啤酒、含酒精的原材料(不包含葡萄酒);雪茄、香烟、烟草等制品;功率超过120千瓦的9座以下汽车;发动机产品。2008年1月1日起，不再对咖啡征收消费税，但对于商用汽油、煤、电力能源提高了消费税税率。出口产品不征收消费税。

(二) 投资鼓励政策

保加利亚对在特定行业、地区、雇用弱势群体的投资企业均出台了支持政策。

1. 行业鼓励政策。保加利亚行业鼓励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大型投资项目的支持政策中，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制造工业、能源产业、计算机技术研发、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领域。对于在保加利亚投资固定（非固定）资产，且满足下列条件的投资项目，在获得主管部门颁发的投资证书后，获得有效期为3年的优惠政策鼓励：投资项目应为建立新企业、扩大现有规模、开拓新产品、根本性改变生产流程、使原产品（服务）更现代化，或属可再生能源、制造工业、发电产业、计算机技术研发、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投资，且投资项目总销售额的80%须来自以上行业，投资总额的40%来自投资人及其贷款，投资项目在保加利亚持续5年以上，在3年内创造并保持就业岗位。2009年，保加利亚再次修订《保加利亚投资促进法》，进一步降低投资评级门槛。

2. 地区鼓励政策。一是生产企业税收优惠。保加利亚政府对在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以上的地区投资，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生产型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①公司生产活动都集中在高失业地区；②公司在申请免除企业所得税当年不负有不可推卸的其他税务、社保、罚款等责任。免缴的企业所得税须在该财务年度结束后的3年内再投资到生产中，有效投资包括固定资产和许可、专利、技术等非固定资产投资，但投资非固定资产的额度不得超过投资固定资产额度的25%，同时企业须投入不低于再投资资产总额的25%作为配套资金，除非由于企业合并重组，再投资资产不允许在5年内出售。如果被投资地区已经从高失业地区名单中除名，那么该地区只能在此后5年内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企业正在筹建、尚未投产时，该地区从高失业地区名单中除名，投资企业仍可在此后4年中享受该优惠政策。二是抵税优惠措施。保加利亚政府对在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以上地区投资的企业，给予相当于首期投资资产总额10%的税收豁免，但免缴税款须在此后4年中用于再投资。三是工业园区。2009年2月，保加利亚政府财政和欧盟基金共同注资成立了国家“工业园区”公司，初期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列弗。工业园区重点吸引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和出口欧洲的加工行业的潜在投资者，希望通过该措施吸引更多的外资，提振经济发展。

3. 对企业雇用弱势群体的支持政策。一是工资补贴。在保加利亚设立公司如雇用符合以下条件的员工：年满29岁的失业人员；年满29岁的劳动能力部分丧失的失业人员；来自社会机构已完成学业人员；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单亲或子女小于3岁的母亲；5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男性。保加利亚就业署将以劳动合同为基础，除支付该员工不超过12个月的工资、社会和健康保险外，还提供不超过6个月的培训费用。二是提高技术资格补贴。雇主可向保加利亚就业署申请250列弗的补助（国家就业计划规定的补助上限500列弗的一半）用于员工培训或晋升技术资格。三是抵税优惠政策。雇主如雇用失业一年以上的员工、50岁以上失业人员、失业达12个月以上的残疾人，可以享受与特殊人员工资（包括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失业保险）等额的抵税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将在

雇员被解雇的当年年底兑现。

4. 其他支持政策。一是增值税优惠措施。保加利亚政府对外资企业以建设投资项目为目的的进口商品免收增值税。此外，投资企业在当地的采购活动可获得返还增值税的优惠，投资企业的增值税可在递交申请文件后30天内得到返还。但上述投资企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并获得经济能源旅游部批准后方能获得这种资格：2年内投资规模超过500万欧元；项目建设期不超过2年；项目创造50个新就业岗位；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对地区发展援助资金有关要求；投资者能证明其具备投资项目所需的经济实力。二是旅游业的特殊规定。对旅游行业中的旅馆经营者，保加利亚政府征收的增值税税率为7%。如果旅行社提供的服务在保加利亚境内，增值税税率为20%；如果旅行社提供的服务在保加利亚境外，免征增值税。

五、中国企业在保加利亚投资合作应注意的事项

（一）投资

一是在投资前应到保加利亚进行实地考察，认真研究当地法律，尤其是投资法、外国人法、税法和劳动法等法律，并就有关事项咨询保加利亚主管部门。二是对合资、合作方进行认真深入考察，最好选择平常有业务来往或经政府部门推荐的信誉好的公司。三是为避免合资双方经营理念、管理方式方法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可选择独资，某些重要职位，如财务、销售、公关和法律顾问可聘用当地人员，或与当地律师、会计事务所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四是在合资、合作前，应签订规范的合资或合作协议，明确界定总投资额、双方占比、到资时限、金额等，列明双方权、责、利，违约方应承担的责任，中止合资或合作后的财产处置方式等。五是合资企业应与其投资的当地政府机构，如税务、海关、公安、劳动等部门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六是合资企业应自觉遵守驻在国法律、宗教、文化和习俗，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展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二）贸易

一是签订合同前应查询外方公司的成立时间、地点、业绩、诚信以及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等信息。二是签订正式合同。合同中应详细规定商品的品质、规格，同时注明付款条件、付款时间，以防对方借故拖延。三是尽量采取信用证等较为安全的支付方式，严格审核开证行，并购买进出口信用保险。个别保加利亚公司利用中国企业偏好使用信用证的心理，从小银行开信用证，对于不知名小银行，尤其是边远地区银行，要提高警惕，这种银行由于管理漏洞多，发生问题的几率较高，而且出现纠纷后很难进行责任追究。四是避免收单银行与汇款银行不是一家，收单银行与货物目的国不一致的情况，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加大启动法律程序的难度。五是在与外商交往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应保持警惕，注意辨别其言行真伪，及时发现问题，减少陷入进退维谷尴尬局面的可能

性。六是保加利亚公司有关信息可以查询保加利亚商工会（register.bcci.bg/IMS/reports/PublicReports.aspx），该组织注册会员达5万多家。也可以通过**irelations@bcci.bg**, **intorg@bcci.bg**邮箱咨询有关信息。此外，凡经证实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保加利亚公司已被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经商参处列入黑名单，并在网站上公布，网址：www.bg.mofcom.gov.cn。

（三）承包工程

在投标前应仔细阅读有关招标材料中对投标者的资质要求，如是否允许中资企业投标、是否要求设备原产自欧盟境内等。对保加利亚政府采购项目感兴趣的中资企业可以参考保加利亚政府采购署网站（www.aop.bg）披露的有关项目信息。据保加利亚法律要求，各部公示的招标项目必须在政府采购署网站上同步披露。

（四）劳务合作

保加利亚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尤其是建筑、纺织服装等行业缺乏熟练工人，中保开展劳务合作具有一定潜力。但保加利亚对欧盟以外国家开放劳务市场持谨慎态度。金融危机爆发后，保加利亚外出打工人员出现回流现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五）风险防范

在保加利亚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项目所在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的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等。企业应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庭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保加利亚开展投资合作过程中，尽量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尽快通过自身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

保加利亚实行本币列弗与欧元固定汇率制度，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汇率的波动，降低了汇率风险，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保加利亚面临的国际支付压力逐渐增大，固定汇率制度受到考验，企业在与保企业合作中要适当注意汇率风险。保加利亚商业欺诈现象也时有发生，中国企业在经贸合作中应提高警惕。另外，中资企业要防范索贿行贿事件的发生，要守法经营。

责任编辑：刘英奎

ABSTRACTS

(1) U.S. and China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Partner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Henry Kissinger

The core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es in US-China relations; n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are able to solve all kinds of common problems that the two sides face by its own; the two countries can address toge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develop parallel---not the same---policies. The US-China relations shall move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and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partner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2)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der the Transition from a Big Economy to a Strong Economy

Wei Liqun

Judging from various aggregative indicators, China has become a veritable big economy. However, facing both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and many challenges, China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transit from a big economy to a strong one. To learn from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stro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achieve our own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a big economy to a strong one, China needs to implement six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sustained and sound economic growth, optimiz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driven by innovation.

(3) Som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Need Solv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u Zheng

China's urbanization is a daunting task, as we face many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e should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urban areas for the transforming rural labors,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 transferring to cities and towns, and solve urban-rural planning issues such as land circ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also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 way beneficial to promotion to urbanization.

(4)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Fund and the Transition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n

Outlook on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Financial Reform and Pension System Reform

Liu Yunlong, Xiao Zhiguang & Zheng Wei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study and case study confirm our hypothes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fun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responsible for historical tran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 of financial structure. That's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fund can not only transform the old age saving into long term investment fund,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capital market. Hence, it means that we should speed up the reform of pension system and make good use of its financial development effect. Only through this way, can we transform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o pension fund system bonu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financial reform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upgrading.

(5) The Sequestration' Impact on the US Economy

Gu Yuanyang

Since the automatic government spending cuts---the sequestration---started,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have tit-for-tat views and perspectives towards the sequester plan. The Sequestration has affected many important fields in defense and non-defense spending, however, it will not harm the US economy "pretty much to the bone", for it cuts only 2.4% of the total federal spending. The US economy can still continue modest recovery in 2013.

(6) The US and Europe Having Launched FTA Negotiations, China Should Respond Positively

Chen Bingcai & Tian Q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ially launched FTA negotiations in February this year. Contents of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US-EU FTA, difficulties in the negotiations, whether negotiations can be expected to complete or not, all above have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xt of the negotiations and its impact on trade and the world economy, and explores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of the negotia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aching an agreement. China should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TA strategy, and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S-EU FTA.

(7) On Multilateral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pening-up Economic System

Feng Lei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trade and service trade, and processing trade and general trade are three

key paired-issues in the multilateral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opening-up economic system. The mixture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them and between with the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setting up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8) TPP vs. RCEP: China'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ang J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hows two distinct trends, the opening of RCEP negotiations and the expanding of TPP negotiations, which promotes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d makes the future trade patterns become less clea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view of TPP and RCEP that will lea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nter a new stage,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duction chain in Asia-Pacific region, TPP and RCEP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how to face up to the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 between TPP and RCEP, the impact of TPP and RCEP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how to take response measures, all above are major projects to be faced up urgently by Chinese government.

(9) The Credit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and th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Lin Junyue

A credit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will be a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or th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because all of the bank's operations an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will rely on it. So the system must be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independent technology owned by BRICs themselves.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SCS) created in China is a way to build an efficient credit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by integrating the system with its market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can introduce the SCS mode to all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as a consulting service, for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market order and efficiency. As a member of the BRICs, China should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forementioned projects.

(10) Cultivation of Lead Market an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Xu Mengzhou & Lv Tie

The formation of lead market is crucial for a nation to building and controlling the global production value chai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we should not only make full use of home market, but also establish the awareness of cultivating lead market. At present, the cultivation of lead marke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is faced with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like the disadvantage of innovative products' prices, the disadvantage of explore capacity of

enterprise demands, the disadvantage of innovative products' transfer and export, and the disadvantage of regional uncompetitive market, etc.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feasible way to cultivate lead market for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11) The US Cotton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Xie Yunliang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econd largest producer and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cotton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US cotton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briefly, and discusse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 cotton policy. Especially, based on a summary of cotton subsidies in the 2002 Farm Bill and 2008 Farm Bil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those subsidies, and analyzes new directions of the US cotton subsidy policy as well.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s some enlightenments of the US cotton policy to China.

(1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Boao Forum for Asia

Research Group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Boao Forum for Asia,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compare the feasibility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channel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forums, and explore how to build complementary mechanisms, optimize resources, and achieve resources and results sharing between the two forums. At the same time, it aims to provi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improving the modes of organization, preparation and operation for the organizers of the two forums,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two forums.

(13) An Introduction to Bulgaria'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s Office of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Bulgaria

Bulgaria is one of China's importan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artners in Central Europe and Eastern Europe. In order to help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stand Bulgaria's situation better and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market opening of preserved, we have the following introduction to Bulgaria'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to prompt the enterprise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question.

Editor: Xie Yunliang

欢迎订阅2013年《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联系人：李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1号1号楼506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34；电话（传真）：010-66169330。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0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3年《全球化》杂志（月刊） 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电话		
详细地址（邮编）				
征订份数		420元/年（12期）	总计金额	

注：为便于我们尽快给您邮寄，请务必将征订单回执与汇款底单一并传真至我部。

国经中心将举办 “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于2013年6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以“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加强全球智库机构合作，集中全球民间智慧和力量，推进全球经济平稳复苏，探寻世界经济发展新方向。

国务院有关领导、国家相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领导、外国前政要、国内外知名智库负责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国内外专家学者、商业领袖和媒体代表将共同参与，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框架日程

2013年6月28-29日北京

6月28日（星期五）

15: 30 - 18: 00 注册

6月29日（星期六）

07: 00 - 08: 00 注册

08: 30 - 10: 00 开幕式

10: 00 - 13: 00 主论坛：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

第一时段 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及其影响

第二时段 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与国际关系调整

14: 30 - 17: 30 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一 如何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稳定增长

分论坛二 世界经济的新引擎是什么

分论坛三 全球资本市场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

分论坛四 国际关系调整中的智库角色

（信息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